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碩士論文

新疆哈薩克族農村定居畜牧業的發展



指導教授：藍美華

研究生：王展

中華民國105年1月

## 謝 辭

也許本文的完成也意味著我學生時代的結束，也許再也不會有機會花整整三年的時間去思考一個自己喜歡的問題。在論文的寫作過程中，首先要感謝的是我的指導教授藍美華老師。老師在作研究方面的熱誠、成就以及知名度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形容的，在一次次督促與討論中，我可以感受到老師對我的用心，並且指出我在寫作上的許多盲點。對老師的感激，無以言表。

生命的河流里，一步接著一步，如果大學沒有去到西北，生長在江南的我應該不會想到自己的生命會與千里之外的哈薩克族產生聯結。如果不是兩岸關係的緩和，我也不會來到寶島台灣，卻將思考的興趣再次投向西北。我人生中重要的兩個城市，蘭州與台北，因為可愛的哈薩克族同胞而聯繫了起來。感謝在我的田野過程中給予我幫助的新疆師範大學、新疆社科院的老師和學者。感謝村中的哈薩克族同胞，無私的幫助我適應新疆乾燥而嚴寒的環境，耐心地解答我每一個問題。

感謝所有在求學過程中陪伴我的同學，感謝我的室友黃鵬錕，陪我度過指南山上陰鬱的日子。感謝一起渡海求學的陸生同學們，尤其是孫美子、楊奇、林凱源、張怡微和姚贛黎兩位姐姐、老潘，我會永遠記得大家一起嘴炮、一起喝酒的日子。感謝偉傑學長，在台灣三年多時間里，他既是我的朋友又像我的老師。

最後感謝我的父母，雖然不能理解我的論文，卻相信他們的兒子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他們給予我最大的自由，默默地支持我的每一個決定，才能讓我任性地追求自己的夢想。這本論文是獻給他們的。

王 展 謹記

## 摘要

21世紀的金村，不可避免地捲入了中國社會的宏大變遷。當「西部大開發」的號角吹響的時候，新一輪現代化的要求也隨著國家權力管道輸入鄉村，按照現代化的理想對原有的秩序進行解構與重構。對新疆的哈薩克牧民來說，定居是國家理想模式下的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國家將人口聚集之後能夠更加強有力地控制農村進行引導的手段。隨著草原生態壓力的增大，生活甚至生存都成為問題的時候，現代化只是一個遙遠的夢而已。而這顛覆傳統游牧方式的定居就是哈薩克族告別傳統生計方式的變遷過程。對農區農民來說如何因應城市化、農業現代化的挑戰取決於已有的農村社會結構、小農生產方式能否完成自身的蛻化從而與市場經濟、現代社會相結合；而對從游牧社會轉到定居社會的哈薩克族定居牧民來說，要適應的除了生活習慣外，還有如何在新的定居環境中選擇新的經濟生活方式。本文通過對哈薩克族村莊的田野調查，發現金村經濟的發展並非只和經濟政策相關那麼簡單，另外諸如土地政策、金融貸款、援疆政策、村民與政府的關係、基層政府的執行力、甚至村民自身對經濟發展計劃的歪曲，都作用於經濟發展，最終導致金村定居50多年來進步甚微的現狀。

關鍵字：

哈薩克族、定居、畜牧業、合作社

#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的意義.....	5
一、為哈薩克族的研究積累素材與經驗.....	5
二、對中國鄉村研究做出新的反思與理論反饋.....	7
第三節 文獻回顧.....	9
一、傳統中國鄉村研究的方法與意義.....	9
二、草原牧區的研究成果.....	12
第二章 初識金村 .....	15
第一節 金村所處的環境.....	15
第二節 金村的定居歷史.....	18
第三節 市場化的社會.....	23
第三章 定居的官方邏輯 .....	27
第一節 定居的生態邏輯.....	27
第二節 定居的經濟與社會邏輯.....	29
第三節 勞動力轉移的失敗.....	32
第四章 陷入困境的家庭農場與畜牧業 .....	39
第一節 家庭牧場發展的資本.....	39
第二節 金村的畜牧業模式.....	42
第三節 畜牧業生產力的落後.....	53
第五章 政府與合作社 .....	63

第一節 表面困境的背後.....	63
第二節 合作社的需求.....	66
第三節 誰的合作社.....	72
第六章 結論 .....	77
徵引書目 .....	82
村中訪談人物簡介 .....	87



## 表次

表4-1 奇台縣每一畝土地耕種成本彙總表 .....	44
----------------------------	----



## 圖次

- 圖 2-1 金村與附近兩個集鎮的位置示意圖.....16
- 圖 4-1 金村畜牧業困境示意圖 .....54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人類的生產活動已經嚴重影響到草原生態系統的平衡，生態危機成了牧民定居的眾多原因之一。影響生態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單位面積上的牲畜越來越多，導致天然草場不斷縮小、退化，尤其是冬春草場普遍不足，草畜矛盾日益突出。吉爾茨（Clifford Geertz）在其1936年的著作*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農業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他考察了印尼爪哇島的水稻種植業，爪哇人由於缺乏資本，土地數量有限，再加上行政障礙，無法將農業向外延擴展，致使勞動力不斷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產中，於是吉爾茨提出了「農業內卷化」的概念。它是指在土地面積有限的情況下，增長的勞動力不斷進入農業生產，雖然提高了總產量但是單位勞動力的產出仍然維持在原有水平。<sup>1</sup>黃宗智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和《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兩本書中，用這一概念來形容中國在過去幾百年間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增長，但是單位勞動的邊際效益卻遞減的方式，即沒有發展的增長。<sup>2</sup>從吉爾茨到黃宗智，他們都在研究種植業的時候使用「農業內卷化」來論述勞動力的密集化與邊際效益的遞減的關係，筆者希望使用這個概念來介紹畜牧業發展的問題。

畜牧業是新疆最具特色的傳統產業和優勢產業，新疆天然草原面積遼闊，資源豐富，草原總面積8.6億畝，可利用面積7.2億畝，佔新疆土地總面積的34.4%，居中國大陸第三位。<sup>3</sup>這些年來，新疆畜牧業逐年增長，從1996年到2008年，牧區牲畜數量由

---

<sup>1</sup> 劉世定、邱澤奇：《內卷化概念辨析》，《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5期，頁96-110。

<sup>2</sup>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0）。

<sup>3</sup> 《新疆草場退化原因及目前草場管理使用上的問題》，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xjso.gov.cn/main/showdetails.aspx?id=495>。檢索日期：2016年1月15日。



1900多萬頭增加到2136多萬頭(佔全區牲畜的45%)，<sup>4</sup>但畜牧業佔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始終徘徊在20%上下。發展速度和整體水平與全國的差距逐年拉大，成為制約新疆國民經濟發展的一條短腿。新疆畜牧業產值在全國位次由第4位降至26位，許多沒有像新疆一樣擁有如此優質草場資源的省份畜牧業產值都超過了新疆。肉類總產量佔全國的1.3%左右，居第20位，人均肉類產量低於全國平均水平」。<sup>5</sup>也就是說新疆牧區的牲畜數量雖然增加，其產值也得到相應提升，但是與其他省市區相比，顯得並不明顯，以致新疆畜牧業的排名的相對下降。

除了傳統擁有牧區的省份以外，內陸省份的畜牧業產值也超過新疆，充分說明新疆優秀的草場資源在畜牧業中發展的優勢並不明顯。畜牧產品的生產仍然是延續千百年來傳統的游牧方式，沒有突破性的變革。單位面積上牲畜總量增加的邊際效益在遞減，產生了「提量不提質」的後果，如果新疆希望繼續提升其畜牧業的發展水平，現有的草場已經不能滿足需要，畜牧產品生產得越多對環境的壓力也越大。加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牧民承擔畜牧產品生產的同時，還要完成畜牧產品向商品的轉換，在有限的單位面積上生產更多的畜牧產品就需要更加專業和集約化的生產，因此牧民的定居問題不僅僅是居住方式，還是整個生產方式的轉變。

從歷史來看，在1984年新疆牧區牲畜作價歸戶，草場承包到戶，一家一戶重新成為獨立的生產單位之後，牧民家庭個體負擔其生產的全部過程。新疆牧區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破壞了哈薩克族原有的以血緣為聯繫的阿吾勒，<sup>6</sup>在包產到戶後不再像原來一樣整個阿吾勒享有同一片草場，大塊的天然草場因為家庭的分化不斷遭到分割，使得傳統的輪牧制度迴旋的餘地越來越小。這種草場承包到戶，雖然增加了村民的自主性，

---

<sup>4</sup> 《新疆：新疆天然草原退化成因及對策》，農業部中國草原監理中心，網站：<http://www.grassland.gov.cn/grassland-new/Item/1706.aspx>。檢索日期：2016年1月15日。

<sup>5</sup> 阿德力汗·葉斯汗，《對新疆畜牧業結構調整的幾點認識》，《新疆財經》2002年第四期，頁12-15。

<sup>6</sup> 《木壘哈薩克自治縣概況》編寫組，《木壘哈薩克自治縣概況》（烏魯木齊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頁20。哈薩克族的氏族部落是大小不同的血緣集團。血緣較親近的牧戶結成的最小的群居單位叫「阿吾勒」，近似牧村。一個阿吾勒一般是十戶左右，有時也有一兩戶外來戶，大都是依附於這個阿吾勒的赤貧牧民。

調動了村民牧業生產的積極性，但是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卻發現沒有輪牧制度的草場，「加強了對草場的利用，加劇了一些地區草場退化、沙化的速度」，<sup>7</sup>反過來牧民對自然災害的承受力也不如集體時代。另外，不同牲畜對草場資源的利用部份和利用率並不相同、比如「馬是愛吃草的尖端和籽粒的，所以要尋找草比較高的牧場。牛是用舌捲草吃的，草長得矮，也無礙於放牧。羊的牙齒銳利，每每嚙到草根。所以放過羊的草場，就不能再放牧其他家畜，尤其是馬。」<sup>8</sup>因此「牧草場地必須具備寬闊的高山草甸、坪壩草場、沼澤草場才能滿足牲畜生長發育各個時期的營養需求」。<sup>9</sup>而牧民在經濟發展的情況下，不斷增加牲畜的蓄積量，期待著從此走上富裕道路。原本在共同所有制下的草場資源被分配到各家，處置權也歸於家庭之後，反而失去了在氏族部落體制下對共同資源的約束，從這一點來說，破除了「公地的悲劇」以後，「私地的悲劇」接踵而來。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生態問題，中國從2002年開始在西部地區開始實施「退牧還草」工程。其中主要相關政策是實行以草定畜，嚴格控制載畜量。就是要根據草場資源狀況和草場承載量，定期核定項目建設戶草原載畜量，控制休牧和劃區輪牧草原區內的牲畜放養數量，防止超載過牧，實現草畜平衡。<sup>10</sup>

新疆的草場資源與游牧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在哈薩克族地區以定居方式進行探索的。事實上，新疆牧區的牧民由於居住分散，交通、通訊、電力等基礎設施不能很好地覆蓋，原有的生活方式讓許多牧民被長期排斥在現代化之外。而游牧社會如何走入現代化仍然沒有定論，世界上還沒有依靠完全的游牧社會實現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先例。即使是農業社會，在走入工業化的時候也放棄了太多原有的農業社會結構。尤其是在中國，中國官方具有強烈的現代化衝動，並且毫不缺少在現代化過程中摸索的勇氣，於是關於畜牧業現代化的道路，就這樣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開始了。2001年中國

---

<sup>7</sup> 劉鑫渝，《土地制度變遷視野下的哈薩克牧區社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頁247。

<sup>8</sup> 札奇斯欽，《蒙古文化與社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20。

<sup>9</sup> 劉鑫渝，《土地制度變遷視野下的哈薩克牧區社會》，頁247、248。

<sup>10</sup> 《關於進一步加強退牧還草工程實施管理的意見》，農牧發〔2005〕4號，農業部官方網站，網站：[http://www.moa.gov.cn/zwl/m/zcfg/qtbmgz/200601/t20060124\\_542305.htm](http://www.moa.gov.cn/zwl/m/zcfg/qtbmgz/200601/t20060124_542305.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大陸國務院發佈實施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sup>11</sup>和2001年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佈的《關於易地扶貧搬遷試點工程的實施意見》<sup>12</sup>對中國西部地區穩步推進移民搬遷進行了戰略部署。移民的一大原因就是畜牧業的生產力過低，因而如果將人口轉移到其他產業，從而能夠集中畜牧業的資源，那就可以提高畜牧業的單位生產力。與農業一樣，政府希望將大量的牧民從第一產業中轉移，以集中草場資源，進行大農場式的生產。因而在新疆牧區有必要將牧民定居，使得一部份人放棄牧業的生產，這被認為是中國西部游牧地區走向現代化的關鍵一步。另一大原因則是牧民居住過於分散，讓政府提供基礎設施、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都有困難，定居則可以有效地將人口集中起來，以此作為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基礎。

而隨著中國大陸整體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中共對農村又有新的工作，201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公布，印發了《關於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表示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穩中求進，改革創新，堅決破除體制機制弊端，堅持農業基礎地位不動搖，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sup>13</sup>國家的權力不斷通過各種政治運動與改革深入到牧區，將原本分散的牧民重新集合，這也是國家權力再一次下滲，希望直接干預牧區現代化的過程。牧民定居是一項有關生態和文化的重大工程，意味著牧民生活方式的重建。在國家因為各種原因大力倡導定居時，誰也不能保證定居的效果。那定居之後要如何發展畜牧業？畜牧業運轉的效果到底如何？筆者希望能透過一個村莊加以觀察和分析。

---

<sup>11</sup> 《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的通知》，國發〔2001〕23號，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922.htm](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922.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sup>12</sup> 《國家計委關於易地扶貧搬遷試點工程的實施意見》計投資〔2001〕1834號，中國甘肅網，網站：<http://news.gscn.com.cn/system/2014/10/16/010827875.s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sup>13</sup>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新華網新聞，網站：[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1/19/c\\_119033371.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1/19/c_119033371.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 第二節 研究的意義

研究哈薩克族社會定居的意義，可以放在兩個向度來討論。游牧社會作為在人類歷史上與農耕文明相對抗的另一種文明形式，人們都好奇它在未來將會如何轉型與發展，是否真的就像預言一樣，它必將消亡。在此基礎上，游牧對於生態的意義以及游牧文明本身之於世界的重要歷史地位雖然是筆者的興趣，並且也將在文中有所涉及。

### 一、為哈薩克族的研究積累素材與經驗

從中共建政至今66年間，尤其是改革開放37年以來，哈薩克族作為中國多民族國家的一份子，不斷地與國家政策、周圍民族、現代化互動並反饋到自身的發展。學術界有聲音認為中國現行的生態移民政策理論依據是不充分的，因為沒有令人信服的理論證明生態移民是避免環境退化的唯一或最佳途徑，<sup>14</sup>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更加偏向於「游牧——定居框架」，這種觀點認為中國政府著力推動定居的目標主要是因為草原生態環境的惡化，而筆者認為定居對中國政府的宏觀政策而言，並不僅僅是保護環境如此簡單，而是推動西部大開發過程中社會的現代化中必備的一環。中國政府從不吝惜花費精力在社會改造上，如果將研究視野放在鄉村研究的話，就可以理解定居——伴隨著基礎設施建設的推進——為這些偏遠地區的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國民服務」，如基本的水、電力、燃氣、醫療、社區管理等等。對官方而言，這也可以為促進邊疆穩定和民族團結作出貢獻。從更長的時間線上來看，這也是中國近代遭遇邊疆危機以來，中央政府將它的權力與服務再一次細緻地滲透到原本很難觸及的角落，這與整個現代國家的建構理念是一致的。這就是筆者所要強調的在中國視野下研究哈薩克族的意義：對少數民族的村落研究來說，他們首先是中國的農村，因此與其他地方的農村有著相似的歷史過程，不論是大躍進還是牧區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國家權力的觸角第一次毫無保留地滲透到作為社會細胞的鄉村時，當改革開放從沿海到內陸到邊疆梯次推進的時候，這些有著相似經歷卻又有著不同命運的村莊不斷提醒我們中國的

---

<sup>14</sup> 郝時遠、奧塞·科拉斯、扎洛主編，《當代中國游牧業：政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17。

廣闊與複雜。天壤之別的自然稟賦，各有特色的文化根基、並不相同的政策支持導致對國家權力、現代化變遷的多樣選擇，讓原本就複雜的中國農村表現出更加紛繁的圖像。曹錦清通過在河南的調查反思「黃河邊的中國」這樣的農業國家到底要如何跨入現代化，如此結構性的痼疾並不是口號上的民主與專制、自由與獨裁二分那麼簡單。雖然內地農村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現代化的浪潮已經洶湧澎湃地拍打過來。

在新疆牧區，這個遠離黃河的「草原上的中國」，也已經遠遠聽見潮聲，並且偶爾有幾朵水花濺過來了，一切似乎都有模有樣了，但是這一切又好像並沒有那麼樂觀。我們看到牧民們放棄了駿馬開上了汽車，卻又看到他們趕著幾百年前一樣的羊群；我們看到牧民們下山定居住進了新房，卻又看他們辛勤勞動卻依然捉襟見肘。新疆就像中國這個龐大身軀的神經末梢，似乎一切都要比身軀的其他部份慢了半拍。而由於新疆城鄉發展巨大的差距，少數民族、畜牧業、農村，在與漢族、農業和城市等中心相對應的概念裡，處於邊緣狀態的哈薩克族農村更像是神經末梢的裡最細微的那部份。在尤其是在當前的新疆，當社會的關注被國家主權、民族宗教等宏大敘事佔據的時候，「穩定壓倒一切」似乎佔據了我們思考新疆的全部而忽視了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們。與藏族、蒙古族等人口較多的民族比較，哈薩克族人口只有1,251,023人，在中國總人口中所佔人口比例非常小，僅為0.1%，容易被忽視。但是哈薩克族在新疆的人口中比較多，按照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哈薩克族佔新疆人口的比例為5.7%，是新疆第三大民族。<sup>15</sup>另外哈薩克族分佈的面積非常廣大，單是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就相當於兩個浙江省的面積，另外哈薩克族還廣泛分佈在新疆木壘哈薩克自治縣、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甘肅阿克塞哈薩克自治縣以及新疆其他縣的哈薩克民族鄉。由此看來，哈薩克族的研究與其在中國的重要地位並不相稱，除了中共建立政權初期實行民族識別時曾對哈薩克族做過整體的研究、編寫了一系列哈薩克族歷史和基礎讀物<sup>16</sup>以外，現階段新疆以外學者對哈薩克族研究的民族誌並不多見。新疆作為哈薩克族聚居區，

---

<sup>15</sup>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sup>16</sup> 中共建政後，按照其民族理論進行民族識別，並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持，編寫了《中國少數民族》、《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概況叢書》、《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等五種叢書。

當地學者對哈薩克族由游牧到定居的過程雖然論文多有涉及，但幾乎都研究不深，淺嘗輒止，對哈薩克族在定居之後畜牧業的發展多停留在宏觀角度，提出比較宏大的理論和解決方法，諸如「增加財政投入，發展畜牧科技」<sup>17</sup>等空洞的政策建議，缺少了對定居之後經濟發展的一手觀察和經濟發展中具體問題的分析，並沒有觸及問題最深刻的部份。如果說分佈在廣大國土上的農民、農村、農業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短板，那麼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就是短板中最短的這一塊。哈薩克族研究與其在中國重要性嚴重不符的現狀是促使筆者以此為論文題目的最直接的動力。

## 二、對中國鄉村研究做出新的反思與理論反饋

首先需要注意傳統研究中國鄉村的觀念、模式是否適用於整個中國，包括少數民族地區？如果否的話，那在研究寫作的過程中就需要更加嚴謹精確地來使用這些概念。對中國這樣龐大體量、地區文化差異跨文明體系的國家來說，只有通過對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研究才能全方位地理解中國。費孝通在回答社區研究的方法論時提到社區研究對於中國的意義，他在回應利奇（Edmund Ronald Leach）的批評時也提到，他並不以為一個農村社區的研究就能認識整個中國，「江村經濟」只是一個研究起點，他希望通過對不同社區的比較來「逐步接近」認識中國，其具體途徑是「類型比較法」：即將個案視作基於主要相同條件所形成的某種類型的代表，通過「類型」比較可以從個別逐步接近整體。<sup>18</sup>因而筆者對哈薩克族村落所做的觀察，雖然講的是一個天山腳下畜牧業村莊轉型發展的故事，但是依然可以從中窺探到中國鄉村一隅，從而能夠更全面地了解中國。

另外，前人對中國農村的家庭與家族、生產與生活、社區與權力、農村與國家等諸多方面做了非常有益的總結，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傳統人類學家的研究視野常常受到語言與時空距離以及政治敏感性的限制，而較多地集中在通達度較高的漢語地區。

---

<sup>17</sup> 阿德力汗·葉斯汗，《加快和完善新疆游牧民族定居的對策》，《新疆財經》2005年第1期，頁16-19。

<sup>18</sup> 王富偉，《個案研究的意義和限度——基於知識的增長》，《社會學研究》2012年第5期，頁161-183。

在此之上所產生與使用的概念，例如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sup>19</sup>很多研究者喜歡藉此來介紹中國的人際關係，卻忽略了費孝通所指的時代和地域背景是漢族傳統農村社會。誠然，「差序格局」這一概念的提出對我們認識和分析漢族的傳統社會無疑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但是這個從漢族鄉村社會產生的概念對分析哈薩克族定居的村莊的人際關係是否適用？所以，對哈薩克族村落的研究有助於豐富對中國農村社會運作模式的瞭解，並對既有研究中的很多理論概念進行補充或者修正，至少也可以闡明不同概念的使用時空限定。

為何一定要把文本的結構脈絡放在鄉村研究中而不是民族學研究呢？在中國，人類學與民族學、社會學這三個學科有著相似的研究方法與理論，但是他們所面對的研究對象卻又是不同，在一整套民族識別的國家話語下，研究少數民族的一切會被冠上「民族學」的帽子。筆者認為，民族一詞在中國的諸多語境中是用來特指少數民族的，比如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民族出版社、民族大學，因而民族學在中國往往被認為是研究少數民族的專業。在中國做的民族學研究，很容易陷入漢族對少數民族「異文化」研究的語境，而往往一個來自東北漢族在研究華南漢族的時候，卻並不帶有這種研究「異文化」的意味，雖然一個來自東北的漢族學者對華南的了解可能要遠遠小於新疆本地漢族學者對當地少數民族的了解。比如費孝通關於江蘇吳江開弦弓村的研究並不會被認為是民族學的一部份，但是研究任何一個少數民族村落會被認為是民族學。只有在研究漢族社會的時候，出現了「社會學」、「人類學」，並且這種學科的分野還不斷地出現在研究之中。

人類學的中國化是中國人類學的追求之一，但是王銘銘在其〈西學「中國化」的歷史困境——以人類學為中心的思考〉一文中，批評本土化後的「中國人類學」依附於國家體系，難以發展中國「內部的異文化視野」。王銘銘認為「『中國人類學』體現的是一種現代民族—國家的地理政治概念，而無法切實呈現中國內部語言—文化的多元性及華人語言—文化的超國家疆界性。」<sup>20</sup> 如何實現「人類學的中國化」，其實

---

<sup>19</sup>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第四章。

<sup>20</sup> 王銘銘，《西學「中國化」的歷史困境——以人類學為中心的思考》，愛思想網，網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13.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就遇到了中國的學界如何去研究中國境內的他者——既熟悉又陌生的非我族——的問題。筆者認可其提到中國內部的多元性，並認為想要打破這種既定的慣性思維，不再站在漢族與少數民族這樣二分的立場去研究哈薩克族村落，就需要將它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村莊。可能它的生產方式、語言、文化與其他地方不同，但是在中國，這樣的村落千千萬萬，我們必須熟悉千差萬別才是中國的本真狀態。因而以漢族與少數民族這樣的二元視角是沒有必要的。對一個哈薩克族農村來說，研究其定居固然涉及哈薩克民族特有的文化適應，但在其與國家力量互動的過程中所遭遇的村莊治理、政府決策、與國家互動等等都具有普遍性。筆者認同娜拉所說的「對新疆游牧社會所研究對象都需放到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整體框架中，來考察其與整體社會的關聯，還要研究諸要素之間的關聯。」<sup>21</sup>因而希望打破這種以民族為單位的研究範式，將哈薩克族鄉村的研究納入到中國研究中去，這也是本研究的著眼點為何是中國鄉村而不是游牧一定居過程。

### 第三節 文獻回顧

#### 一、傳統中國鄉村研究的方法與意義

中國的本土農村研究已經有悠久的歷史，在社會文化方面在福建，有閩籍人類學家林耀華先生的《金翼》，他用文學的體裁述說了兩個家庭在中國民間傳統文化與經濟背景下，面對急劇變化的傳統社會，如何調整適應讓家族獲得新的發展或因不能適應而日漸衰落。<sup>22</sup>筆者受於學識與能力的障礙，無法像林耀華這樣描述哈薩克族定居以後不斷在市場經濟中適應和碰壁的過程，不過仍然試圖在文章中用較為細緻的語言去描述村中日常生活的場景，以期能夠帶讀者走進哈薩克族。

<sup>21</sup> 娜拉，《清末民國時期新疆游牧社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20。

<sup>22</sup> 林耀華，《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的巨大轉型、傳統文化的斷裂與再造、中國家庭與新的土地制度、乃至於中國農民的私人生活、情感表達都成了人類學家重新理解中國社會、發現中國社會的落腳點，由此對中國農村的研究重新開始。黃樹民將他在福建的田野調查寫成《林村的故事》，以此鋪成一幅貫穿時空背景的社會文化變遷圖像，他揭示了在得改革開放風潮之先的福建沿海農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的情形下，一種全國性文化的抬頭，傳統上小型，半自治而獨立的農村社區，逐漸被以中央政府為主的大眾文化所取代，而在這個過程中傳統文化是如何延續的，村民如何依靠傳統獲得生活的意義與動力是該書的中心。<sup>23</sup>筆者也發現，哈薩克族鄉村雖然與內地一起經歷了中國幾十年來的各種社會變遷，其傳統的影響力依然存在，並且哈薩克族在傳統與現代、哈薩克傳統與漢族之間的拉扯讓不同的人選擇不同的人生道路。與《金翼》相比，黃樹民的研究時間與本文關注的時間更加接近，相同時間和政策背景下的東南村落研究有助於筆者對整體中國社會的理解。

而對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黃宗智曾經關注的長江三角洲為何在整整6個世紀裡農業一直徘徊在餬口階段，終於到20世紀90年代出現質的提升，終於使得農民的收入超過了僅能維持生計的水平。<sup>24</sup>雖然本文與黃宗智研究的對象不同，兩地卻面臨相似的問題；黃宗智關注的是長三角農業發展「內卷化」的原因，本文著力的是哈薩克族的畜牧業不論是在游牧階段還是定居階段，都無法擺脫「內卷化」的陰影。種植業與畜牧業雖然千差萬別，但是黃宗智文中對家庭生活、材料的整理和運用經濟學的理论給本文的寫作提供新的思路。從《江村經濟》開始，到後來抗戰時期對雲南三個村莊的研究，費孝通從東南到西南、通過對處於不同自然、歷史、文化時空的四個農村的調查，解剖了中國農民的家庭、生活、社區，指出中國農村敗落的原因、重新發展的動力，以及中國社會最底層最細微的農村與國家、世界貿易的關係。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費孝通又投入到鄉鎮企業的調查當中，重新思考引導中國農村發展的動

---

<sup>23</sup> 黃樹民著，素蘭、納日碧力戈譯，《林村的故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sup>24</sup> 黃宗智著，《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223。

力。<sup>25</sup>中原地區也有曹錦清依據對河南農村的紀實性調查所成的《黃河邊的中國》，作者用日記的形式反映了河南的農村發展現狀與重重矛盾。農民與基層政權的矛盾、鄉鎮企業與經濟大潮的矛盾、基層政權與國家權力之間的矛盾，曹錦清毫不忌諱地將河南農村的貧病與衰敗展示在讀者面前。<sup>26</sup>可能由於學科背景的區別，曹錦清並沒有像一般的人類學家那樣去分析農村問題的根本原因，卻提供了中國農村研究的詳實資料與走進農民的方法。

除此之外，中山大學人類學系、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都對中國農村的基層治理、傳統文化與鄉民社會、村民與公共權力等議題做了非常多有益的探索。由於這些研究大多在討論村莊自治和基層民主的問題，學界將其歸納為「三農問題」研究。「三農問題」也許是因為研究範圍的關係，常常通過諸如經濟發展、社會管理等具體問題表現出來，對中國鄉村的運行與農民的生活做過不少有益的研究，只不過這一部份的研究往往受到地域和語言的限制，常常集中在華南和華中，較少著墨於少數民族地區。哈薩克族定居其實屬於中國三農問題的一部份，尤其是筆者在田野時與基層政府打交道後，又重新思考「三農研究」對哈薩克族定居的啟發。既然筆者認為要將哈薩克族定居放在中國研究的視野中，就必須重視在中國鄉村發揮極大作用的基層黨政機構；推動執行高層政策的時候，他們發揮著或明或暗的作用，成敗的關鍵也往往在他們身上。

上述中國鄉村研究為鄉村研究提供了家庭、權力、空間、與國家的互動等多元角度，也是我第一次將目光對準哈薩克村落時候主要參考的結構模式。並且，以上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研究文本的呈現方法與結構，他們的研究沒有一般性的「文本+理論+分析」式的結構，而是在不斷的敘述中將文本與理論與分析有機集合，甚至《金翼》用小說式的書寫方式不斷提醒我如何將民族誌更好地呈現，努力實踐「優秀的民族誌學者都是小說家」這句話。

---

<sup>25</sup> 費孝通改革開放後將注意力轉移到鄉鎮企業上來，出版了《論小城鎮及其他》（1986）、《行行重行行》（1989）等著作。

<sup>26</sup>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

## 二、草原牧區的研究成果

在新疆哈薩克牧民定居的研究中，既要看到研究中國村落的普遍性，但絕不可忽視個案的獨特性，尤其是對與漢族傳統村落研究差距巨大的哈薩克族村落來說。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教授約翰·朗沃斯(John W. Longworth)和昆士蘭初級產業部官員格立格·威廉姆森(Gregory J. Williamson)合著的《中國的牧區》，論述了中國牧區的綿羊和羊毛、少數民族、草原退化和持續性發展等問題。1998年出版的Linda Benson和Ingvar Svanberg合著的*China's Last Nomads*將視野對準蘇聯解體之後的內亞草原，讓讀者對哈薩克族的歷史和文化有了全新的感知。該書大致介紹二十世紀的中國以及被中國當做一個少數民族的哈薩克族的狀況。<sup>27</sup>本書並沒有針對哈薩克族的具體問題深入分析，該書還討論了中國的相關政策以及哈薩克斯坦獨立後的影響，可以作為了解中國哈薩克族基本情況的入手資料，卻沒有給研究者更多討論哈薩克族經濟方式轉變的機會。

一年之後，杜克大學出版*The End of Nomadism?*一書，Caroline Humphrey和David Andrews Sneath兩位學者深入俄羅斯西伯利亞、蒙古和中國西北，在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對中亞草原游牧生活的浪漫想像之外，也嚴肅地提出，中亞的游牧民族面對社會、政治、環境和經濟的劇變，不得不改變他們適應了大半輩子的生活方式。在對三國游牧民族的對比中，他們發現，不同的文化在面對可持續發展時候表現出來不同的態度，強調了原本社會和文化在前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性。<sup>28</sup>Caroline Humphrey和David Andrews Sneath兩位學者的觀點在其他研究定居的研究中也被廣泛贊同，傾向於認同完全割離傳統並不能幫助牧民適應定居之後的現代化，不論是社區組織還是牧民心理，我們都傾向於建立一個與當地的歷史與生活方式連結的現代化；並且作為研究者也必須了解到歷史對這些的影響。

---

<sup>27</sup> Linda Benson and Ingvar Svanberg, *China's Last Nomads: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s Kazaks* (New York: M.E. Sharpe, 1998), p. 45.

<sup>28</sup> Caroline Humphrey and David Sneath, *The End of Nomadism?: Society, Stat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松原正毅在2002年出版的《游牧世界》是一本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民族誌，游牧民在定居以前的生活狀態是與定居後作對比研究的基礎，<sup>29</sup>因而本文的民族誌資料是我在後續研究中的重要參考。

中國大陸方面，劉鑫渝在《土地制度變遷視野下的哈薩克牧區社會》一書中論證了哈薩克牧民不斷在國家政策變遷下的調適。本書以土地變遷為主線，用歷史資料分析哈薩克族土地變遷的歷史過程、階段性特徵、並關注哈薩克族社會的土地改革和與土地改革伴生的社會工程的運行邏輯與運行績效。郝時遠、奧塞·科拉斯和扎洛主編的《當代中國游牧業》一書，內容充滿理性思索又與中國牧區實際相結合，提出了中國游牧業的諸多思考，例如作為生態移民方式的定居是否真的是環境保護的最有選擇？游牧文化保護與牧區的現代化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生態移民下的牧民如何重新發展經濟？牧民的文化傳統能對游牧的現代化起到什麼作用？<sup>30</sup>這些問題對筆者在反思金村未來的時候給了更多的視角。

新疆大學周亞成以昌吉州呼圖壁縣胡阿根村為例，對哈薩克族定居前後的文化生活、轉型過程中出現的貧富差距等巨大變化做對比式研究。<sup>31</sup>哈薩克族學者阿德力汗·葉斯汗從游牧到定居、新疆牧區新農村建設的現狀與對策以及加快和完善新疆游牧民族定居的對策等方面提出了策略性的見解。<sup>32</sup>不過阿德力汗的論文只分析了新疆牧區的現狀，以及他認為應該採取的對策，雖然這些建議具有建設性，但是如何落實這些建議才是筆者本文關心的焦點。此外，聶愛文的《定居、牧民生活以及適應策略》、新疆師範大學張貴華的碩士論文《現代化視閥下新疆哈薩克族定居及文化調適》研究，都寫到新疆哈薩克族定居充滿困境與希望的未來、轉型與傳統的糾葛。但是很遺憾，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幾乎都停留在哈薩克族定居現象的表面，告訴我們牧區存在什麼問題，並沒有深入到哈薩克族氏族因素、村莊人際關係、定居村落中的權力運行等核心

<sup>29</sup> [日]松原正毅，《游牧世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sup>30</sup> 郝時遠、〔挪威〕奧塞·科拉斯、扎洛主編，《當代中國游牧業：政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sup>31</sup> 周亞成，《哈薩克族經濟轉型中的貧富差距調查——以胡阿根村哈薩克族為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頁42-46。

<sup>32</sup> 阿德力汗·葉斯汗，《新疆牧區新農村建設的現狀與對策》，《新疆財經》，2008年第4期，頁18-21。

層面來分析不同的生計方式對一個游牧民族顛覆式的「再改造」。對少數民族的研究還比較粗糙，田野調查也不夠深入，對問題的解釋還停留在文化變遷與適應性層面，忽視了不同的文化背景與國家層面的大歷史對基層社會的影響。

另外，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持的「民族地區典型百村調查」也對新疆布爾津縣杜來提鄉阿合達木村進行了調研並形成報告出版。<sup>33</sup>該系列書籍並不是完全學術型的論文，雖然存在與上文提到的書籍有相同的問題，但是此套書的田野工作比較紮實，給哈薩克族定居村落一個全面生動的展示，對其他研究者初步作為進入田野場域前的大致瞭解是有所幫助的。

與漢語村落龐大並且優質的研究相比，新疆哈薩克族的研究顯得單薄，不僅僅是數量上不可比擬，質量上也是處境堪憂。有關牧民定居是一個從生態、生產直到文化變遷的系統性工程，尤其是90年代後期開始，學界越來越認識到畜牧業的定居不僅僅是人從「逐水草而居」變成長期住在磚瓦房裡，而是整個生產方式的變化。哈薩克族定居後到底是如何發展經濟的，怎樣才能致富，這是筆者寫作本篇論文的初衷。

---

<sup>33</sup> 馬媛、古麗夏·托依肯娜，《從游牧到定居：新疆布爾津縣杜來提鄉阿合達木村調查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 第二章 初識金村

### 第一節 金村所處的環境

2014年的10月，我第二次來到新疆。與第一次旅行可以走過新疆許多城市不同的是，這一次我需要在一個天山北麓的哈薩克小村子裡住上兩個月。要找到一個合適的田野地點並不簡單，新疆那麼大，單純以哈薩克族的自治區域來說也有20幾萬平方公里。有時候作為一個學習社會科學的人說「感謝緣分」似乎顯得有違「科學」二字，但我不得不說確定一個合適的田野地的過程，真的帶有一絲賭博的感覺。誰也不知道在選定田野地後是不是真的與去之前擬定的調查大綱相符合，經常發生的情況就是，調查後發現自己對田野地的設想大多數都是錯的。

我希望找一個稍有定居經驗的村莊，距離大城市不是特別遠意味著擁有一定的銷售市場，又適宜發展農業。這樣的標準是比較適合筆者的論文選題設定的——一個定居後的村莊要如何發展經濟，直接受到城市輻射的城郊村落或者太過偏遠的村莊都不具有經濟發展上的代表性。在確定了這些最基本的條件後，就開始了搜索之路。我在微博（社交網絡）上以「哈薩克」為關鍵字，希望認識一些哈薩克族的朋友或者搜索到一些地方政府的互動平台，然後找到了金村所在的民族鄉的官方微博，<sup>34</sup>通過網絡搜索找到一些資料——距離烏魯木齊218公里，不屬於天山北坡城市帶卻也不是特別遠；鄉所在的奇台縣是新疆的農業大縣，具有發展農業的優勢；該鄉哈薩克族比例為77%，哈薩克族人口比較集中。可是如何進入這樣的田野地呢？筆者憑藉一股衝動，準備到烏魯木齊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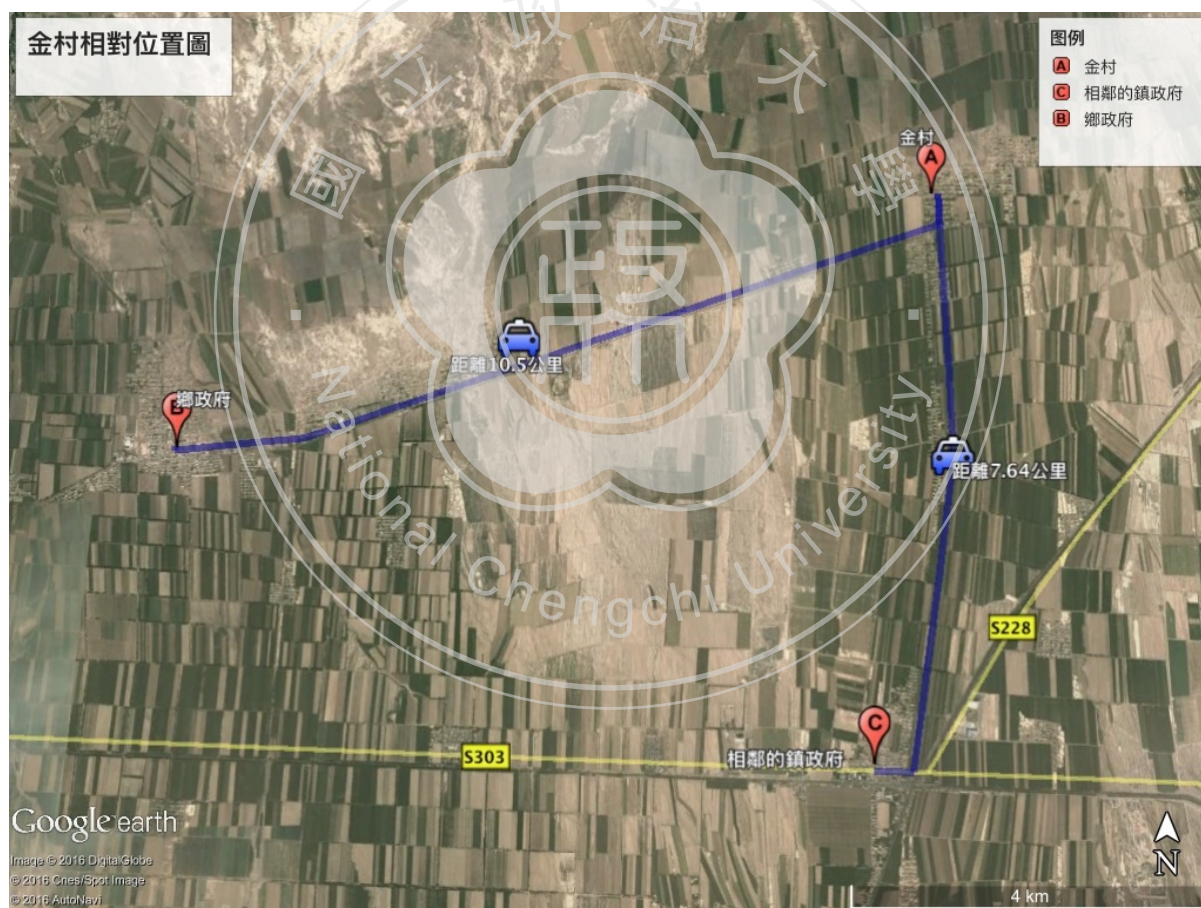
到了烏魯木齊，找到了我之前通過網絡認識的朋友，他將我介紹到他的一位朋友家中，也就是後文我提到的黃村的根叔家中。在根叔家住了一個禮拜，終於確定了調查地點就在黃村不遠處的金村，就這樣經過各種朋友的牽線搭橋，我住進了金村黑叔的家中。

---

<sup>34</sup> 為遵從研究倫理，本論文田野地點的相關姓名與地名都為化名。

金村位於奇台縣的東部，距離縣城23公里。金村的交通還算方便，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向東可以去鄉政府，向南可以去另一個鄉鎮，叫林鎮（見圖 2-1）。林鎮由於省道穿過，又是拉煤司機休息的中轉站，因此要比卡扎鄉更加熱鬧，店舖更多，也有銀行、浴室、醫院等機構。儘管如此，村民也很少去林鎮或者是卡扎鄉，村民們日常消費的蔬菜水果一般都從村中的小賣部採購了，金村這樣的村莊有三個小賣部，其實競爭還是比較激烈的。稍微大件的東西，村民都願意花10元錢坐車去縣城買，也就順便將其他的生活物資都買回來了。

圖 2-1 金村與附近兩個集鎮的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圖為筆者根據谷歌衛星地圖製作。

金村作為奇台縣的一個村，整體的自然環境、享受政策和發展前景都與奇台縣密切相關，為了使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文章內容，筆者有必要介紹金村所在的奇台縣的基本情況，讓讀者對金村所處的經濟和社會位置都有大致了解。

金村所在的奇台縣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東北部，天山北麓，準噶爾盆地東南緣，縣城西距烏魯木齊市195公里，距自治州州府昌吉市234公里，是新疆昌吉州的邊境縣。奇台縣歷史悠久，曾經是古絲綢之路北道上的交通樞紐和重要商埠，曾與哈密、烏魯木齊、伊犁齊名，並稱新疆四大商業都會，有「金奇台」、「旱碼頭」之美譽。

奇台是新疆的農業大縣，擁有比較好的自然環境，在天山和沙漠之間是廣闊的平原，擁有可耕地200萬畝，年播種面積187萬畝。配合相對較好的水資源，奇台成為新疆重要的糧食基地。金村村民在定居之後擁有土地，不但可以從事原有的畜牧業，還擁有較好的從事種植業的基礎。

奇台縣從南到北地理環境獨特，地形地貌複雜多變。南部天山山脈橫亙，冬天白雪皚皚，但是一到夏天，水草豐美，成為牧民的夏牧場，在清末民國時期就是北疆有名的大牧場之一。<sup>35</sup>除了分佈在天山的山地草原草場，奇台還分佈有9種荒漠草場，分別是乾旱荒漠草場、山地荒漠草場、草原化荒漠草場、山地草原化荒漠草場、山地荒漠草原草場、山地草甸草原草場、低地草甸草場、山地草甸草場、高寒草甸草場。<sup>36</sup>牧民將草場劃分地越細緻，就能夠更加精細地按照牲畜的生長期和氣候使用不同類型的草場，提高草場資源的利用率。

奇台擁有煤、花崗巖、鐵、金、銀、銅、芒硝、石墨、石灰石、膨潤土、珍珠巖等20余種礦產資源。特別是煤炭資源儲量豐富，有新疆四大煤田之一的準東煤田75%的資源，預測資源儲量2808.4億噸，是目前已探明中國大陸最大的整裝煤田；花崗巖礦藏儲量巨大，石材質地優良，「卡拉麥里金」品牌享譽區內外，現已建成自治區級特色產業園區——閩奇石材產業園——在國務院下達給各省的援疆計劃中，奇台以及其所屬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屬於福建省的結對地區，閩奇石材產業園就是福建省的援建開

---

<sup>35</sup> 娜拉，《清末民國時期新疆游牧社會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頁118。

<sup>36</sup> 奇台縣史誌編纂委員會，《奇台縣誌》（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頁118。



發項目之一。<sup>37</sup>關於這些內地省份的援建項目對奇台當地的影響和作用，筆者將會在第二章繼續論述。奇台縣近年來充分利用對口援建和本地的自然資源，通過招商引資、吸引外地企業，以此來拉動奇台經濟的發展。

新疆的地形就像「疆」字，北面是阿爾泰山，中間是天山，其間是準噶爾盆地。天山和南邊的崑崙山之間是塔里木盆地。天山山地的年降水量，同一山坡自西到東，逐漸減少；山地迎風坡（北坡）多於背風坡（南坡）；山地內部盆地或谷地少於外圍山地。天山北坡的年均降水量多在500毫米以上，是中國幹旱區中的濕島。受水資源條件的影響，天山北麓形成了新疆最大的城市帶，該地區是新疆城市最密集的地區，也是新疆現代工業、農業、教育科技最發達的地區。<sup>38</sup>奇台縣受到天山北坡經濟帶的輻射，靠近新疆內部最大的消費市場，對經濟的發展具有一定的作用。

## 第二節 金村的定居歷史

筆者偶爾從金村坐車去縣城圖書館查閱資料，一路上可以看到筆直的公路兩邊種滿了高大的白楊樹。時間已經是初冬，田裡的作物都已經收割完，不像夏天時這裡一望無際的麥浪、玉米和向日葵。收割完的田裡矮矮的有一層層的秸稈，大概有膝蓋這麼高，有些已經被初雪覆蓋，匆匆而過看不出夏天時候種的是什麼，只是有些羊群在覓食。除了兩邊乾枯而遒勁的樹，田裡的樣子倒是有點像我的家鄉浙江。不過金村這裡的公路都是筆直的，公路兩邊分佈著一個個村落，房屋整齊劃一，讓我意識到這與我的家鄉彎彎扭扭的公路的不同之處。在浙江一般是先有村落，然後再修建公路將散落的村落連接起來，而在這裡，則是先有公路，然後政府為了牧民出行的方便，將定居的村落地點安排在了公路兩邊。

<sup>37</sup> 《福州產業援疆成就奇台「卡拉麥里金」》，昌吉新聞網，網站：<http://www.cjxww.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413&id=49576>。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sup>38</sup> 陳畢業，《構建中國新疆天山北坡經濟帶》，《中國軟科學》，2002年第3期，頁92-95。

金村的附近有一個叫黃村的村子，我剛來的時候由於種種原因，並沒有住在我此次田野的金村，而是住在距離金村2公里以外的黃村。黃村的哈薩克族在1980年代從外地遷回新疆，其中的乃蠻部落就定居在奇台縣的卡扎鄉，並將村莊取名為黃村。所以，黃村的村民定居在這裡，也有將近30年的時間了。在進入田野以前，黃村並不在我的研究範圍裡，後來更多地了解了金村的情況之後，發現黃村作為一個比它更加年輕的村莊，還是有許多可以對比之處。後來為了調研的方便，我從黃村搬到了金村，卻也時常回去看看我的前任房東。在黃村與金村中行走，雖說都是定居的哈薩克族村莊，但是細心的人還是能感覺到兩個村莊的不同之處：在金村，大家普遍都會有泥土夯築而成的圍牆，而黃村基本沒有圍牆或者有也是簡單的木樁加鋼絲網；金村中的民居新舊參差，既有政府統一新建的也有20年前的泥牆房，而黃村則是比較統一的磚瓦房；金村中行道樹甚至也比黃村的要大，一棵棵白楊樹參天而上，不像黃村的還是半大的白楊樹。和黃村一對比，似乎很明顯就感受到兩個村莊不同的年齡，如果以黃村建立的1984年為基點，金村的歷史只會比他更早。我希望通過金村與黃村的對比，讓讀者更加直觀地了解到金村定居的歷史更長。

雖然村中的口述史並不能完全講明白村落是何時開始的，但是由金村在當地還是被稱為某某小隊，說明這是一個經歷過人民公社化的村落，而我的報導人黑叔說他出生在這裡，則更加說明金村相比於周圍一片新定居的村落，具有「老大哥」地位。在縣誌上可以看出，最晚到民國年間，這裡仍然是「人煙稀少，一片葦湖」，哈薩克牧民也只是把這裡當做臨時性的牧場放牧。<sup>39</sup>對金村來說，定居的過程並不像這幾年才開始的大規模定居工程。1917年的時候有一部份從沙俄進入中國新疆的哈薩克族人到了奇台北塔山地區，其後人口緩慢遷入與自然增加，到1943年奇台共有哈薩克族5614人。其後又不斷有哈薩克族從清河、富蘊、木壘遷入，到1949年共有哈薩克族8283人。到1958年，有2400人在巨奎帶領下遷往清河縣，以後陸續又遷出一些，1959年的時候奇台全縣只剩下4385名哈薩克族人。<sup>40</sup>奇台哈薩克族人口持續地遷入遷出，破壞了哈薩克族的氏族部落結構。

---

<sup>39</sup> 奇台縣史誌編纂委員會，《奇台縣誌》，頁60。

<sup>40</sup> 奇台縣史誌編纂委員會，《奇台縣誌》，頁589。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著社會的日益穩定，越來越多的牧民從附近的南山（天山）和北塔山遷出來定居，政府也將後來牧民定居的安置點設置在這裡，在1958年金村所屬的公社牧場成立時，已經擁有4個生產隊，433戶、2120人，哈薩克族占78%，耕地3000畝，4道坎爾井。<sup>41</sup> 由於歷史原因，在縣誌上沒有記載金村的數據，只有金村所在的卡扎鄉在1958年時候的數據，以金村2011年全村405戶，1611口人<sup>42</sup>的規模看來，一個村的人口幾乎要趕上50年前全鄉的人口，這些年人口增長非常迅速。金村的400多家庭和1600多人中，大致可以以35歲作為分界，35歲以上的成年人一般都有兩個孩子組成核心家庭，35歲以下的則獨生子開始增多。90%以上的村民都以傳統的畜牧業為生，少數年輕人也會做裝修、跑運輸、開理髮店、或者是小賣部。但是儘管從事其他副業，村民還是習慣在家中養羊、養牛。

金村是有清真寺的，只不過金村的清真寺在村中的存在感非常低。村民們除非重大的宗教節日，平時不去清真寺，也不嚴格遵守伊斯蘭教一日五次禮拜的要求，甚至幾乎不做禮拜，只是在飲食上遵守穆斯林的生活方式。相比穆斯林，金村的哈薩克人更加強調自己的哈薩克族身份，村中的人喜歡拿手機告訴我他如何在手機上看哈薩克斯坦的娛樂節目、喜歡告訴我他們與哈薩克斯坦人可以無障礙交流，手機聊天軟體喜歡用哈薩克斯坦總統的頭像，家中會掛著哈薩克斯坦地圖。對金村的村民來說，哈薩克族的身份要比穆斯林的身份更加具有識別性與重要性。傳統上，哈薩克族對伊斯蘭教的信仰就非常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游牧民族由於生活的不便，清真寺在哈薩克族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並不明顯，無法形成定居後村中輿論與生活的公共空間。不像在甘肅青海回族、撒拉族聚居區每天早晨被清真寺的宣禮喚醒，在金村依靠的反而是鬧鐘。

哈薩克族定居的原因在我看來是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牧民自發的需求與政府需求綜合作用的結果。首先是自然而然的定居。農業在牧區古已有之，諺語「挖渠一輩子富不了……吃口袋糧的人永不得飽」可為證。因天災人禍，「棄牧從農」者不在

---

<sup>41</sup> 奇台縣史誌編纂委員會，《奇台縣誌》，頁60。

<sup>42</sup> 與副鄉長的訪談資料。

少數，以一水源地為中心，相互協作形成地緣性的社會群體——村落。<sup>43</sup>其次，在1949年之後到1978年之前的這段時間裡，政府鼓勵自己產糧，因而鼓勵哈薩克族開墾草場。在1950年代「以糧為綱」，「不向國家要口糧」的大躍進中，為了因應人口增長而增加的糧食危機，政府鼓勵與牧民的需求聯合起來，開始在本地定居，在放牧的時候也生產糧食。再次，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施的牧業政策，極大地調動了哈薩克族牧民的生產積極性，由此牲畜逐年遞增，是草場顯得十分緊張。特別是天旱年景，牲畜越冬度春缺草少料，情況十分嚴重。因而廣大牧民紛紛要求實行定居、定牧，改單一的牧業生產為農牧兼營，有一部分牧民為抵禦自然災害，開始在劃定的放牧範圍內修剪永久的牲畜棚圈，並用木頭壘起簡易房舍，實行半定居、半游牧的生產生活方式。<sup>44</sup>這一舉動引起縣委、縣人民政府的極大重視。1985年春，縣人民政府劃出泉水地區的二馬場作為牧民定居開發點，安排半截溝鄉和吉布庫鄉的牧民來這裡建村種田。經過多方配合當年就有牧民二百戶計1200人從深山老林搬到泉水地區二馬場定居。同時，東灣鄉也動員部份牧民到泉水地區的大泉湖定居。1985年，全縣2122戶名中，實行定居的有1127戶，占牧民總戶數的53.17%。定居牧民既種植、又養殖，不僅解決了牧民以往口糧靠國家返銷的問題，而且出現了定居牧民向國家交售餘糧的新事。<sup>45</sup>從卡扎鄉逐漸定居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政府的游牧定居政策倒不是近年才忽然開始大規模行動，應該說國家層面對游牧如何過渡到現代化的想法早就有了，根據中國政府的觀念，這種游牧方式被認為是落後的和不合時宜的。這不是一個全新的問題，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被提出來，只是在近些年面對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國家能力和財富也日益增長，大規模的定居被提上日程。

所謂定居，主要就是生產方式資料的固定。自從擁有了土地，哈薩克族不用再像以前一樣逐水草而居，因為土地是帶不走的，對種植業來說這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溫春來認為，漢族生產方式的進入和人口的增加導致了清朝貴州彝族地區農業生產由

---

<sup>43</sup> 羅意，《我國哈薩克族基層社會組織探析》，《伊犁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6月第2期，頁1-4。

<sup>44</sup> 奇台縣史誌編纂委員會，《奇台縣誌》，頁405。

<sup>45</sup> 奇台縣史誌編纂委員會，《奇台縣誌》，頁405。

畜牧到農耕的轉變，<sup>46</sup>我們可以看到哈薩克族在國家政策的主導下也經歷了從畜牧到農耕的過程。不過由於哈薩克族原本生產方式與貴州彝族相比，游牧的傳統更加濃厚，在人口膨脹之後，新疆在將農田開墾之後並沒有完全轉變為農耕，而是建立在農耕基礎之上的畜牧業。<sup>47</sup>那麼定居之後如何能夠將種植業與哈薩克族傳統的游牧業結合起來？於是發展出本地種植業加畜牧業的模式，也就是定居畜牧業。農業是人類有目的地種植植物（包括菌類）或畜養動物，生產出有用農作物或牲畜的產業，被劃分在第一級產業。廣義之農業包括種植業、林業、畜牧業及漁業。在本文中如不另外說明，採用種植業與畜牧業的概念。

雖然說金村的哈薩克族擁有了土地，而他們的經濟來源並不主要依靠種植業，或者說他們正是這種種植業模式的犧牲品。因為生產方式的變化間接地從哈薩克人手中剝奪了土地的使用權。「原本都是草場嘛，後來被開地了，有些就開礦了」村民抱怨的話，其實正是哈薩克族陷入貧困的原因之一。當政府將原本的草場用來開地，將畜牧業轉化成農業的時候，原意是因為種植業的效益是要高於畜牧業的，但是習慣了畜牧業的哈薩克人並不適應種植業，不論是種植業的這種高勞動投入還是技術投入。所以在佔用了哈薩克族草場開地轉化成種植業之後，反而土地從不適應種植業的哈薩克族手中流失，流向了有種植業傳統與技術的維吾爾族、回族與漢族手中。關於土地的使用權，草場開地之後還有一部份在哈薩克人手中，而草場在開礦之後，則無疑讓這種土地的剝奪感更加明顯，尤其是這些工礦企業並沒有僱傭當地的哈薩克人，這種狀況我將在下文一章中繼續指出。

---

<sup>46</sup> 溫春來，《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8）頁267—274。

<sup>47</sup> 奇台縣史誌編纂委員會，《奇台縣誌》，頁405。

### 第三節 市場化的社會

「雖然沒有內部貿易的經濟必要性，草原卻有對外貿易的經濟必要性」。<sup>48</sup>在游牧社會中，牲畜成為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各個環節中唯一的中心，畜牧業成為游牧民族經濟生活的主體。但畜牧業不能完全滿足游牧民族社會生活的全部需求，需要其他行業來作為他們經濟生活的重要補充。

游牧生活的秘密是人對動物的管理：羊、駱駝、牛、馬和其他野生動物，人們通過畜牧養殖和獵取野生動物獲得他們的衣食住行所需，以馬為代步工具，以牲畜的糞便為燃料。原始的游牧社會可以如此生活，而當現代化商品化的閘門一旦被打開，工農業社會的產品就如洶湧的洪水一般衝進來，再也退不回去。通常情況下，一系列不同的因素影響著牧民的市場參與，Carol Kerven 認為這包括家庭的內部因素和牧民所處環境的大背景對牧民施加的外部因素。<sup>49</sup>內部因素有：（1）牲畜作為財富存儲形式固有的增值特徵——牲畜群不規律地影響著出欄量，從而影響到可能的市場參與水平；（2）家庭生產需求（以及家庭消費與市場交換相比的好處）在多大程度上約束著牧民的牲畜銷售水平。外部因素包括一系列影響牧業環境的因素，從氣候災害到家畜疾病到土地政策、基礎設施、市場發展、城市需求、價格和稅收政策。筆者認為，（1）和（2）屬於內部因素中的一體兩面，Kerven描述的應該是一種更加原始的完全基於游牧經濟之上的環境因素，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牲畜的生產首先主要是為了家庭的日常消費，只有在家庭消費滿足的時候，才有多餘的牲畜被投放到市場中，而當一定的時間內，家庭每年消費的牲畜總量是可以預見和控制的，而不受控制的則是牲畜不規律地出欄量，因此出欄量得以構成影響牧民市場參與度的主要內部因素之一。對金村已經定居的村民來說，由於家庭資產的多元——主要是分給的土地——牲畜不再是唯一的生產資料和財富象徵，因而牧民的生活來源內部因素對影響牧民市場參與的程度並

---

<sup>48</sup> [美] 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49。

<sup>49</sup> Carol Kerven, *Customary Commerce: A Historical Reassessment of Pastoral Livestock Marketing in Africa*, ODI Agricultural Occasional Papers15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1992), p. 53.

不佔有主要地位，村民飲食結構的多樣也改變了基本食物全部來自於畜牧業的傳統，因而牲畜出欄量的不規律波動可以被外部市場的調節消弭。因而對金村村民市場參與度主要的影響因素更多的來自於外部，比如牲畜的價格、物流、市場需求。筆者在金村觀察到的情況是，牧民常常會因為急需現金不得不做出妥協，臨時以低價賣出牲畜。這與以前漢族農民會以自己的田產做抵押從而失去生產資料一樣，雖然違反了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並且，由於村民已經被捲入市場，當外面的商品不斷湧入，牧民為了滿足外界帶來的物質需要，便不得不參與到這市場交換中去。

根叔是一位退休在家的鄉村教師，也是我在田野過程中的第一位報導人。他的女兒將要在近期結婚，我也在暗暗期待見識一場真正的哈薩克婚禮，也見識一下傳統哈薩克族的嫁妝。一天中午來了一輛大卡車，下來幾個工人，忙忙碌碌將車上東西搬下來，原來都是他女兒瑪依努爾的嫁妝：雙開門的名牌冰箱、索尼的液晶電視，全自動滾筒洗衣機、成套的傢具和各種鍋碗瓢盆等生活用品。放眼望去，家中的陳設無一不是用錢買來的，從有形的電器碗筷商品到無形的移動通信之類的服務，乃至於炕上鋪設的毯子，也基本上是買來的地毯而鮮有哈薩克族傳統的氈毯。根叔的女兒瑪依努爾清點著辦下來的嫁妝，無意中透露這些都是從烏魯木齊買來的。我很驚訝，驚訝的不是說現代哈薩克族的嫁妝和內地無疑，而是方便的物流竟然可以將這些大型的家用電器從烏魯木齊送到230公里以外堪稱偏遠的家中，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在我看來完全可以在縣城購買的這些傢具竟然要去烏魯木齊買。而瑪依努爾卻覺得烏魯木齊「東西多，也更上檔次」。其實村民的生活早就已經被全方位地商品化了，而商品化對本地來說，則是一把雙刃劍。理論上來說，本地的村民將農業上的產出賣出，換取金錢來購買工業產品，這是農業在打破自給自足的小農模式後的普遍模式。

農村的發展悲劇，不在於封閉，也不在於被捲入商品市場，而是在於被捲入商品市場之後的無力反抗。我不情願拿金村與費孝通《江村經濟》所描述的20世紀30年代的江南農村做比較，那是一個外國商品輸入，將本地手工業擠垮的時代，這讓我想起內部殖民主義，雖然金村的狀況其實與江村差不多。他們必須養殖足夠多的牲畜，換來錢之後向市場購買工業品。而他們所創造的農產品的銷路卻是問題，由此我們看到的更多情況就是農產品的賣出不足以支付農民購買二三產業的產品，單純造成了農民

手中金錢的外流，這種不對等的交易造成了農民的貧困。而物流的發展對本地造成的影響，一方面是村民交換半徑的擴大，理論意義上村民的賣方市場也相應擴大，實際上則是買方市場單方面的。而此地游牧到定居的哈薩克族被捲入商品化社會相比內地農村的漢族，金錢流失的情況更加嚴重。兩相比較，我認為體現在哈薩克族農民與漢族農民的庭院經濟上。漢族農村雖然更早被捲入現代化的經濟生活當中，但是依然保留相當一部份的自給自足，漢族家庭的院子一般養雞，養豬，種菜；而哈薩克族的院子中則是羊圈和牛圈。原本用於家庭副業生產的土地被用來從事主業，家庭副業的發展影響到了牧民生活的供給，最基本的蔬菜需要花錢來供應而牧民在有其他經濟壓力的情況下，只好減少蔬菜的攝入；日常生活中雖然學會了維吾爾族的湯飯、拌麵等飲食習慣，湯飯、拌麵的佐料卻遠遠不如維吾爾族這樣的農耕民族豐富。拌麵佐料不如其他民族豐富，卻也可以粗茶淡飯過日子，而當今社會人們已經不再滿足於吃飽穿暖，生活質量的提高需要更多的財富去和市場交換，就如同根叔的女兒需要結婚一樣。村民們每天看著哈薩克語翻譯過來的電視劇，在北京上海東部大城市裡的生活，或者僅僅是去過烏魯木齊和奇台縣城的人都不會將自己的生活滿足於有飯吃的程度。更何況隨著基礎設施的推進，電力、通信、有線電視等等現代服務都成為了生活必需品，卻並不是牧民可以通過畜牧業直接獲得。相比於在山上牧場的游牧生活那種原本就對物質需求不高的情況，定居後的牧民本身對物質生活的要求也水漲船高。

而另一件讓我感到村子商業化傾向的事情，則是我的第二任房東黑叔帶我見識到的。有天早上大家正在悠閒地喝著奶茶，黑叔接了個電話，說到「小王，快喝，喝完帶你去玩。」我也已經習慣每天像跟屁蟲一樣跟在黑叔後面，便匆匆放下碗跟著他出門。在路口等了不多久，就看見一輛小貨車開來，我條件反射一樣地用哈薩克語打招呼，副駕上的人卻和我說他是漢人，一路上黑叔和他用漢語聊了起來。感謝在蘭州的四年時間，讓我可以熟悉西北方言，也得以全程見證了這次交易。不一會兒，車到了目的地，其實就是村東的一戶人家，女主人從主屋出來，帶著我們走進飼養棚，我看見一匹瘦骨嶙峋的病馬躺在地上。主人想要出售這匹病馬，和來的客戶討價還價。客戶一口咬定500元成交，主人卻還想往上提提價。她一個勁地說著「倒楣！倒楣！」又大吐苦水說這匹馬看病花了幾千塊還是治不好了，現在不能給主人帶來更大的利益，



也只能發揮唯一的剩餘價值了。見客戶態度堅決，女主人打了個電話與男主人通氣，然後我就見證了這筆交易以500元成交。回家的路上，那位回族商人給黑叔100元錢，我明白那應該是介紹費吧，同時也知道為何整個交易過程如此順利，因為之前已經和賣家基本談好，免得買家白跑一趟。原來村中人情關係的介紹現在也要收取勞務費了，稍微一下就能賺100元，也讓我深感哈薩克農村捲入市場化的程度之深。

以筆者的觀點來看，這無疑是村中社會關係帶上經濟效益的特徵。原本只是鄰里之間的互幫互助，現在也帶上了明顯的經濟色彩。而在村中的生活狀態時時刻刻提醒著我，這個村莊並沒有富起來。這不禁讓人懷疑，定居是否真的就能讓牧民富裕起來？定居和富裕真的直接有關係嗎？按照中國政府的邏輯和政策，新疆本地的氣候、水文、土壤等自然條件不能滿足游牧業繼續發展的需要。天然草場隨著牲畜的增加，不斷遭到破壞，而牧民生活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也不能單純建立在游牧業的發展上。況且，牧民本身也有定居的需求，如何能夠提升畜牧業的發展水平，擴大畜牧業的規模？於是，參照規模經營的經驗，專業種植草料。從這些角度，我們不難理解官方的定居政策。但是政策在執行的過程中，卻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並沒有得到良好的效果。如果從1985年官方開始有意識地引導村民定居到現在，近30年的時間過去，效果似乎可以用「路漫漫其修遠兮」來形容。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促成的，而文章將會在以下幾章繼續分析。

## 第三章 定居的官方邏輯

### 第一節 定居的生態邏輯

游牧民族與其傳統畜牧業以草原生活和生產空間。草原生態系統是以各種草本植物為主體的生物群落與其環境構成的功能統一體。中國擁有各類天然草原，占國土面積的41.7%，是面積最大的陸地生態系統。<sup>50</sup>中國的四大牧場，分別為內蒙古、青海、西藏和新疆；根據自然條件和生態學的差異，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類型：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

中國草原分佈在從東北到西北和青藏高原的廣大地區，主要就是拉鐵摩爾所說的「中國的內陸亞洲邊疆」。這些草原分佈的地區，有沙漠戈壁也有高山高原，生態比較脆弱，因此這些地區的草原對生態保護和生態多樣性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草原的主要功能有：防風固沙、防治沙塵暴、水土保持和水源涵養、調節氣候、淨化空氣等。

但由於部分地區滿負荷、超負荷的開發利用，部分草原生產功能逐步喪失，生態環境惡化，草原退化、沙化、鹽漬化、石漠化現象嚴重，幹旱、鼠蟲害等時有發生，嚴重影響了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生態環境安全。20世紀70年代中期，全國退化草原面積約占草原面積的15%，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增加到30%以上，90年代中期達到50%以上，到21世紀初已增加到90%，其中中度以上的退化草地面積占半數。北方和青藏高原草地90%已經或正在退化，其中中度程度以上的退化草地已達1.3億公頃，嚴重退化草地5650萬公頃；南方草地退化面積約為1400萬公頃，占南方草地總面積的30%，其中重度退化草地280萬公頃。<sup>51</sup>

---

<sup>50</sup> 章力建，〈加強草原生態保護是當前我國環境保護的戰略要求〉，《2009中國草原發展論壇論文集》頁38-41。中國知網，網站：<http://cpfd.cnki.com.cn/Area/CPFDCONFArticleList-ZGCY200910001.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sup>51</sup> 章力建，《加強草原生態保護是當前我國環境保護的戰略要求》，頁39。

草原的退化，是政府鼓勵定居的直接動力。人們普遍認為過量放牧是造成草原破壞的原因。牧民被商業化捲入，為了獲得更高的收益不斷加強牲畜的蓄積量，在有限的草原上飼養的牲畜越來越多，每一頭牲畜所佔的草原面積就相應減少。當牧草生長的速度比不上牲畜吃掉的速度，草原就開始退化。這種局面若得不到控制，將出現惡性循環的局面：單位面積上可食牧草減少而牲畜量卻很多，牲畜不得不增大覓食範圍和頻次，這就加重了對草場土壤結構的物理性破壞，而這又反過來限制了牧草的生長。長時間的這種惡性循環便使草原逐漸貧瘠、退化直至沙化。其實造成草原沙化的另一個原因是人為直接破壞，主要有內蒙古、新疆等地的礦產資源開發、青藏高原上的破壞性植物採掘——發菜和冬蟲夏草。但是，由於我國的草原多處於氣候條件比較嚴酷、生態平衡脆弱的乾旱與寒冷地區，盲目的開墾以及墾後的管理不當，常常造成既達不到糧食增產的目的而又使草原原有植被遭破壞的局面。

為加強草原生態保護，保障牛羊肉等特色畜產品供給，促進牧民增收，從2011年起，國家在內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和雲南等8個主要草原牧區省（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全面建立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內容主要包括：實施禁牧補助，對生存環境非常惡劣、草場嚴重退化、不宜放牧的草原，實行禁牧封育，中央財政按照每畝每年6元的測算標準對牧民給予補助，初步確定5年為一個補助周期；實施草畜平衡獎勵，對禁牧區域以外的可利用草原，在核定合理載畜量的基礎上，中央財政對未超載的牧民按照每畝每年1.5元的測算標準給予草畜平衡獎勵；給予牧民生產性補貼，包括畜牧良種補貼、牧草良種補貼（每年每畝10元）和每戶牧民每年500元的生產資料綜合補貼。<sup>52</sup>

---

<sup>52</sup> 《關於做好建立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前期工作的通知》財農[2010]568號，財政部官方網站，網站：[http://nys.mof.gov.cn/zhengfuxinxi/czpjZhengCeFaBu\\_2\\_2/201101/t20110111\\_409674.html](http://nys.mof.gov.cn/zhengfuxinxi/czpjZhengCeFaBu_2_2/201101/t20110111_409674.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 第二節 定居的經濟與社會邏輯

研究牧民定居的論文多會提到定居的生態邏輯，在更大的視野角度來看，這一點是成立的。官方文件在提及定居模式的時候，都會提到草原人口畜牧量的增長對草原造成的破壞。但是並不是根本原因，假如生態的破壞不影響牧民增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推動牧民定居的動力將會大大降低。不過筆者認為，在官方提及對草原的破壞的背後語義，其實是游牧不僅是過時的，而且從經濟角度看是低生產力的，<sup>53</sup>而在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政府認為他的首要目標就是扶貧。「人民政府在牧業區的一切工作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發展牧業區的生產，改善牧業區人民的生活。」<sup>54</sup>

從新疆整體情況看，純農區的農民收入比半農半牧區的農民收入高，半農半牧區農民收入比純牧區牧民收入高。同時由於生活條件和生產條件的不同，牧民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費支出和家庭經營費用支出方面都明顯低於農民。<sup>55</sup>而牧民的生產方式進入「內卷化」，不可能在有限的環境內繼續依靠擴大規模來增加收入，哈薩克族村莊的定居是必須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轉變畜牧業粗放型的生產方式才是定居的根本需求。才能解決各種妨礙畜牧業生產發展的問題，改變長期存在的牲畜飼養方法、生產技術的落後狀態與生產組織的不完備狀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對各種自然災害抵抗力薄弱的狀態。可見國家強力推動的定居背後是因為對畜牧業來說環境—牲畜—人三者之間的相互影響的緊密關係，造成了多餘的牲畜和人口不能再依靠有限的環境來得到發展。要減輕草原的負擔，除了發展通過各種技術保護草原，提高承載力以外，就是減少生活在草原上的牲畜和以此為生的人口。

在此，筆者用經濟學的劉—費—拉模型來介紹政府主導的畜牧業發展形式。按照劉—費—拉模型，畜牧業和農業一樣，是發展中國家的傳統部門，與此對應的是以工

<sup>53</sup> 安德烈·馬林，〈在現金牛和金牛犢之間〉，《游牧社會的轉型與現代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第120頁

<sup>54</sup>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關於內蒙古自治區及綏遠，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業區畜牧業生產的基本總結》（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953年9月9日），問法法規網：網站：<http://www.51wf.com/law/1195613.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sup>55</sup> 阿德力汗·葉斯汗，〈新疆牧區新農村建設的現狀與對策〉，《新疆財經》2008年第4期，頁18。

業為代表的現代部門。由於城市勞動報酬和生活水平比較高，吸引仍舊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同時，伴隨著農村勞動力的不斷減少，農村土地的集中，農村居民依靠科技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收入。<sup>56</sup>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上來看，和上述的判斷相符。這樣的現代化道路意味著通過大量的二三產業將農業人口吸收，將大多數的人口轉移到城市，從而將農村的土地集中，發展規模經營。而筆者發現這種在內地比較有效的方式，在新疆，或者說在奇台卻並不那麼成功。

很明顯，奇台與內地城市化遇到的問題並不一樣。在內地人們關心農民工如何融入城市，如何在城市中定居下來；在新疆，政府還在做的是如何將過剩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其他產業中去。也就是說，同樣是城鎮化問題，具體來看卻並不一樣，新疆和內地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並且，勞動力的轉移不僅在牽扯到當地政府的宏觀政策，例如當地政府的招商能力，還具體牽扯到政府引進的資本是否是勞動力密集型，與當地資源稟賦的對接能力，甚至是對農村勞動力的發動也考驗著政府對發展計劃的執行能力。這樣看似完美的計劃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變數非常大，不通盤考慮的話，很容易因為一個細小的原因而失敗。而中國牧區城鎮化水平很低，因此吸納牧民進城就業的空間十分有限，大量的人口與勞動力還集中在第一產業，主要靠開發使用脆弱的草地、耕地等資源來維持生計、謀求發展。牧區自然資源豐富，但由於開發程度低，許多寶貴資源被白白浪費。已開發的資源缺乏合理利用，從而出現捧著金碗要飯吃和「富饒的貧困」等現象，大部分地區以單一產業為主，多種經營不發達。有的牧業縣畜牧業產值占農林牧漁總產值的比例超過60%。這種單一的產業結構和過於偏向農牧業的就業結構，加上牧區勞動生產率低下的農牧業生產情況，不利於改變牧區貧困落後狀況，更不利於農牧業經營規模化。很多純農牧業縣市由於沒有工業，第三產業又相當落後，每年的財政收入連發放當地幹部的工資都不夠，更談不上進行其他建設投資，每年需要國家大量投入才能勉強維持政府職能部門運轉。

而政府在這樣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開始大規模鼓勵哈薩克族的定居，希望以此來帶動哈薩克族乃至新疆的發展。但是這樣理論上可行的道路在現實中走得並不順利，

---

<sup>56</sup> 高帆，《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理論闡釋與實證分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頁53。

這其中牽扯到政府、企業與村民各自的特點與關係。雖然現有的研究多分析如何通過定居來加速現代化，但是這些政策建議性的論文往往停留於此，並沒有深入研究在這個過程中三者之間的關係與互動，以及這麼多年以來定居效果不彰，或者說居民收入增加停滯的原因。也許這就是馬爾庫斯說的「大理論無法解釋社會細節」，<sup>57</sup>在大規模的新農村建設開啟的時候，我們有必要將視野真正下落到一個村莊，才能發現其中的奧秘。

畜牧業的特殊性質，讓廣大的牧民分散居住，所以很難為牧民提供公共產品。對現代國家來說，由國家提供包括道路、電力等基礎設施和醫療、教育等公共產品，才能普遍提高國民的生活水準，也是國家的必要任務。然而特殊新疆牧區地貌條件特殊、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使牧區人口密度小，又游移不定，使得多數牧民並不能完整享受這些由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體系。在其文件《國務院關於促進牧區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提到的惠民工程主要有以下部份：

加快實施游牧民定居工程。加大游牧民定居工程建設投入力度，將牧民基本生產生活設施納入建設內容，在高寒高海拔邊境地區根據水資源條件，因地制宜建設小型水利設施和飼草基地，在藏區建設青稞基地，力爭到2015年基本完成游牧民定居任務。牧區地方政府要積極整合農村飲水安全、農村公路建設等項目資金，確保定居點的水電路和通信等基礎設施配套；要落實配套資金，加大對困難游牧民和邊境線地區游牧民的補助力度。加快實施牧區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統籌推進新牧區和小城鎮建設。<sup>58</sup>

哈薩克牧民變游牧為定居，徹底改善了他們的醫療衛生和文化教育條件，是牧區經濟的重大變革，也是改變傳統觀念的重大成果。

同時，中國政府要完成國家整合的目標只有通過定居，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將這些邊疆人口控制住。在金村和黃村都可以看見派出所，雖然金村黃村的派出所只看見

---

<sup>57</sup> [美] 喬治·E. 馬爾庫斯、米開爾·M. J. 費徹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頁30。

<sup>58</sup> 《國務院關於促進牧區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1〕17號，中央人民政府網站，網站：[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1-08/09/content\\_2821.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1-08/09/content_2821.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建築物卻從沒見過開門，最明顯的莫過於派出所院子裡高高樹立的國旗。而在大陸警察系統的設置中，派出所只設置在鄉鎮級別，在村一級本無派出所的機構必要，應該設置的是「公安特派員」。不過在現在的新疆，這樣的事情就變得好理解起來。奇台所在的北疆雖然不是當今疆獨和極端宗教的起源地，也不是新疆發生恐怖襲擊最嚴重的地區，但是政府在維穩的時候顯然不會輕易地疏忽任何一個地方。定居可以有效地將分散的人口集中，便於推進網格式的維穩，村口的派出所毋寧說是象徵著政府的有效管轄。

另外，鄉政府的宣講員也會來村中宣講反對極端化的思想，因為金村沒有固定的公共空間，因而黑叔的家就成為了村中黨員開會的地方。在宣講員來到以後，黑叔通過電話通知，不一會兒金村的黨員就集中到了黑叔家中。這種通過定居帶來的效應是原本分散在草原上時候無法達到的。

### 第三節 勞動力轉移的失敗

居住模式的轉變也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生產方式的轉變。原本需要依靠二三產業的佈局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而只是將畜牧變為種植業為基礎的定居的話，其實和其他省份農村居民的貧困原因差不多，在其他省份，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依然是困擾著地方發展的難題。因而如果將牧民的發展僅僅定義在居住方式的變革不能帶來產業經濟的深刻變革，不僅定居的價值無法體現，甚至成了開墾耕地但是牧民又回去游牧的狀況。所以，實現勞動力就業從傳統部門到現代部門的跨越式轉移是定居的關鍵所在。

當地政府對少數民族就業的指導方向是「離土不離鄉」，也就是少數民族就業人口雖然不再從事廣義性質上的農業生產，但是並不需要離開家鄉到其他城市去。況且從現實來看，奇台縣所在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和所屬的北疆，已經是新疆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具有一定的產業基礎。所以，我們將就業的考察範圍限制在奇台縣。

地方產業的結構影響了他能吸收多少就業人口。當地缺少勞動密集型產業，援疆政策更多的是基礎設施投資和大型的能源項目。所以首先在這一點上，勞動力轉移的能力就不是很強。筆者查閱奇台縣2014年的國民經濟統計報告，三次產業結構由上年的41.1：31.9：27調整為38.3：35.8：25.9。<sup>59</sup>儘管產業結構有所調整，但是和全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9.2%，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2.6%，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8.2%）相比，奇台縣第一產業比重仍然過大，雖然不能找到奇台縣的三產的就業人口比重，但是根據其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可以判斷奇台縣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口仍然比較龐大。

奇台縣的經濟以能源為主，另外基於奇台的資源稟賦，擁有比較特殊的石材加工產業，這已經成為奇台縣的第二大的產業支柱。在吸引就業上，能源工業等重工業吸引的就業人數較少，而能夠較多吸引就業的第三產業發展不足，不能成為吸收就業人口的大頭。根據筆者從金村附近小集鎮的觀察來看，則明顯反應了當地產業的單一。在卡扎鄉的政府駐地，除了學校還有5家來自甘肅的漢族與回族人開的小賣部，出售水果、蔬菜。另外還有一家藥房、一家小飯館和一家哈薩克族人開的家庭屠宰場。距離金村8公里遠的地方是林鎮，林鎮則因為在303省道和228省道的交匯處，是附近北塔山煤礦的運輸通道上，飯館、藥店與小賣部的數量都要多一些，也顯得更加熱鬧。除此之外，兩個鄉鎮看到最多的，就是中國郵政、銀行、中國移動等大型國企的營業網點。在這樣幾乎沒有企業的地方，不難想像小城鎮也根本吸引不了附近的人口集中。沒有更多的外來人口，本地人口的消費又是有限的，從商鋪種類也可以看出，基本上就是附近村莊裡人們採購的中心，而採購的也只是一些生活必需品而已。本地產業的不發達，沒有產業鏈，農產品的銷售停留在一次性消費。

2010年3月30日，中國大陸決定採用「汶川地震後的對口支援模式」，通過推進新一輪對口援疆工作加快新疆跨越式發展的信號，會議確定北京、天津、上海、廣東、遼寧、深圳等19個省市承擔對口支援新疆的任務。福建省對口援建昌吉州，其中福州

---

<sup>59</sup> 《奇台縣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奇台縣黨政信息公眾網，網站：<http://www.xjqt.gov.cn:8085/10014/10200/10006/2015/69875.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市對口援建奇台縣。從《福建省新一輪對口支援新疆昌吉州綜合規劃（摘要）》可以看到，福建省規劃的對口援建項目包括產業對接、工業園區、現代農業、服務業、招商引資，但是這些項目大部份是類似「組織福建省內知名企業和閩籍企業家赴昌吉州洽談投資合作，推動雙方已簽訂的紡織、食品、機械等產業合作框架協定的落實，促成一批具體合作專案儘快生成落地，重點強化在園區建設、專案引進、技術開發等方面的合作，推動昌吉州石油石化、煤電煤化工、紡織、食品加工、機電和新型建材等主導產業集聚發展」<sup>60</sup>等鼓勵福建企業到昌吉投資，並且投資的重點是在工業項目，很難吸收毫無職業技能的農牧民參與其中。

在農業的援疆中，福建省的規劃是「支持和幫助昌吉州建設現代農業示範園區，重點抓好閩奇現代農業示範園試點項目建設，實施新建育苗基地、實驗中心等項目，引進推廣適宜品種，鼓勵福建省農業企業入園，建立蔬菜、菌草等示範基地，推動農牧業產業化經營，幫助游牧民加快實現脫貧致富。鼓勵、支持和引導福建省企業參與昌吉州農業資源深度開發，建設特色優勢農牧產品精深加工項目，延長農業產業鏈；支持昌吉州推廣農業先進技術，推進農業標準化、信息化建設和產業化經營。」<sup>61</sup>福建省的援疆項目大多數都是與當地政府合作，建立產業示範園區，將福建的企業引入新疆，這些援建項目一方面契合了當地政府希望通過招商引資來追求經濟數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為福建的企業開拓新的市場，看似雙贏卻並沒有直接作用於奇台的農牧民就業。

筆者並不狹隘地認為一定要將奇台的農牧民直接吸引到企業就業作為援疆標準，但是當援建項目集中在農業示範區的時候，就知道這樣的項目並不能吸收當地的少數民族參與其中，援建項目就業的能力超出了當地少數民族的水平，就與廣大農牧民漸行漸遠了。而這一缺點在許多研究中都已經被提及，孫巋在〈對口援疆背景下的民族

---

<sup>60</sup> 《福建省新一輪對口支援新疆昌吉州綜合規劃（摘要）》，昌吉回族自治州政府網站，網站：<http://www.cj.gov.cn/gk/ggjj/zcjgg/1178.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福建省新一輪對口支援新疆昌吉州綜合規劃（摘要）》，昌吉回族自治州政府網站，網站：<http://www.cj.gov.cn/gk/ggjj/zcjgg/1178.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關係協調機制》一文中對對口援疆涉及到民族關係的部份提出，要擴大少數民族的參與，要發展當地產業，讓當地人民成為受益者等三大解決措施。<sup>62</sup>

這些缺點在奇台當地多有存在，「上面風風火火，下面一盤死水」也是筆者在金村看到的景象，福建省的規劃涉及到農牧民的部份是「要保證每戶牧民建成一幢80平方米左右的抗震安居房，以及100平方米左右的暖圈、60平方米的飼料棚和人均開發5畝以上的高標準飼草料基地，從根本上轉變牧民生產、生活方式，保護和改善草原生態環境，實現草原生態與畜牧業可持續發展。援建資金分別用於支持游牧民的抗震安居房建設和暖圈、飼料棚、飼草料基地等配套生產設施建設。對6000戶游牧民的抗震安居房建設按3萬元/戶的標準給予定額補助，合計援建資金18000萬元；對6000戶牧民實現定居所需的暖圈、飼料棚、飼草料基地等配套生產設施建設，按3萬元/戶的標準給予定額補助，合計援建資金18000萬元。其中奇台縣931戶，援建資金5586萬元。」<sup>63</sup>除了基礎設施建設和資金補助，並沒有具體的畜牧業的發展計劃，而作為政績之一的定居本身，就是筆者所存有疑問的——牧民定居是作為整體的居住和經濟發展相融合的過程，並非不再游牧就是定居的全部意義，如果福建省沒有配套相應的畜牧業發展計劃，單純的定居只會造成新的問題產生。

企業不願意招募少數民族員工。金村中有許多和我一樣25歲上下的年輕人，很多都讀到義務教育規定的初中畢業就不再讀書，原因是因為初中是不收學費的，而奇台縣的高中則要收取2400塊錢一年。黑叔的一個孩子在奇台上學，說按照現在的物價，一個月也要給他700塊的生活費。當然，黑叔是屬於村中經濟條件較好的人家，但是走訪的另一戶人家，也會給小孩600塊錢的生活費。其實按照奇台縣城一個新疆拌麵15元人民幣的價格來算，這點生活費也是剛好能夠吃飯而已。於是很多年輕人，如果沒有考取學費生活費全部免費的內地高中班，便不再讀高中了。不讀書，當地的產業又少，便只能放羊。別克西和我半開玩笑的話，似乎可以說明村中年輕人的境遇。「一戶人

<sup>62</sup> 孫巋，《對口援疆背景下的民族關係協調機制》，《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1卷第4期，頁21-25。

<sup>63</sup> 《福建省新一輪對口支援新疆昌吉州綜合規劃（摘要）》，昌吉回族自治州政府網站，網站：<http://www.cj.gov.cn/gk/ggjj/zcjgg/1178.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家一共40多隻羊，三兄弟一起放，根本就要不了這麼多人嘛！一個人365天每天跟著就可以了，但是沒有地方上班，就只能放羊了。」

雖然受制於奇台縣本地產業結構的困境，但是當地缺少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並不表明完全不需要工人。但是，這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都不願意吸收本地勞動力，這是為什麼？這種政府通過引進勞動力密集型企業來增加本地就業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可是不論是政府招商引資還是援疆項目在新疆的發展，一直受人詬病的就是企業在新疆並沒有使用本地的少數民族員工，尤其是在佔用了當地的土地之後。有研究表明，在新疆的企業更加願意使用漢族員工，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少數民族就業。2010年，新疆擁有農業剩餘勞動力200萬人，其中少數民族占80%，主要集中在喀什、和闐、阿克蘇以及伊犁等地州。每年外省市農民工到新疆務工人員250萬人。隨著內地務工人員短缺，新疆一方面出現了城市「用工荒」；另一方面農村剩餘勞動力急需轉移，二者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新疆少數民族從事傳統農牧業生產的勞動者占總人口的77.73%，維吾爾族勞動力當中有80.5%屬於農業勞動者，柯爾克孜族、哈薩克族勞動力分別有84.3%和77.2%是農牧業勞動者。<sup>64</sup>而別克西自己對就業的解讀幾乎可以概括現在中國大陸各省援疆效果不彰的原因。「那個北塔山煤礦嘛，是口裡的老闆來開的，佔用了我們的地嘛，可是他連工人都是口裡帶來的，我們的年輕人還是只有放羊。」其實不僅僅是私人老闆，連內地援疆企業的用工也很少用新疆本地的少數民族。那麼為什麼企業很少到新疆各地州去尋求勞務工？

缺少產業工人意識、紀律意識、規範操作意識是影響新疆少數民族就業的原因之一。市場經濟下，如果政府強制企業招收文化程度低或基本沒有上過學的農民工，就會增加企業培訓成本和運營成本，影響中小企業發展和招商引資。而哈薩克族年輕人對於知識和勞動技能的輕視，更加造成了在就業市場上的劣勢。傑克是本縣的一名高中教師，在深圳內高班畢業後考上位於無錫的江南大學，在無錫工作一年後回到新疆擔任數學老師。這位對家鄉民族充滿感情的老師在第一年感受到的是工作上的挫敗感。「我們哈薩克人的數學成績真的太差了，所以我給我們班的學生免費補課，就是週六

---

<sup>64</sup> 孫巋，〈對口援疆背景下的民族關係協調機制〉，第21頁。

把他們叫來上課。但是他們的家長都來到學校，把自己家的孩子帶走了，他們覺得讀書不是重要的，而我們已經和內地差太多了」。而當我問起黑叔小兒子的時候，「你不知道，我了解我們的民族，我們太懶了」。這樣的答案從充滿自尊心的哈薩克族年輕人口中得到，會比從不了解的內地人口中聽到更加震撼。本民族的年輕人毫不諱言地和外人表示自己的民族太懶了。

而種種有關「懶惰」的汙名化，更多的則是牧業生活方式和現代產業工人的生活方式的衝撞。在筆者看來，農民包括牧民才是真正的自由職業者，他們對生產生活的時間觀念和安排，並不和生產車間裡的工人一樣。農民的生活時間是自由的，是可以自己安排的。村民就像他們的游牧的祖先一樣，沒有井井有條的時間安排，大多數充滿了隨意性，就連一日三餐的時間也並不是確定的。上午10點來了客人，女主人擺出奶茶、奶酪、饅頭，大家邊吃邊聊。不一會兒又有客人來了，又開始邊吃邊聊。村民的生活是悠閒的，尤其是在冬天，不斷地來客人，吃吃喝喝一天過去，同樣的生活又迎著第二天的朝陽一同到來。而如果強行把村民納入到現代工業社會的生活方式中去，造成的就是村民普遍覺得壓抑，嚮往哈薩克斯坦自由自在的生活。「生活在中國太累了，所有的人都在賺錢。」村民們其實生活在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們感受到自己的經濟地位的不斷下降，另一方面又不願意拋棄祖先的生活方式，也不能適應中國快節奏的生活。而這才是哈薩克族，包括好多少數民族「懶」的汙名化的真實原因。

本地人的生活狀態其實並沒有符合現代工作的狀態。放羊散漫慣了的農民，其實並不太適應緊張的工作。反而時間利用比較充足的人，比如黑叔，反而能在當農民的情況下也能快速致富。我剛來村中的趣事，似乎很能說明這種農村裡悠哉悠哉的生活狀態。在漫長的冬季，村民的日常生活，除了放羊和每隔幾天為羊準備草料，其餘的時間幾乎都在家中無所事事。在村中串門，甚至連門都不需要敲，逕直推門進去就可以了。進門之後或者拖鞋躺在炕上，或者坐在炕沿，女主人便端出果盤和饅頭，煮上奶茶邊喝邊聊天。聊一陣就走了，不一會兒又來一波客人，又是吃吃喝喝聊聊。而剛來的第二天，村中不少人聽說之後特意來看我，大概來了5波客人，於是我也跟著喝奶茶，吃饅頭吃了一整天。到了晚飯時間女主人又開始做飯的時候，我早就已經肚皮圓鼓鼓，一點都吃不下了。

現代化的根本，就是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原本的小農生活要適應現代化的8小時工作制，而村民的生活幾乎是處於前現代化的。一來的確有少數人不適應這種工作時間，二來之前的企業遭遇的這種生活狀態的差異給廣大的少數民族都留下了「懶惰」的污名，形成了惡性循環，更少有企業願意接納哈薩克族以及維吾爾族的員工。當中國龐大的人口被拉到急速的現代化的時候，很多人不能理解這種牧民生活與現代化的疏離感。當國家的目標是在改變國民的日常生活習慣，它的無知就會導致無能為力。<sup>65</sup>在內地農村，國家可以發動大規模的對勞動力的現代化改造，諸如技能培訓、通過組織農村剩餘勞動力到其他地方打工。但是在少數民族地區，這種對勞動力的現代化改造會面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對民族同化的擔心。金村所在的鄉對村民做的勞動技能培訓僅僅是對哈薩克婦女的刺繡技能培訓然後組織成刺繡合作社，這也是建立在哈薩克傳統文化保育的基礎之上。一方面是勞動力積壓在農村，無法在傳統的畜牧業上尋找出路，另一方面村民也過度依戀原有的生活方式。並且村民散漫的日常生活，即使不被忽視也毫無做出改變的能力，並且不斷隨著「懶惰」的污名化，這種刻板印象也不斷被宣傳與深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勞動力幾乎留在村裡從事原本的傳統產業，那就是種地和放牧。

每年春運期間中國龐大的農民工數量足以說明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成功，但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特有的文化保護、文化適應、民族心理等問題要比在漢族地區更容易得到村民本身與政府的重視。因而當地政府在按照經濟學原理制定政策之時忽略了本地少數民族就業的特殊性、沒有按照當地的實際情況做出調整就未能實現人口從第一產業到第二、第三產業的轉移。

---

<sup>65</sup> 詹姆斯·C·斯科特，《國家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46。

## 第四章 陷入困境的家庭農場與畜牧業

### 第一節 家庭牧場發展的資本

金村的發展沒有按照政府預計的那樣發展下去：政府通過圈地引進了外界的企業和工廠，然後村民們開始去工廠上班，成為產業工人，通過農地流轉將土地集中在少數有技術懂銷售的牧民手裡發展高效種植業和畜牧業，從而實現金村以及整個奇台的發展。因為政府計劃的失敗，人口並沒有按照原計劃轉移，因而我們在金村能看到的，仍然是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要考察一個家庭的生產能力，首先要分析一個家庭所擁有的能投入到生產中的資本，包括土地、資金和勞動力。

在土地資本方面，土地取代牲畜成為定居後哈薩克家庭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對傳統的游牧民族來說，逐水草而居，儘管好的牧場影響到牲畜的生產水平，但是牲畜依然是其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而對於定居的牧民，雖然牲畜和土地的關係沒有變，但是土地的重要性卻超越了牲畜。這其中原因在於土地本身成為可交換和抵償的資源。相比於《草原法》對草原產權歸屬的模糊不清和草原依舊由幾戶牧民共同使用的事實，國家對耕地的產權定義是更加明細的。耕地使用權完全歸屬於家庭而不與其他家庭產生瓜葛，也為耕地的流轉掃清了障礙。這樣，家庭勞動力資源在和土地資源不匹配的情況下，就會將土地租出去。

這已經不是一個游牧社會與農業社會的交易而是一個半農半牧的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的交易。由於土地的重要性，所以村民們對土地的多少十分在意。因為土地多的人家，可以將土地流轉出去獲得收入。在無法通過貸款獲得資金成本的時候，很多人傾向於將土地流轉。因此土地在每家各戶的分配顯得特別重要。常常有村民認為土地的分配不公平。本村最近的一次農田分配，是在1999年。政府為了增加土地的穩定性，承包的年限是30年。按照當時政策，村中的土地分為一等、二等、三等、四等。按照每家每戶人頭，一個人分得9畝一等地，二等以下土地1.6畝折合1畝。所以在當時，每

戶人家基本上都能分到50—70畝土地。理論上來說，1999年分土地的時候每個家戶中平攤到每個人頭上的土地是差不多的，而1999年至今的15年中，土地的實際佔有量差距極大。努爾曼的老婆抱怨說他們家4口人，只有50畝土地，而有的人家3口人卻有100畝的土地。而她當時給我的理由是1999年分土地的時候他們家人不在，於是就分得少。有的人家做了手腳，土地就分得多。我沒能找到村中分土地的原始資料，但是在一份「2015年卡扎鄉哈村四組（金村）2015年灌溉水分配表」中看到，土地最多的一戶人（卡力哈爾）家是133畝，而最少的（斯拉木巴依）是44畝。土地分配的懸殊讓我感到十分驚訝。在我之後的調查中，得知其實當時的土地分配是公正的。但是出現的問題在於時間的流逝。距離1999年15年過去，村中的土地以及使用權沒有變化，當時與政府簽訂的是30年的合同，而村中和每家每戶的人口卻出現了極大的變化。比如100畝的那戶人家，當時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核心家庭，家中祖父母健在，父母和一個兒子五個女兒。按照當時家庭中的人口，的確分得100畝的土地。而在這過去的15年中，家中老人離世，女兒出嫁，只剩下20多歲尚未結婚的兒子與父母生活在一起，便成了努爾曼口中「上頭有人」的利益既得者。

原本游牧民族在意的是牛、羊、馬的數量，而現今村民對土地的在意程度，讓我深深感到定居對他們的思想觀念的改造。而村民與政府之間的這種不信任感，筆者也將在後文繼續描述其產生的原因與影響。而黑叔則告訴我另外一個原因，當時有的人土地分在比較偏的地方，周圍都是無主的鹼地。於是有人就慢慢地以自己家的地為基礎，開始不斷向外拓展土地，15年之後也成了擁有大片土地的人。以上說明的土地村民對土地的看重，而土地在哈薩克族畜牧業中如何發揮作用的，將會在本章第二節中詳細說明。

關於人口資本，草場被分割承包以後，一部份弱勢的村民不斷地抵押自己的資產，或者把土地租出去，卻只能管理到溫飽。而金村的總體水準，已經到了溫飽有餘，小康不足的狀態。而由於家庭各種家庭因素，村中的貧富差距還是很快的展現出來。並且，這種差距很大原因在於缺乏原始資本和勞動力，而當今的畜牧業已經不能完全依靠哈薩克人的傳統來維持，技術、銷售渠道、新思維新想法，這些都需要牧民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在村中，原始的勞動力可以理解為家庭成員，也就是家庭的成長狀況。

每一個家庭都要經歷孱弱——鼎盛——衰老的過程，當一個核心家庭剛剛從聯合家庭中脫離出來的時候，往往是夫妻二人帶著孩子，並且在金村由於少數民族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地較為寬鬆，不少家庭都有兩到三個孩子，這就造成了家庭勞動力的不足。而當核心家庭慢慢成長，原本的消費者也漸漸變成生產者，使得一個家庭的生產水平上升，家庭本身步入鼎盛階段。最後，由於家庭成員的老去，勞動力減少，家庭的收支漸漸不平衡，家庭開始衰落。在理想模式中，家庭的成長過程如此，在金村當地，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家庭的成長過程比模型上要複雜得多。

比如哈薩克家庭習慣幼子繼承制，在孩子們長大以後，已經結婚的兒子會一個個獨立出去，留下最小的孩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這帶來兩個後果，一個是家庭所佔有的土地隨著家庭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另一個後果就是幼子家庭需要撫養的人口要大於其他孩子。而我們考慮到這其中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就會知道要將這些由家庭人口和成長階段帶來的人力資源完全分類是不可能的任務。在金村以下幾種家庭人口因素會影響到家庭的經濟生活。

黑叔家的鄰居是典型的案例，女主人長年患有心臟病，需要長期靜養，一年吃藥需要兩萬元，只能在家料理家務；兩個兒子雖然已經成年，學歷都不高只能在家務農放牧；男主人照看家裡的幾十頭羊。新疆雖然在近幾年新建立了新型農區牧區合作醫療保險制度，但是十幾年來家庭首先因為女主人的身體狀況消耗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原本可用作生產投資的資金被用來看病，而女主人的身體狀況也不像其他婦女一樣可以參與到鄉裡新組建的刺繡合作社。哈薩克婦女在家庭中具有重要的生產作用，而這位生病的女主人很明顯不是家庭的生產者。而他們家的兩個兒子，沒有學歷也沒有技術，在城鎮中的就業市場上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家務農。可是家中一共只有幾十隻羊，不需要這麼多的勞動力，受到鄉裡照顧將鄉辦合作社的羊交予他們看管。而我的報導人黑叔，本人充滿活力，在改革開放通過畜牧業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後，曾經買過一輛大卡車跑運輸，不過後來因為事故將車專賣；黑叔的妻子參加了刺繡合作社，通過發揮哈薩克族傳統的手工藝補貼家用；黑叔的大兒子新疆警察學院畢業，考上了公務員，現在政府機關工作，二兒子考上了內地新疆班，現在中國石油大學；小兒子則在奇台



縣裡讀高中。我們很容易根據兩個家庭不同的人口質量判斷在一定的時間內兩個家庭未來的發展趨勢。

總而言之，家中是否有病人，老年人的勞動能力，家中孩子是否在內地讀大學還是已經開始工作都有影響。筆者認為，普遍地說，家庭人口的增加會相應地增加家庭所佔有的土地，而土地資源則是新的哈薩克牧業生產方式的絕對資源。或者說，社會的分化來自家庭週期性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比例。<sup>66</sup>

在現金資本方面如果想要提升畜牧業發展的質量，需要先進的畜種、優質的牧草、精確的管理，這些畜牧業發展的條件都是傳統的哈薩克牧民所沒有的，都需要現金的支持。而牧民大多數是除了土地和牲畜，是沒有多餘的資金來提供到種植業和畜牧業的生產上的。在金村，畜牧生產的主要資金來源就是銀行貸款，而銀行貸款需要相應的抵押，在金村這樣經濟並不富裕的地方，一般家庭並沒有什麼耐用消費品等資產可以做抵押，只有土地的使用證書，因而可以看到土地影響了村民的現金。這也是國家鼓勵小農貸款的原因，只是因為其他原因，單個的牧民很難貸款，這將會在第二節中提到。

在簡要分析了金村家庭農場發展所需的資本後，就可以具體地分析家庭農場發展的三大要素是如何相互搭配，在金村的畜牧經濟中發揮作用的了。在以下的分析中，每一個生產要素的缺失都存在制約整個畜牧經濟發展的某一方面，而三大要素既各自獨立又相互影響，會出現僅僅因為一小個短板導致整個畜牧經濟發展的遲緩。

## 第二節 金村的畜牧業模式

哈薩克族在進入工業社會以前就是一個從事牧業生產的民族，因而很多農民在面對選擇的時候，就選擇了成本較小的牧業。但是脫離了草原的畜牧業生產存在極大的

---

<sup>66</sup> [美] 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頁6。

風險與不確定因素，在政府保護植被的政策和對畜牧業發展的規劃下，牲畜的飼料需要從土地供給也就是農場模式。政策的制定者根據生態農業，為村民設計了一個精妙的生產鏈條。就如同在江南的桑基魚塘一樣，土地的產出的農作物除了銷售以外，麥稈、玉米秸稈，向日葵的花盤等等都可以循環到畜牧業成為牲畜的飼料，牲畜的排泄物最終又以生物肥料的形式回饋到土地中，得以減少化肥的使用。以下是定居模式的理想生產流程。

春季：播種玉米、春小麥、向日葵；牲畜吃前一年冬天的草料。

夏季：收割冬小麥；牲畜在草場放牧。

秋季：收割玉米、春小麥、向日葵；牲畜放養在田裡吃玉米秸稈，麥稈。

冬季：播種冬小麥；牲畜關在圈裡吃秸稈、麥稈、向日葵花盤。

首先看土地的收益。我按照現在村中主要的家庭狀況，建立一個處於壯年期的主幹家庭的理想模型：哈薩克家庭一般有2到3個孩子，所以我建立理想家庭模型為祖父母、父母、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按照之前的土地分配，每戶家庭基本上有6口人，基本上每戶人家得到的土地有60畝。

村民基本沒有記賬的習慣，沒有家庭年收入與年支出的概念，我只能通過多次的訪談，得到數據然後取得基本的平均數，建立一個收入模型，粗略估計村民的種地收入。以一畝地來計算，每一畝地的成本如下表4-1所示。

表4-1 奇台縣每一畝土地耕種成本彙總表

項目	投入	單位
玉米種子	70	元/畝
小麥種子	40	元/畝
拖拉機	40	元/年/畝
農藥、化肥	150	元/年/畝
人工	150	元/天
水費	150	元/年/畝
地膜	40	年/畝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訪談整理。

而人工費並不是每天都需要投入，家中青年勞動力比較多的，這一部份可以節省出來，而家中青年勞動力其實也存在一大問題。綜合來看，種小麥一畝地一年的花費基本上是在570元左右，種玉米的話，一畝地一年的成本是600元左右。這還不包括一次性投入的滴灌的成本。按照一戶核心家庭有50畝地來說，一年種地的成本基本上為29250元以上。

農民對於土地產出的計算。由於氣候原因，本地的主要作物就是玉米和小麥。按照產量，一畝地基本上能生產500公斤小麥和800公斤玉米，小麥今年的市場價是2.3元/公斤，玉米的市場價為2.2元/公斤，一畝地種植小麥的收益大約是1150元，種植玉米的收益大約是1760元。由於種植玉米和小麥需要輪作，大多數自己種地的農民都將土地對半分，所以，按照一戶人家50畝地計算，自己種地一年的收益大約是44000元和51750元，扣除成本，種地的收益大概是15000元到22500元左右。小麥的秸稈一畝為700公斤左右，玉米秸稈一般為1800公斤左右，這些秸稈冬天可以用來作為羊和牛、馬的飼料。<sup>67</sup>

在現有生產模式下，種地可以獲得較大收益，自己不種地的人也會把土地承包給別人，不會像美國的大農產生產一樣專門有土地為牲畜提供草料的生產，也不可能拋

<sup>67</sup> 筆者根據在金村的訪談資料計算。

荒。所以這個規劃良好的生態系統最終還是要讓位於現實：由於農業生產的特性，每年的夏季麥子、玉米、向日葵的生長期，牲畜還是會被趕到附近的天山吃草。土地不夠多或者完全不種地將土地承包給別人的家庭，也需要從別人那裡買來牲畜過冬的草料。另外，由於本地是新疆主要的砂糖生產基地，所以每到冬天，草料價格上漲的時候，就會有人從製糖廠買來甜菜渣作為牲畜的補充飼料。由此可見，耕地其實是整個畜牧的基礎環節，不可缺少。如果萬一失去耕地，牲畜的飼料就需要從別處購買。這使得從事畜牧業的成本大大增加，而市場風向萬一有變，牧民就要遭受損失。<sup>68</sup>初步看起來，金村已經建立的這一套農場雛形，是比較符合循環農業的發展的。這種土地規模和其他種植業的省份來說也已經大了不少，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有了家庭農場的樣子。但是在規模上，雖然新疆的家庭農場標準並沒有出臺，我們單純按照美國農場的標準，金村村民的也就只算是小農場，其實是家庭種植養殖的狀態。而真的要發展家庭農場，降低成本提升效率，還是需要一定的規模效益的。例如在按照上述的理想生產流程，牲畜的規模被牢牢限定在土地能夠供養的範圍內，如果想要做大規模，就需要更多的土地，或者乾脆用錢直接去買草料。因此，村民的畜牧業也是建立在對土地的依賴上。此種開發模式，在受到一定的制度和運行障礙的時候，便開始異化。在村民原始積累不足的情況下，多將土地流轉換取較少的租金。由此造成兩類牧民，一類完全失去土地支撐的村民的畜牧業極有可能在畜牧業的環節敗下陣來，完全失去生產資料，單純淪為為別人放牧的工人；另一部份能保留少數土地的村民，沒有錢就不能發展種植業，沒有足夠的種植業，就少了種植業帶來的巨大收益。而種植業的副產品，則是畜牧業的必需，如果單純依靠的是畜牧業的話，將會付出比有土地的人家更多資本。如果想要在畜牧業中獲得更高的收益，首先需要的是自己種地。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有不少村民將重要的土地出租以獲得短期的回報而不是追求長期的可靠收益，難道村民沒有認識到土地的重要性嗎？

追究其直接原因，可以發現村民將土地出租並不是沒有意識到土地的重要性，而是恰恰說明土地的價值。因為土地，尤其是附近有機井可以灌溉的土地是新疆農業發

---

<sup>68</sup> Linda Benson and Ingvar Svanberg, *China's Last Nomads :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s Kazaks*, p. 200.

展的稀缺資源，以奇台當地每一畝土地承包款250元/年來看，土地的承包款雖然遠遠少於自己種，但是卻可以作為家庭最為穩定的收入，因而如果家中有病人，有上學的家庭，反正家中勞動力不夠，往往選擇將一部份土地承包給別人，換來每年穩定的預期收入。黑叔家的鄰居因為患有很嚴重的心臟病，不能承擔更多的體力勞動，並且每年看病吃藥也要花掉不少的錢，因而選擇將土地出租。哪怕像黑叔這樣的能人，也將一部份土地流轉出去，一是他和妻子兩人忙不過來，第二也是為了將獲得的收入作為小兒子讀高中的穩定資金。在這樣的基礎上，並不是每家每戶都能在自己家的土地和家庭院落裡從事以種植業為基礎的畜牧業，很多村民放棄了種植業而單一從事畜牧業。

但是這並不能解決筆者所有的疑問。如果說緊急缺錢和勞動力不足是被迫放棄高價值土地的原因的話，難道其他租用土地的家庭就擁有足夠的勞動力嗎？村中的土地多是承包給個人的，整體出租給企業種植的並不多，哪怕是承包給企業，為什麼村民自己就不會僱傭別人來幫忙呢？買克拜總是微笑回答我的問題，「我們哈族人沒本事嘛！」那應該也是游牧民族不善於種地吧，我想。

可是，買克拜那有點無奈的笑容讓我忍不住去問，「本事」是什麼意思？接下來的答案卻讓我感到吃驚。「本事就是錢嘛！種地是一件資本投入非常大的投資，而哈薩克人貸不到款。」買克拜說這句話的時候似乎是怕我不相信，接著說「漢族人貸款可以貸50萬，70萬，今年還不了還可以明年還，我們只能貸兩萬。」作為一個外來的漢族研究者，筆者當時覺得十分難堪，買克拜的話語中似乎透露著一種哈薩克族被另眼相待的受壓迫感。在中國大體是不會在具體操作上出現這樣歧視某一民族的政策，那哈薩克人的貸款又是怎麼回事？貸款和種地又有什麼關係？

如果從筆者上文提到的種地需要的資本來說，讀者可以發現買克拜說的並沒有錯，種地需要非常大的資本投入。金村的居民普遍不是非常富裕，在高風險高收益和比較陌生的種地和擁有豐富經驗的畜牧業兩者中選擇，村民們自然選擇了一次投入不大的畜牧業。種地的收益高低與規模化的經營有相當的關係，在新疆當地的土地流轉網上可以看到，新疆的土地流轉動輒幾百畝上下，這對村民來說是巨大的成本投入。國家

在農村推出金融服務，村民可以通過貸款來融資，但是貸款需要一定的資產抵押。在新疆可以看到在田裡有一個個的小房子和紅色的抽水機，那是灌溉用的機井站房。金村所在的奇台縣是新疆的農業大縣，可是在新疆發展農業最重要的資源的就是水，早年有的坎兒井也早已經廢棄，而全是這種機井的灌溉，在田邊抽出水馬上就可以用。而正是由於水是如此重要，使得這些機井所代表的意義要遠遠超出「機井」的身份，所代表的財富也要遠遠超出組成它的這一堆鐵。當村民沒有其他的資本做抵押的時候，土地灌溉所需要的機井就是貸款抵押購得的。因為哈薩克族的經濟生活方式介於土地與畜牧之間，因而並不會像漢族，回族維吾爾一樣承包土地來種，所以耕種的土地達不到機井使用的標準，沒有機井的證書，因而不能貸款。他們並不是全身心地將土地作為收入的全部來源，土地對哈薩克族來說，只是畜牧業需要的第一次資源。這是和漢族回族不同的地方。金村隔著一條馬路的林鎮的回族人家，就沒有這麼多牲畜。不過每一眼機井都有相關的灌溉土地，而村中的信貸員十分了解村中的情況，當有人想要通過造假來用機井的使用許可來貸款的時候，信貸員就會發現這其中的秘密。

在當地村民實行了幾十年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都已經慢慢分散，很少有家庭可以達到貸款的標準，能達到這樣標準的只有成規模的畜牧企業與合作社。也就是說土地的規模決定了貸款的規模。況且，貸款除了機井作為抵押，還有一部份硬指標：第一，要有圈舍，若圈舍按要求蓋，就可以拿到部分補償；第二，要有牲畜；第三，要有飼料；第四，要有1-2年的種植經驗。

雖然這不能說政府主觀上在通過金融和政策手段抑制家庭畜牧業的發展，因為按照副鄉長的說法「哈薩克族村民貸款的不良資產率很高，很多人覺得貸款是國家給的補貼，並沒有按期還款的意識，因而銀行不得不給哈薩克族的貸款開出更高的資產抵押條件。」但是銀行這項政策殃及池魚，客觀上限制了金村家庭畜牧業的發展。單個的牧民在不想擴大生產的情況下，要貸款從事一定的種植業會很艱難，因為種植業的成本要比畜牧業高，並且哈薩克族也並不重視種植業，對他們來說牛和羊帶給人的安全感要多得多。

根據上文所述，應該已經能大致了解土地在哈薩克的畜牧業中是如何成為基礎性生產要素的，還看到土地不僅僅是基礎性要素，還是非常重要的資本變量，他對哈薩克發展家庭畜牧業的影響還不僅僅體現在土地能夠為牲畜提供草料的程度。

換過來說，貸款和土地的關係已經被強行綁定在一起了，土地多的人能獲得更多的貸款，因而不用抵押土地作為生產資金，較多的土地就能擁有較大的畜牧規模，從而獲得更多的收入。而當由於既有原因缺少土地的時候，土地不能作為資產被抵押，因而得不到貸款，只能通過出租土地獲得生產資金，繼而限制其牲畜規模。往往這一點造成了村民貧困。按照現有的土地政策，土地制度的長期不變影響了村民的收益提高，也擴大了村民的貧富差距。為什麼會擴大村民的貧富差距呢？這其實還要從理解哈薩克村莊的生產方式開始。哈薩克族的生產方式，並不是單一的游牧方式也不完全是農業模式，而是一種農業和畜牧業混合的方式，畜牧業的發展依賴於土地，所以有沒有土地牽扯到後面的畜牧業的生產成本。有更多的土地，意味著可以抵押更多的土地獲得更多的發展資金。所以，擁有農田的人，在這個商品交易中還能獲得利潤，而因為種種因素不能種田的人，則是無情的工商業的剝奪對象。像黑叔這樣，為了孩子上學能有穩定的收入，將一部份土地出租的人，還可以繼續維持一定的農場經營模式。他將10畝土地以10年的期限出租給別人，其他的土地用來給家裡的羊提供飼料。但是因為羊的數量超出了土地能夠供養的數量，他不得不將一些羊託管給其他村民養殖，在冬天也要從縣裡的製糖廠買來甜菜渣餵羊。由此受到土地規模的影響，村民家的畜牧業除了破產的以外，都是村民在家中的庭院經濟。村中沒有農戶能夠脫穎而出成長為上規模的農場。如此低度發展的畜牧業不僅僅意味著規模偏小，同時也影響著科技的應用、產業鏈的開發、以及和下游企業談判的能力。筆者將這種情況稱為土地集中的馬太效應。這樣偏向強者一方的制度安排，造成村落中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狀況，而這種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地位還將村中的合作社項目中繼續發揮作用。

哈薩克定居畜牧業模式的第一個特徵是土地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二個特徵這是牲畜結構的變化。原先在哈薩克家庭中，牲畜的結構是多樣化的，羊主要滿足日常肉食，皮毛；牛提供牛奶做成奶製品；馬是交通工具，雖然哈薩克人也有吃馬肉的習

慣，但馬肉並不屬於日常飲食，只有在重大的日子裡才會有馬肉出現；駱駝既可以作為馱運的工具，也因為駱駝可以放養在沙漠裡，不與其他的牲畜爭食草料，也被哈薩克人所喜愛。但是目前哈薩克村民家中的牲畜結構開始逐漸朝單一化發展。村中的牲畜越來越多地集中在牛和羊身上，駱駝與馬開始逐漸被淘汰。雖然駱駝和馬被作為交通運輸工具來使用，是不是他們被淘汰僅僅是隨著生活進步被汽車所代替？這種牲畜結構的單一化對哈薩克人是喜是憂呢？要回答這個問題，筆者認為首先要知道影響村民飼養牲畜的因素是什麼。村民選擇飼養某一種牲畜，首先是因為牲畜可以提供生活的必需品，現在而言是牲畜的價值。因而筆者通過訪談分析哈薩克人家中主要的四種牲畜的飼養情況，首先來說明牲畜結構是如何變化的。畜牧業的收益規模由於各種牲畜經濟效益的不同比較複雜，為讓讀者對整個生產的環節成本與收益有更加直觀的了解，我將詳細介紹：

一隻羊的投入與產出：一隻羊在每年的5月中旬到11月中旬，基本上不需要人買來草料餵養，放到天山和與外蒙古交界處的冬牧場。而羊在家的時候，則需要購買草料來餵養。按照2014年的市場價格，一個草包的價格是5元，如果農民種地，單純只是打包的話是2.5元。一隻羊市場價在800到1000元，而2014年因為羊肉價格的波動，最低價甚至到了600元一隻羊。一隻羊如果吃自己家的秸稈再搭配買來的飼料，一天需要再掏出1塊錢左右作為羊的成本，一隻小羊到長大基本上也需要六七個月。綜合來看，養羊的收入是比較可觀的，一隻羊的利潤基本上可以達到300到500元。

一頭奶牛的投入與產出：如果要給奶牛餵粉碎的玉米秸稈、油渣、玉米、麩皮和精飼料等，一頭產奶的成年奶牛一天要吃十二三公斤飼料，其中一捆七八公斤重的苞米稈是5塊錢，軋碎要再掏0.5元錢。玉米一公斤現在是2.2元，油渣一公斤是1.85元，麩皮一公斤是1.6至1.7元，「正大」精飼料50公斤裝的一袋是130元錢，這樣算下來，餵的稍好一點，一頭奶牛一天光飼料錢就是20多元。一頭奶牛一天的產奶量最高的有二三十公斤，也有的在20公斤左右，如果想讓奶牛的產量高，在飼料上一點都不能虧待它。而正在產奶的奶牛，為了讓它多產奶，在六七個月的產奶期裡，多餵好飼料開「小灶」，是必須的。產出方面，一頭荷斯坦奶牛平均每天產奶20公斤，一公斤生鮮乳3元，一年下來能創造21900元的毛收益，如果產下一頭小牛，可以再賣2000元~3000



元。除去各項成本，一頭奶牛一年下來也就掙4000多元。如果牛生病，這點利潤也泡湯了。

一匹馬的投入與產出：一匹馬一天也要吃十公斤左右的飼料，飼料內容和奶牛差不多，但是由於基本上馬在不產小馬和產奶期間，馬的飼養沒有奶牛這麼精細，因而飼料也要少一些，粗糙一些。在村民家裡，會發現馬的地位和牛羊沒法比，他就隨意地被拴在院子裡，吃的也沒有羊和奶牛好。相比之下，養馬的投入很大，但是功能很小，在現代社會，馬的騎乘功能已經被汽車摩托車等交通工具取代。雖然近年依靠網絡銷售，哈薩克熏馬腸的知名度也在迅速提高，但是馬肉的價格比較高，消費市場並不大，所以普通村民家中很少有養馬的。

一匹駱駝的投入與產出：其實駱駝是最為省心也是利潤最高的牲畜，除了駱駝奶以外，駱駝肉也能在市場上見到。駱駝基本上放養在距離村裡200公里外的沙漠地帶，基本上不需要特別的飼養，因而少了很多飼料費用。哪怕是在冬天也只要每半個月去看一次，只有已經懷孕的駱駝，會被安排在家中，特殊照看。這時候一般一頭駱駝一天吃20公斤左右的飼料，一天也要吃掉十幾二十塊錢。而駱駝產奶不多，一般在3到5公斤，但是每公斤的價格可以達到十二三塊錢，產奶期也長達14個月，理論上算起來，養殖駱駝應該是比較賺錢的。駱駝奶的銷售也不在本地，在新疆目前從事駱駝奶深加工的企業並不多，村中的駱駝奶基本上都送到阿勒泰去賣，投資回報的週期長。村民們都是家庭經營，不可能從事投資高、回報慢的項目，到底是養羊養牛還是養馬，看似個人喜好中其實隱藏著村民自己迫不得已的經濟理性。

從各種牲畜的成本與產出可以看到，村民們如果自己種地能夠提供小麥或者玉米秸稈的話，養羊和養牛還是有比較好的收益的。駱駝和馬雖然有一定的市場，但是傳統上作為大規模飼養的役畜的功能在現代已經消失了，哪怕有經濟利益的吸引，但是駱駝和馬吃得多，限於村民家庭飼養的能力，其實並沒有形成主流。而每戶人家的地裡都種滿了農作物，對需要放養等有用的時候再用套馬杆套回來的馬來說，已經失去了最重要的活動空間，因而養馬的基礎條件已經不在，村民們出行已經不再需要馬匹。對能力和受教育水平一般的村民來說，奶牛和羊是他們養殖的主要牲畜，更何況作為

羊肉作為新疆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商品，憑藉乳製品在中國巨大的消費量，也是政府鼓勵農戶養奶牛來脫貧的希望所在。以上，哈薩克族放棄奶牛、羊、馬、駱駝等多種動物並存的畜牧體系而從事專門性的羊和奶牛養殖，其實就是市場、牧民、政策三方面合力作用的成果。而被捲入市場的哈薩克族牧業生產，在遵循自己意願和市場的同時，還面臨政府強力的調控。

雖然剛剛金村畜牧業的發展概況做簡單介紹，要注意的是，這只是一個理想模型。對其他的領域來說，生產的不斷專業化是提高生產力水平的路徑之一。專業化的細分可以讓不斷提高自動化水平與資本的投入的效益。在這一點上來說，工業生產最早實現了生產的專業化，福特汽車最早實現的生產流水線就是將這種專業化發展到極致，因而能夠與其他的生廠商競爭。在農業領域，我們也可以不斷看到專業化的生產，各類專業戶逐漸脫離自給自足的多而全的生產方式，專注於生產一種商品，這是現代商品農業與小農生產區別最大的地方，農戶不再需要自己生產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不足的部份可以通過擴大交換來解決。

對畜牧業而言也是一樣，理論上來說，如果每一個農戶只養殖一種牲畜，比如只建設一個羊圈或者牛圈，只養殖駱駝。這種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他可以學習到非常專業的方式來養殖，同時將所有的資源投入到一種牲畜的養殖中去，維護一種牲畜的銷路明顯要比同時尋找好幾種牲畜的銷路要來得簡單而輕鬆。這個範圍可以不侷限在以家庭為單位，它可以是家庭的聯合，也可以是以村莊為單位，通過擴大的市場交換，養羊的村民依然可以喝到新鮮的牛奶而不需要在自己家的院子裡養上幾頭奶牛。而在金村，我們能觀察到的是牲畜的養殖呈現出單一化，但是我們並不能確定這種單一化是否是現代畜牧業專業化的形成標誌。

在此循環上配合市場和政府政策建立的牲畜結構雖然看似專業化和更加容易規模化，但是對村莊整體來說，同質性太高，非常容易引起村民之間的競爭。這種村民之間、村落之間，乃至全疆高度重合的飼養規模，相當於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當市場出現波動和風險，養殖戶受到的損失就更加巨大。在筆者還沒有聯繫到在金村的房東之前，在不遠處的黃村住了一個禮拜。有一天村中非常熱鬧，房東拉著我興沖

沖地去鄰居家的院子裡。只見院子裡停著一輛大卡車，車上裝著幾頭奶牛。卡車停在一堆高高的牛糞堆起的小山邊上，讓後部開啟的車廂對準牛糞，形成一個小山坡。我看見努爾丹站在小坡上，努力把一頭小奶牛往外拉。房東根叔看見奶牛很是興奮，幾步上前踩上了牛糞坡，和努爾丹一起把小奶牛牽了下來。根叔把繩子交給我，指指努爾丹院子裡的白楊樹，示意我把小牛拴在樹上。拴好牛跟著進屋，努爾丹的妻子在切肉，邊上堆著切好的胡蘿蔔、洋蔥、芹菜、番茄和馬鈴薯，案板上醒著揉好的麵糰。看著架勢，是一餐非常隆重的炒拉條了。炕上已經橫七豎八地躺了4個人，努爾丹、鄰居居麻、根叔，還有一位漢族卡車司機。我也和他們一樣，脫了鞋上炕，聽著他們聊天。原來這是一個政府主導的扶貧項目，每家出1000塊錢，加上政府補助就可以購買市場價10000元的奶牛一頭。有這樣的好事，難怪努爾丹妻子做好菜我想。或許是我太過於樂觀或許是剛入田野不久，當時只看到這樣的扶貧項目減去了村民購買奶牛的一大筆開支覺得這真是一個好政策，但是過了幾天當我看到新聞中青海牧區開始傾倒賣不出去的牛奶的時候，我開始感到一絲隱憂。

本項目的初衷是政府將懷孕的奶牛作為生產資料折價賣給村民，讓他們養殖母牛，等母牛生下小牛之後再擠奶，小牛養到一定大小就可以賣出了。這樣的扶貧項目並不是政府的專利，並且在中國多地早已經開始運作，比如著名的NGO組織小母牛就通過這樣的方式讓合作的村民獲得最初的生產資料。在小母牛1985年剛來中國的時候，通過向農戶捐贈動物的方式讓他們獲得生產資料，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獲得良好的收益。<sup>69</sup>政府也是看好牛奶的市場價格，因而通過扶貧項目鼓勵奶農進入牛奶生產，但是很快牛奶市場風雲直下，全國主產區生鮮乳價格降為每公斤3.5左右元，同比下降12.4%。由於飼養成本過高，奶企限收甚至停收生鮮乳，青海、河北、山東、廣東等地頻發散戶奶農倒奶殺牛事件，一個有關牛奶的泡沫又被吹破了。但是這些政府推動的扶貧項目，幾乎是在2014年初的人民代表大會上就被確定的，項目的推行早已經被分工到各個政府部門。因此，當市場價格發生變化的時候，政府的行政體系往往來不及

---

<sup>69</sup> 海惠，〈小母牛近三十年的項目數據(1985-2014)〉，小母牛項目，網站<http://www.heiferchina.org/project/data/>，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調整和剎車，仍然會按部就班地一層一層推行下去，而泡沫破裂的成本則最終轉移到奶農身上。

### 第三節 畜牧業生產力的落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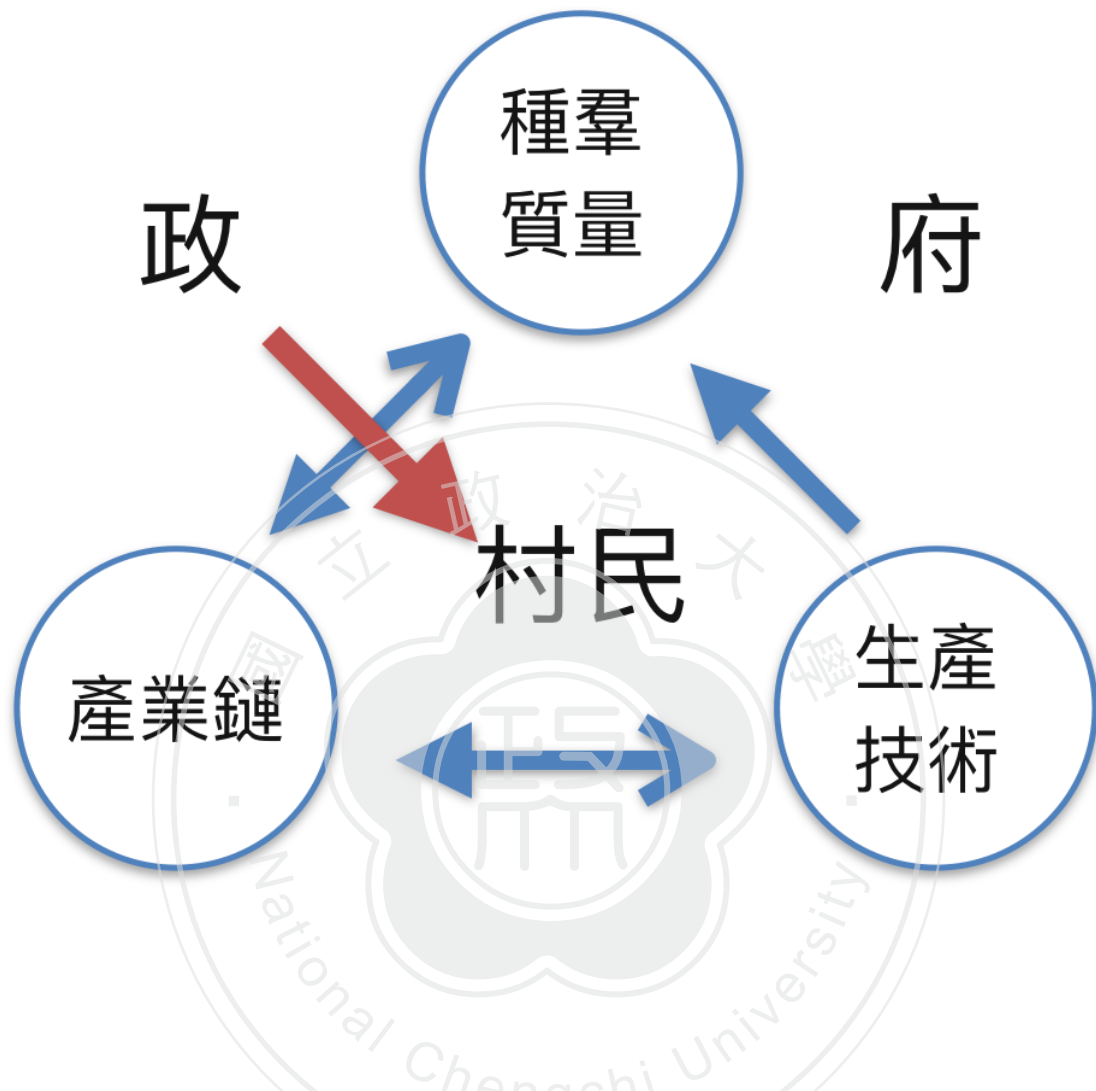
在討論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時候，很多人都會把1978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當作改變中國農村命運的前提。誠然，生產關係的變革激發了農民最大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力，促成了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從1970年代開始伴隨著中國化肥產業發展而激增的糧食產量，也從另一方面說明經濟發展除了與制度設計的關係以外，還有更加基礎的技術性問題。<sup>70</sup>筆者生活在江南農村，在田野之前對哈薩克族的畜牧生活，或者說對畜牧業並沒有非常明確的概念。在每天打掃羊圈、餵羊、擠駱駝奶的過程中，可以體會到在松原正毅書中得到的間接經驗與想像。

其實走在村中，就像中國其他地方一樣，隨處可見各種刷在牆上的大標語。就像村民對它的解讀「缺鈣補鈣」一樣，牆上隨處可見的「科技興牧」似乎說明的並不是科技在當地的畜牧業生產中扮演的角色，將他理解成科技在村中的吶喊似乎更加形象。住在村裡的日子，可以看到村民們依然按照祖先古老的方式在餵羊、餵馬、擠牛奶，作為民族學學生來說，這種與自己書中讀到相類似的畜牧業生活，也許是幸福的，我可以驗證書中的理論，也可以體會十分「原汁原味」的哈薩克生活，感慨傳統保持得完整與美好。很多時候這種感到的「美好」是一廂情願的，民族學者眼中的「美好」甚至帶有「東方主義」的色彩，尤其是在面對現代經濟競爭的時候，這樣的「原始」是不是一種諷刺？筆者在金村感受到其畜牧業的落後是全方位的，並將之歸納為三點：生產技術落後、種羣質量低劣和沒有形成產業鏈，這三者相互影響如下圖。

---

<sup>70</sup> 任冲昊，〈蘇聯模式何以指導中國數十年〉，《黨建文匯》下半月版第9期（2012），頁38。

圖 4-1：金村畜牧業困境示意圖



娜拉認為，游牧經濟下的生產力特點與農耕經濟有著本質的不同。生產工具的進步對游牧經濟的發展作用和農耕經濟相比並不十分明顯。<sup>71</sup>針對娜拉的看法，筆者認為，生產工具的內容和形式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發展變化的，對牧業來說，生產工具對其產生的作用並非不明顯，而是游牧居無定所的特徵不能使其大規模運用先進的生產工具；相比之下農耕定居的特點使得建造和使用更加先進的生產工具變為可能。因此，先進生產工具在畜牧經濟中運用的障礙並非畜牧業本身與科技的絕緣，像金村這樣定居的家庭農場擁有使用先進畜牧技術的基本條件，並且生產技術還是畜牧業生產的關鍵因素。

<sup>71</sup> 娜拉，《清末民國時期新疆游牧社會研究》，頁97。

生產技術可以影響到牲畜的繁育，比如建立牲畜精子庫、培育新的品種等等。通過對品種的改良可以建立良好的產業鏈，就像是種子之於種植業，牲畜的品種是產業鏈的基礎。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畜牧產品的產業鏈能否延伸，是否暢銷都建立在畜牧業提供優質畜牧產品的基礎上。金村的牲畜一般都是自然孳生，導致品種漸漸退化。就像我在黑叔家看到的那樣，有一頭頗受照顧的山羊，在其他的羊都冬天都吃乾草的時候，唯有那頭懷孕的山羊每天被牽到羊圈吃玉米，這已經可以算是村民對還未出生的羊羔的特殊照料。政府並沒有對此袖手旁觀，在內地不斷依靠科技來改良種子的時候獲得高產豐收的時候，國家也對畜牧業開啟了良種計劃，通過了《全國羊群體遺傳改良計劃（2013-2025）》。<sup>72</sup>而我則希望通過政府一項配合市場羊肉的品種改良計劃來說明品種對畜牧業生產的影響

在金村，政府每年將市場價1750元的母羊承包給村民，村民需要每年給政府150元作為承包款。合同一共簽訂三年，三年後政府收回這些母羊。而在這三年中，母羊下的羊娃子（小羊）歸村民所有。黑叔給我算了一筆賬，最好的情況是一頭母羊每年產下一頭羊羔，按照今年的價格，羊羔的市場價是700元，那麼三年就可以賣2100元。三年的承包款是450元，母羊三年吃掉的草料大概需要820元，那麼最直觀的情況下，一頭羊三年一共可以為村民帶來830元的收入。

這個「看起來很美」的項目，事實上村民們也是怨言頗多。鄉政府的羊是從阿勒泰買來的阿勒泰羊，「這種大尾巴羊肉不好吃，毛不夠多，奶也不多」是村民對阿勒泰羊的第一評價，換句話說，這種大尾巴羊的市場價值很低。政府發放的羊不適合本地，也不是村民最愛的小尾寒羊。此羊最大的優點是它比較能適應阿勒泰當地比較極端的自然環境，耐寒耐旱。而鄉政府並沒有諮詢當地的村民想要什麼，也沒有根據本地的自然情況去買羊，更加誇張的是前一年從「內蒙古買來的羊很多都因為不適應本地的環境死掉了」。政府原本希望改良羊群品種的計劃，卻反而因為品種不對遭到村民的怨言，很多村民都不知道這樣的羊養了到底能做什麼用。就在國家不斷希望通過

---

<sup>72</sup> 《全國羊群體遺傳改良計劃編制工作初步完成》，中國畜牧獸醫訊息網，網站：<http://www.cav.net.cn/news/201412/11/1442.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改良品種來提升農戶生產力的時候，當地政府提供了品種並不好的種羊以此來擴大村民的羊群養殖規模，這對村中並不算先進的畜牧業可以算是雪上加霜。

另外，生產技術也可以直接作用於產業鏈。以牛奶生產的技術性要求來說，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後，中國對牛奶的要求提高了很多，但是廣大的散戶一般都是家庭規模的飼養，吃的飼料和擠奶方式並不能達到現在的市場准入標準。分散的奶農本身的資本都有限，無力承擔牛奶質量提升的設備與技術。在人民公社解體以後，哈薩克牧民的畜牧業又回歸到了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基本情況。回歸小農和家庭意味著畜牧業的發展得不到生產升級的資金和能力，所謂的科技興牧在沒有上級配套資金的情況下流於口號。一個鐵桶一個板凳，坐在奶牛的肚子下就可以擠奶，看到村中婦女的擠奶方式想必和哈薩克人的祖先來說並沒有什麼不同。牛奶的生產水平低下，並不能生產符合當地乳製品企業需求的牛奶。

這些大型企業是政府引進作為龍頭企業，從而形成產業鏈帶動牧民發展的。而在現實中，政府和企業、村民自建並沒有協調好利益的鏈條，導致利益失衡。企業得不到優質的奶源，卻也不願意通過對農戶的補助和技術支持來提高農戶的生產。而農戶本身分散、對技術掌握不足的特性，也很難主動把握提升質量的機會。事實上資本最雄厚的一方企業為了自身的發展也在試圖打破怪圈。從一邊是農戶將牛奶倒掉，另一邊是乳品企業自己在擴張奶牛養殖的地圖就可以看出，企業在奶源質量不能保證的時候，寧願自己養牛。而企業的大養殖場不但減少了從農戶手中生產的牛奶，還通過擴張擠壓了他們的生存空間。

而將牛奶送出村加工的最大損失就是村民失去了對牛奶深加工帶來的附加值，他們向奶站售出的是最簡單直接的產品，所以乳製品企業一開始是逐漸降低價格，後來等到建立自己的奶源基地，就乾脆不收。在意識到了這一點之後，村民們也嘗試著將哈薩克族傳統的手工奶製品賣到更大的市場中去。木拉提因為製作奶製品被當做標杆而上報紙的人物，他利用傳統手工藝全部制作成了奶疙瘩、酥油和乳餅，在每年夏天賣給來奇台旅遊的游客（奇台是江布拉克草原的所在地），這不但保存解決了因為奶站不收奶而剩下的牛奶，還大大延長了牛奶的銷售時間。在木拉提家，他小心翼翼拿

出報紙給我看對他致富的報導，言語間充滿了自豪。他幫我算了一筆經濟賬，我一看和報紙中的報導一樣，也許這筆賬木拉提都不知道算了多少回了。擔心由於報紙報導而注入水分使得數據失真，筆者通過牛奶與奶疙瘩的市場價，結合木拉提家的狀況，給木拉提的小作坊計算收入。木拉提家養了4頭土種奶牛，每頭奶牛每天產牛奶10公斤，按照市場價，奶子（牛奶）一公斤3塊，做成奶疙瘩、做酥油、做乳餅的話，每公斤就是80塊、100塊、120塊左右，1年的純收入就是一萬多元人民幣，比單純賣牛奶的確要高出許多。這讓筆者感到在村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家政權對農村的塑造，但是絕不能把村民看成是被動接受現代化的，他們本身在主動努力回應國家帶來的現代化。村民本身對現代化的回應是有韌性的。

不過村中的奶製品，大多數並不符合內地人的口味，就像我帶回家的哈薩克奶疙瘩，更大市場的消費者不太吃得慣。並且，中國的市場已經不是剛剛開始創業時候的初級市場，隨著經濟的日益開放，想要像剛剛創業一樣佔領高地已經變得更難，如何在這樣一片紅海中創業，找到新的模式也變得更加艱難。

此外，新疆與在國內其他的省區做對比的話，存在著天然的劣勢。由於新疆距離龐大的內地市場十分遙遠，物流始終是制約新疆發展的巨大問題。原先進出新疆最大的物流通道也只有蘭新鐵路一條，極高的物流成本讓新疆的農產品在內地失去競爭力。而新疆內部城市化不高，經濟水平也不高，況且廣大農村對畜牧產品的需求基本自給自足，因而新疆的畜牧業很難像內蒙古一樣依靠內地發展。同為畜牧業省份的內蒙古也擁有草原興發、伊利、蒙牛、小肥羊等知名企業，而新疆由於屯墾和生產建設兵團的歷史，在全國比較知名的企業大多數都是種植業，尤其是具有新疆地方優勢的棉花與果業，畜牧企業在全國並不擁有很強的競爭力。<sup>73</sup>新疆本地企業受制於新疆的自然地理條件，本身就不能成為強有力的銷售龍頭，對區域內的廣大農村帶動作用就更加微弱了。

金村牛奶的產業鏈雖然依靠傳統有了一點小小的氣色，但是能夠做到像木拉提一樣製作奶疙瘩的人不多，金村自身能夠處理的牛奶有限，大多數的牛奶銷售依然是通

<sup>73</sup> 筆者根據2000年至2015年農業部《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業名單》整理。



過奶站<sup>74</sup>的中介賣給附近的乳企。金村設有一個奶站，奶站收購奶農的原奶價格為3元/公斤，乳品企業收購奶站原奶的價格達到了每公斤4.5元—5元，兩次收購之間1元多的差價成為奶站向奶農提取的費用，而終端市場上散裝牛奶價格則達到每公斤6—8元。當進入奶源銷售旺季，奶站占有主動地位，而奶源銷售進入淡季時，企業占主動地位。「奶價行情不好的時候收購價是乳企說了算，奶價高了以後是奶站說了算。」<sup>75</sup>而無論何時，奶農始終是無話語權的一方，處於底層。村民的牛奶銷路受到下游企業的影響，企業的效益和能力直接影響村民牛奶的銷量。而村民本身分散的特徵也沒有和企業、奶站的議價能力。相當於完全將自己的身價性命捆綁在別人身上。

養牛和養羊，原本就是像哈薩克這樣游牧民族的老手藝，但是就像中國其他的老手藝老傳統一樣，在科技和生產方式進步的時代，工匠們漸漸發現自己敵不過大工廠，他們即將失去祖先賴以生存的傳統與技能。農業雖然是第一產業，但現代農業毋寧說是一種工業。拉鐵摩爾說的農業民族對游牧民族的最後的同化，依靠的將會是工業化，<sup>76</sup>我相信這個過程已經開啟。在第一章筆者就介紹了哈薩克村中的商品化，一切的工業品都要從外界輸入。而導致他們貧困的，其實就是這第一產業與二三產業之間的落差。不過村中畜牧業除了養殖技術落後以外，整體產業鏈也停留在最初級的飼養階段，利益最高的農產品深加業工並不在村中。其實按照畜牧業產業鏈的定義，<sup>77</sup>村中的畜牧業生產是有最基本的產業鏈的，是村民通過種植業為畜牧業的發展積累了飼料，並且最後牛羊的糞便重新回到農業中。不可否認，這初步規模的產業鏈為畜牧業的生產節約了大量的成本，但是畜牧業更大的價值並沒有因為成本的節約而開發出來。

---

<sup>74</sup> 在中國奶農和奶製品企業中間有一種中間商——奶站。奶站的存在為乳品的採購，計量和運送提供了方便，相當於企業把直接對奶農的工作的服務外包。

<sup>75</sup> 杜鳳蓮、董競澤，《博弈論視角下奶站與乳品企業利益關係的分析》，《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頁11-14。

<sup>76</sup> [美] 歐文·拉鐵摩爾 (Owen Lattimore)，《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頁376。

<sup>77</sup> 鄧蓉、閻曉軍，胡寶貴，《中國畜牧業產業鏈分析》（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1），頁46-48。

金村畜牧業的困境是確實存在的，這最直接的原因在於村裡從事畜牧業的村民們。他們幾乎都是40到50歲的中年人，村民個人的能力並不能很好地配合整個產業的發展。而這種生產水平的低下，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間得到解決，因為作為畜牧業生產主體的村民似乎還沒有意識到自己作為生產過程一環中的重要性，「我們哈薩（哈薩克人）一直都是這麼養的嘛！」是我在問有什麼新的推廣方式的時候村民掛在嘴邊的話。雖然知道有新的方式，但是限於投資的成本和個人的能力，村民對先進的養殖技術並沒有完全掌握。

這其中有一定的客觀因素，比如村民們大多數會漢語，但是這種漢語只是在日常的生活和交流中和當地漢族、回族學會的甘肅方言，與外界的交流存在困難。而更加嚴重的是，村民看不懂漢字，在大多數科技知識都用漢字書寫的情況下，村民很難提高自己的養殖水平。另外村民個人對知識的追求，也是造成飼養水平高低的重要原因。雖然大家都不會去買書，但是新疆衛視的哈薩克語頻道每天都會有翻譯成哈薩克語的農業節目。年輕的漢語聽力比較好的村民大家除了會看哈薩克語頻道以外，也會看其他電視頻道的漢語電視劇，而年紀大的白天幹活，晚上則幾乎都是電視劇時間了。而我唯一見到除了電視劇之外還愛看農業節目的黑叔，也是村中腦筋最活的人，他會利用當地的製糖廠糖渣（甜菜製糖之後留下的渣）來配合草料讓羊在冬天不掉膘。而在大多數的村民家中，電視這樣幾乎是唯一獲取外界消息來源的媒介播放的除了孩子愛看的動畫片，就是本地州縣一級的哈薩克阿肯彈唱等娛樂節目。

除了村民本身對畜牧科技的掌握能力比較低，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本來可以通過農業技術推廣和品種改良來持續地改善金村的畜牧業發展方式。只可惜基層政府由於日常工作的繁雜，往往不能像專業NGO一樣將工作的重心聚焦在畜牧業發展上。以當地畜牧獸醫局的工作和NGO為例，雖然當地畜牧獸醫局努力地推廣畜牧業技術，但是從其介紹資料，似乎可以簡略了解到為何官方的努力無法改善村民落後的畜牧業。以上文政府對金村的事情為例，在中國工作的NGO也是在推行這樣的模式，為何NGO就能成功，而政府項目卻事與願違呢？筆者認為：這一類直接提供生產資料的扶貧項目的推廣與實施具有一定的侷限性，在極端貧困乃至貧困戶缺少必備的生產資料時，這一類的扶

貧項目也許能夠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對金村來說，村中畜牧業的發展水平已經超過了缺乏生產資料的階段，簡單通過補助村民生產資料就希望能夠脫貧的希望，這已經超過了最初擁有生產資料就能脫貧的邊際效應了，可能會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變得很脆弱。筆者主張政府的扶貧項目也應該朝著更加多樣化和深耕的方向發展。事實上，NGO組織在農產品的銷售、村莊環境的治理、以及在此基礎之上培育的村民共同體精神等一系列的後續服務才是整個扶貧項目能長久推進並取得良好效果的保證，而這些恰恰是基層政府需要在未來的工作中繼續補強的木桶的短板。

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對畜牧業的發展重心並沒有因為之前勞動力轉移的失敗而重新調整，將畜牧業發展的重心下降到家庭牧場中。先從國家層面來看，參考2014年8月16日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新疆管理局發佈的《中國銀監會新疆監管局辦公室關於印發銀行業支持新疆農牧業發展指導意見的通知（試行）》，《通知》中有有關金融要「協同推進農牧業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如下：

（六）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優化，按照自治區「穩糧、調棉、興果、促畜」的方針調整農業經濟結構，北疆要突出圍繞畜牧業發展調優種植結構，南疆要突出圍繞林果業調優種植結構。

（七）突出農牧業產業化信貸扶持的行業重點，扶持具備整體經營鏈條功能的高效農牧業、創匯農牧業和生態農牧業，使其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增長點。充分發揮農牧業產業化經營的輻射拉動作用，促進優勢產業向縱深發展，形成相對完整的從收購到加工轉化的產業信貸支持鏈條，促進農牧業向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方向的轉變。

（八）突出農業產業化信貸的工作重點，重點支持自治區轄屬的國家級、省級重點龍頭企業，切實解決重點龍頭企業季節性收購資金需求。加大對現有農牧業龍頭企業的信貸力度，促進形成「市場帶龍頭、龍頭帶基地、基地聯農戶」的產業化生產體系。<sup>78</sup>

---

<sup>78</sup> 《中國銀監會新疆監管局辦公室關於印發銀行業支持新疆農牧業發展指導意見的通知（試行）》，中國銀監會官方網站，網站：<http://www.cbrc.gov.cn/xinjiang/docPcjcView/25CB51DEF5954E3D8CB21E63C5A5C65A/34.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而根據奇台縣的官方資料，

截至去年（2014年，筆者注）底，全縣已建成3個畜產品加工企業，108個畜禽養殖場區，3個自治區級種豬場，1個自治區級種雞場，3個國家級生豬標準化養殖示範場，天山東部肉牛肉羊示範基地，40個肉牛肉羊良繁場和標準化示範場。「金奇」牌豬被認定為新疆著名商標，永興種雞場已註冊「小屯」牌商標；西北灣鄉小屯村、西地鎮橋子村、東灣鎮中渠村被農業部認定為無公害生豬、肉雞產地。<sup>79</sup>

從銀監會新疆局的通知中，我們可以看到，貸款是有對象性的和選擇性的，政府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達到獲得貸款的標準。高層希望促進龍頭企業的發展，希望建立的模式是「市場帶龍頭、龍頭帶基地、基地聯農戶」的規模經營方式，而奇台縣畜牧局的工作成績單，我們可以發現當地走的畜牧業發展道路正是畜局和縣政府所希望的「大產業、大園區、大城區」路線，希望通過榜樣的示範作用來帶動農戶。而實際上通過農戶與基地的牛奶交易我們已經發現，這種模式的弱點在於農戶沒有能力生產出符合基地和市場需求的產品，因而單純將政策傾斜到龍頭企業，將會造成二元產業化的狀態，也就是龍頭企業依靠國家政策扶持的產業化與村民依然落後的生產方式並行發展。由此可見，在規模經營模式與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生產之間，政府更加傾向於培育前者，給予已經具有一定生產水平的企業和農場貸款、土地等政策，忽視了在前一輪發展中落後的家庭農場。

在政府層面受不到照顧的家庭牧場，在市場上也無力面對風險。「在現代農牧業中，決定農牧業效益和農民收入的主導因素，不是生產和供給，而是市場需求。新疆畜牧業養殖多以一家一戶的農牧民為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高度分散的小農經營對社會化的大市場來說是難以駕馭的，隨著農牧業生產能力的提高，問題將日益尖銳。在此次（2014年，筆者注）降價大潮中，實行產業鏈一體化運作的農牧戶，風險

---

<sup>79</sup> 資料來源：奇台縣畜牧獸醫局，網站：<http://www.xjxmt.gov.cn/links/r82/index.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就小得多。」<sup>80</sup>這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畜牧廳廳長哈爾肯·哈布德克里木在接受新疆當地媒體亞心網採訪時候的觀點。而牛奶的例子則說明了，在、農戶與企業的利益分配不當時，引進大型的企業對本地農戶來說無疑是木馬屠城，非但不能帶動農戶共同致富形成產業鏈的龍頭，反而可能吸收本地資源。大企業就像一個巨大的怪獸，將會把所有的農戶養殖全部吸附、吞沒，而那些養殖的一部份農戶則成為了這樣一個企業的僱傭工人，其他的農戶則失去了生活的來源。在此基礎上，中國政府意識到要在農村發展畜牧業合作社，只有這樣才可以集合分散的牧民，降低生產經營的風險。



---

<sup>80</sup> 《連漲7年後首次持續下降 新疆牛羊肉價格回調》，亞心網，網站：[http://news.iyaxin.com/content/2014-12/15/content\\_4735393.htm](http://news.iyaxin.com/content/2014-12/15/content_4735393.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 第五章 政府與合作社

### 第一節 表面困境的背後

中國政府對市場經濟的看法卻並不完全是新自由主義式的完全放任式發展的。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強調「市場經濟」與「宏觀調控」兩手抓。而什麼是宏觀調控，則需要根據政府的需求不斷調整。宏觀經濟尚且如此，在有關民生問題上，政府通過調節保證市民的生活必需品供應更是常事。在第四章中，我們看到政府試圖在通過自己的影響力來構建農村經濟發展的結構與過程，而在本章中，我們還將看到政府如何通過自己的影響力來試圖控制畜牧業的生產，並希望以此來穩定城市。反恐和維穩是新疆的工作的重中之重，為了保持更關鍵的城市的穩定。要知道，在新疆這樣的穆斯林地區，羊肉的價格和內地的豬肉價格一樣，都是事關社會穩定的重要指標，是重要的政治任務。雖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畜牧廳的廳長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代牧業生產是以市場為導向的，但是這個市場是受到經濟運行規律自動調節還是受到政府政策而被動調節卻是另外一回事。而筆者認為，在目前的城市化進程中，政府為了平抑羊肉價格，大規模地擴張羊肉的生產，以此來穩定社會。而短時間內羊肉生產大量增加政府卻沒有意識到農村地區作為羊肉的提供者在物價下跌後面臨的艱難處境。

從2006年開始，新疆的羊肉價格一路上漲，政府為了平抑城市羊肉價格，開始鼓勵農村養羊。實際上，這個問題不能歸咎於地方政府頭上，誠然中國基層政府的渙散往往是導致矛盾的直接原因。在這表面現象背後的結構性問題則是政府依靠行政命令來推動經濟發展與現實經濟發展瞬息萬變的矛盾。根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網站公開文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2009年羊肉價格上漲和一系列推動畜牧業「大發展」、「大跨越」的文件中，一共出臺了多項旨在扶持羊肉生產的政策措施。在一系列扶持肉牛肉羊生產發展的政策措施，規劃確定，自治區每年至少安排8億元支持肉牛肉羊養殖。力爭到「十二五」末，也就是2015年，全區牛羊肉產量由2012年的84萬噸增加到110萬噸，使人均新增羊肉量達到10公斤以上；到2020年，牛羊肉產量達到135萬噸。

2014年底的時候，新疆全自治區的羊肉價格忽然開始下跌，市場零售價每公斤為52元，比2013年平均下降10元人民幣。羊肉價格的波動讓前幾年投資進入羊肉市場的企業都有點承受不住，更別說農村裡小而散的農戶。恰恰在這時候，政府的扶貧項目批准下來，一頭頭的羊開始進入村莊，村民更加覺得奇怪，也對政府的政策更加不認同。而政府則認為，更少數量的生產單位可以盡可能地被政府掌握，而合作社的更大規模也可以低於更大的風險，因此只有將過於分散的農戶集中起來，改變農戶與企業單打獨鬥的現狀，<sup>81</sup>不但在與企業的合作中爭取更大的話語權，還能夠最大限度地穩定市場，將畜牧業的生產作為令牌掌握在手中。這也是政府在意識到牧民跟不上羊肉價格波動之後開始鼓勵合作社的一個原因。

高層政府的經濟計劃中看是完美無缺的發展計劃，在基層會因為其中各種各樣的原因而導致效果不彰甚至完全的失敗。我們再來看上文提到的政府通過補貼讓村民養阿勒泰羊的故事：

「那如果母羊在在這過程中死了或者丟了你們要給政府賠錢嗎？」我問道。「不賠！」村民略帶憤怒地回答，繼而道出他們的憤怒。「國家每年給我們村的發展補助是140萬，<sup>82</sup>可是小王你算算800頭羊，每頭1750，這個羊嘛要1700多塊嗎？你算算！」而黑叔更是在炕上給我做比劃，「這是習近平，這是張春賢，這是昌吉州，這是奇台縣，習近平好好的，張春賢好好的，到昌吉州就不對了，奇台縣就更少了」。

關於中國民眾對政府的印象，一句順口溜很能說明問題，「中央是恩人，省裡是親人，縣裡是仇人，鄉鎮是敵人」<sup>83</sup>而鄉鎮政府這樣的基層國家代理人更是不受人待見。雖然在21世紀，基層政府的治理已經比過去好了不少，由於農業稅，計劃生育政

---

<sup>81</sup> 趙雲平、劉秀梅、鮑震宇，《〈奶業組織模式變遷及對奶戶利益的影響——以呼和浩特市奶業發展為例〉》，《調研世界》，2006年第6期，頁20-23。

<sup>82</sup> 由於金村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區級貧困村，因此各級地方政府安排了多種類型的扶貧項目。單純是整村推進的扶貧資金12、13、14年每年都各自是140萬元。另外還有的扶貧資金，每年也在40萬元左右。副鄉長訪談資料。

<sup>83</sup> 蘭雲，《徵地恩仇錄》，《中國改革》2005年第6期，頁62-63。

策的放鬆，也基本上不存在「上房揭瓦」的狀態，<sup>84</sup>但是基層對於基層政府的廉政建設和發展能力都頗有微詞。「140萬，三年就是420萬，如果在我們村建設一個加工廠，我們的羊就能賣出去了。」當我在村中閒聊的時候，村民對我寄予厚望，「小王，你回去了要上網寫寫這些狀況，把他們暴露一下！」我尷尬地笑笑，卻在心裡盤算另外一件事，因為想起去年的400頭羊中，村中有人一人獨得30頭，不知道今年他得了多少頭。「10頭。」他神秘地對我笑笑。為什麼啊？和鄉裡村裡關係好的人就能多幾個嘛？我並不吃驚，我感到疑惑的是，這麼大的事情村民幾乎都知道，難道不怕村民上訪嗎？「上面聽話的人沒有……」「是沒有人聽他們上訪嗎？」「恩。」到這裡就明白了，有的村民之所以敢明目張膽地剋扣村裡的羊，原因也是他對政府的行為心知肚明，雖然他明明是受害者，但是在這件事情上他成了受益者。

在中國的行政結構當中，地方政府和基層政府所擔負的責任是不一樣的。很多時候政策的制定與落實完全不是同樣的狀況。而這個項目的推行過程中不僅僅是與上文養奶牛一樣政府行為的盲目與對地方性知識的忽視，更是對中國基層治理的一次絕佳觀察機會。

這種村民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溝通不暢的例子比比皆是。諷刺的是，新疆自2012年開始大規模的駐村行動，也讓村民深受感染。雖然經常遇到田野中的民族學者被認為是「欽差大臣」，村民提出各種要求的。<sup>85</sup>而我在村中的行動，則被認為是工作組。我常常跟在黑叔身後在村中行走，在經過一段簡單的哈語自我介紹之後，村裡人大概都會問黑叔：「工作組嗎？」雖然其他都是哈薩克語，但是幸好其中這個來自漢語的借詞讓我明白大家都很奇怪是誰會在冬天到這樣一個農村裡來。我問村民，工作組來過村裡嗎？答案是否定的，傳說中的工作組其實並沒有來過，但是這並不妨礙大家對工作組的想像。以及將我視為工作組的成員，並讓我轉告上級路該修了、我們家需要低保，以及土地承包合同三十年不合理之類的話。我在鄉政府附近的商店和村民閒聊

---

<sup>84</sup>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頁216。

<sup>85</sup> 趙樹凱，《基層政府：體制性衝突與治理危機》，《人民論壇》2014年第15期，頁46-51。



的時候，有人把我當工作組，問我為什麼不在鄉政府裡工作？並且說那裡很溫暖，讓我不要在街上吹冷風。

但是他們不會主動和政府去討論，發希望我這都通過這個外來人員直接把這些東西和問題上升到更高一層，這樣看來，其實他們是不相信當地政府的。另外由於中國大陸官方對新疆問題的定調，那是「三股勢力」的原因，這樣的定調其實是忽略了在新疆發展過程中的幾大的不平衡。南疆與北疆，城市與鄉村，不同的民族之間、不同的階層之間，新疆的貧富差距是巨大的。但在反恐優先的工作定調之下，民生的發展也多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一切工作為維穩，當地村民也怕事情弄大了說不清楚，往往就這樣算了。

最後而本項目的分配則讓我看到村民之間依賴於政府的這種溝通不暢的關係產生的貧富分化，明明是給全村分配了800頭羊，平均是每家兩頭。而當我問黑叔的時候，他說他家申請了30頭。這讓我感到十分吃驚，原本以為這些羊是按照家戶平均分配的，但是情況貌似並不是這樣。關於為何分配如此不均，其實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從黑叔的身上我們還可以發現，村中的富人們，一方面聲討基層政府的作為，另一方面，他們卻也要和基層政府也是依賴關係，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之後的合作社問題上，我們將會更加清晰地發現這種村民與基層政府合作又角力的互動關係。在這整個過程中毫無反抗能力的人，就是村中的窮人，也是更加弱勢的人。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基於個人能力的經濟差距已經表現出來，甚至反應在第二代身上。而這種人際關係，將會在下一節，村中合作社的運行中更加明顯的展示出來。

## 第二節 合作社的需求

金村的畜牧業出現了好多問題，似乎這些問題就像一條咬著自己尾巴的蛇，又像是解開一個找不到線頭的線球，無從下手。原本希望通過本地其他產業的發展吸引更多的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地方政府卻忽視了新疆本地的特殊狀況，並沒有吸引到大

量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進駐，因而無法疏解農村過量的人口。勞動力人口不能疏解，不能自然產出種糧大戶和養殖大戶，而政府建立的一個個所謂工業園區和礦產企業，卻將原本的草場破壞，非但沒有築巢引得鳳凰來，讓牧民捧上鐵飯碗，反而打碎了原有的泥飯碗。而吸引來的有限企業和東部對口支援的企業，卻不願意招收本地的少數民族員工。由此政府的另一對策是直接引進和創辦大型的農產品加工企業，比如牛奶廠等等。按照奶企——奶站——奶農的垂直分佈模式建立了牛奶的收購體系，卻因為中國出現的牛奶危機，讓奶農和奶企之間失去信任。更由於奶農的分散，成本投入的不足造成牛奶品質不高，奶企不斷壓價，奶農的牛奶飼養也不成規模，造成惡性循環。黃宗智認為「改造傳統經濟所需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現代投入。」<sup>86</sup>但是當單一的村民個體無力承擔這合理成本的現代投入，而國家也逐漸發現不斷補貼到農戶似乎並不是一件完美的方式，因為千千萬萬的小農由於家庭資源的關係，並不是都能利用好國家給予的補貼，而那些先富起來的人掌握了村鎮的資源，最終國家的補貼成為村落裡「馬太效應」的罪惡推手。到此為止的話，筆者似乎對金村的未來感到悲觀了。受到自然環境和社會現狀的制約，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的速度明顯偏慢，勞動力滯留在農村，而村民的家庭養殖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技術上都停留在低水平發展，無力應對市場需求與波動。在這樣的背景下，牧業合作社又被作為牧區發展的方式被提出並推廣。

中國農民的生產小農生產方式由來已久，共產黨想要做的就是將中國這一群聯繫鬆散的農民聯合起來。因而，在1949年之後，很快便開展了社會主義改造，接下來的人民公社化更是直接取消了家庭作為生產和消費的單位。人民公社化雖然極大地破壞了生產力，但是人民公社運動的初衷就是將中國分散的農村能夠組織起來。並且，中國農村在集體化時期完成的教育、基本醫療和水利建設是受到良好的作用和被學界所肯定的。一九五六年五月，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召開了第三屆牧區工作會議，確定了「依靠勞動牧民，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穩步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對牧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和有關具體政策。<sup>87</sup>

---

<sup>86</sup> [美] 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頁142。

<sup>87</sup> 《木壘哈薩克自治縣概況》，《木壘哈薩克自治縣概況》編寫組，（烏魯木齊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頁18。

雖然農村合作社在後來的發展限制了農村經濟的活力，筆者認為將這種阻力歸咎於合作化並不科學。中國農村合作社的先天不足起源於它誕生時期的對合作社作用的論戰。毛澤東和劉少奇關於合作社的路線出現分歧。最終毛澤東的勝利奠定了之後中國農業合作社重生產輕流通的特性，在此基礎上畸形發展的合作社最終走向大躍進。

金村也深受人民公社化的影響，金村是它的官方稱呼，對本地人來說，金村叫做〇〇隊，就是牧業合作社的隊名。黑叔家炕上的小飯桌，角落上仍然用紅色油漆刷著「〇〇隊」的字樣，可見合作社在村民的記憶中並不遙遠。

而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取消了人民公社，農村的生產關係恢復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關於中國的農村的道路，兜兜轉轉，又回到了家庭當中。游牧社會與農業社會比較，畜牧業內部分工和商品交換雖出現較早，但產業分化不發達。在歷史上，每個游牧民族都兼營過種植業，但受各種條件的制約，種植業未獲得發展，他們需求的精食，始終要依靠與農耕民族的交換來獲得。在古代，雖然「草原絲綢之路」一度成為東西方馬背民族的移動幹線，曾使某些古代游牧民族表現出某種「商業性格」，開展了多邊貿易活動，但未能長期延續。游牧經濟結構基本為單一的畜牧業，種植業、手工業、商貿業等行業很落後，全體游牧民幾乎都以畜牧業作為自己的唯一產業，除了飼養畜群以外，很少幹別的行業。這造成游牧地區長期以來農業和以貨幣為基礎的商品交易不發達，導致了游牧民族經濟具有「落後性」、「被動性」的特點。畜牧業的脆弱性，是它的致命創傷，游牧國家突然衰落或滅亡，和它依賴的單一性的畜牧業本身的缺陷和不足大有關係。很明顯，官方鼓勵合作社的一部份原因，是看到了之前畜牧業發展的困難。新技術的使用，與企業的談判，乃至對畜牧產品的深加工、品牌的包裝、銷路的開拓，這些都是普通村民無法以個人的力量去完成和實現。

全國的合作社數量也呈現出增長態勢。據統計，截至2013年11月底，合作社達到95.07萬個，出資總額達1.78萬億元。合作社實有成員數達7221萬戶，占農戶總數的27.8%，成員身份多元化，合作社覆蓋產業擴大，市場競爭能力不斷提升；全國各類扶持合作社發展的資金總額達到6.35億元；全國各級示範社已突破10萬家，開展內部信用合作的合作社已近2萬家，有聯合社5600多家、聯合會2554家；1.49萬家合作社在2.7

萬個社區設立了2.3萬個直銷店，7500萬人因此受益。合作社也出現了聯合化、規範化發展的趨勢。<sup>88</sup>2013年12月，國家工商總局和農業部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合作社登記與相關管理工作的意見》<sup>89</sup>，為促進合作社聯合社規範發展提供了重要依據。國家鼓勵農村發展合作經濟，扶持發展規模化、專業化、現代化經營，允許財政項目資金直接投向符合條件的合作社，允許財政補助形成的資產轉交合作社持有和管護，允許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引導農民專業合作社拓寬服務領域，促進規範發展，實行年度報告公示制度，深入推進示範社創建行動。2014年，中央財政扶持農民合作組織發展資金規模達到了20億元。2015年，除繼續落實現行的扶持政策外，將深入推進合作社規範發展，啟動國家示範社動態監測，把運行規範的合作社尤其是示範社作為政策扶持重點和國家「三農」建設項目的重要承擔主體；引導督促合作社開展年度報告公示，及時準確報送和公示生產經營、資產狀況等信息；堅持社員制封閉性，依托產業發展，按照對內不對外、吸股不吸儲、分紅不分息的原則，穩妥開展農民合作社內部信用合作試點。<sup>90</sup>實踐中，合作社依托主導產品或產業紛紛組建了聯合社。以上國家通過一系列的法律法規開始補助合作社的建設，希望通過合作社方式帶動牧民增收，加強畜牧業的產業化發展。

而哈薩克族本身的社會組織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遷逐漸消解，卻沒有形成新的社會組織，於是現在也是一片散沙的狀態。有些社會學者常把社會組織放在文化視域之外。事實上，作為物質設備及人的習慣的混合體，社會組織不能和它的物質或精神基礎相分離。<sup>91</sup>這讓我想起賀雪峰在貴州凱佐村的調查，當地也有一個類似的托牛所，一個運行得非常成功的托牛所。賀雪峰在介紹這個托牛所的成員的時候強調，托牛所的成員「合心會」都是外地嫁進來的媳婦，作為本村的「外人」原因使她們本能地聯

<sup>88</sup> 王勇，《家庭農場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合作關係問題研究》，《中國農村觀察》，2014年第2期，頁39-48。

<sup>89</sup> 《關於進一步做好農民專業合作社登記與相關管理工作的意見》，工商個字〔2013〕199號，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13-12/20/content\\_2551523.htm](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13-12/20/content_2551523.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sup>90</sup> 《2015年國家深化農村改革、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增收政策措施》，農業部，網站：[http://www.moa.gov.cn/zwllm/zcfg/qnhnzc/201504/t20150430\\_4570011.htm](http://www.moa.gov.cn/zwllm/zcfg/qnhnzc/201504/t20150430_4570011.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sup>91</sup> 費孝通，《文化與文化自覺》（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頁46。

合起來，形成良好的私人關係。<sup>92</sup>不斷的定居以及行政村的拆分合併以後，哈薩克族的阿吾勒已經被破壞，在村內大家原本是多個部落，連草場的分配也是多民族的。所以像華南村莊中重新依靠宗族的力量回歸來重新組合起來很困難。我想是因為村民部落意識和觀念的解體，村民雖然知道自己祖上的部落，但那已經不是村民立身的根本了。相比之下，隔壁黃村的例子似乎可以說明在什麼樣子的情況下，部落的意識會更加凸顯。黃村的人無時無刻不在告訴我，他們是乃蠻部。在村中，村民的比較親密親屬關係的認同並不在部落這個級別。作為外來者的我，最初從文獻中了解到哈薩克族的部落和阿吾勒制度的時候，也曾經覺得十分神奇，兩個哈薩克族在一起的時候就會詢問關於部落的事；可是不論是乃蠻部還是克烈部落，部落這樣的廣泛的集合體真的能成為生活中的核心嗎？而直到有一天忽然理解了村民眼中「大房子」的概念，就明白了。黑叔常常帶我去兩家人家裡輔導小朋友做作業，原本以為這只是黑叔的鄰居罷了。漸漸地隨著交流的深入，我才明白，這是黑叔家的「大房子」。「大房子」在當地村民的語境中，就是聯合家庭的概念。我們可以發現費孝通所說的「差距格局」的概念在哈薩克族村莊同樣適用，從小家庭到「大房子」，然後從部落（阿吾勒）到金村，一層層擴展。金村的這種「差序格局」隨著也在調整之中，原本在遷徙中就被分化打散的阿吾勒制度伴隨著定居和歷次社會運動逐漸消失，與羅意的對哈薩克族阿吾勒制度的研究結果是一樣的，他認為「地緣關係在農業發展和牧民定居的背景下愈發重要，成為當代哈薩克族基層社會的重要的構建原則」。<sup>93</sup>不過根據筆者在村中的調查，沒有促進因素的話，村民很難形成穩定的地緣關係。

哈薩克族村落不像南方漢族村落一樣有基於血緣的宗族，也沒有像甘青兩省形成以教派和門宦為核心的社會組織。哈薩克族歷史上信仰過多種宗教，原本因為居住偏遠，又進經常搬遷，所以哈薩克族沒有固定的清真寺和經文學校，<sup>94</sup>定居以後村中雖然建有清真寺，卻不像回族和維吾爾族那樣在哈薩克族的日常生活中發揮重要的影響，

<sup>92</sup> 賀雪峰，《鄉村的前途》（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頁184。

<sup>93</sup> 羅意，《20世紀50年代哈薩克族傳統基層社會經濟關係研究——以「阿吾勒」為例》，《民族論壇》，2009年第5期，頁44-45。

<sup>94</sup> 《木壘哈薩克自治縣概況》編寫組，《木壘哈薩克自治縣概況》（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頁21。

在村中的日子，不像在甘青兩省穆斯林的聚居區那樣每天早上被宣禮叫醒，也沒有在主麻日看到村民去清真寺，新的村落並沒有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下，形成基於村落的共同體。<sup>95</sup>黑叔雖然認同自己是穆斯林，卻也只是在開齋節、古爾邦節這樣的日子才去清真寺。在血緣以外，宗教也並沒有能夠成為聯繫村民的紐帶。

筆者認為，在這場政府主導的，試圖通過其他產業的發展，從而轉移勞動力，達到提高畜牧業生產力的方式基本上是失敗的。這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經濟發展這系統性的工程中，任何一環都極其重要。而社會中，有太多的東西是不可控的，在同樣和內地都試圖通過勞動力轉移來擴大農村的人均生產資料佔有的發展模式中，我們就不得不考慮在新疆，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勞動力的轉移帶來的對生活方式的影響，從而不得不更加注重在這場工業化過程中伴隨著社會結構改變和教育帶來的不斷地有關民族文化和漢族同化之間的反思。同樣的事情，在漢族地區和在少數民族地區我們不得不面對不同的爭議，這是中國的政治執政者在少數民族地區推進任何的政策和措施都必須要思考的事情。雖然官方很少如此直白地提出，但是在現行的法律和制度中，有關少數民族的各種變通以及賦予少數民族的自治權還是告訴我們，對於這些問題，研究者不能想當然耳甚至一廂情願地迴避。所以，筆者認為，在短時間內，當當地的民族不能完全敞開心扉地真心擁抱這場雖然是漢族主導的，但是每一個民族必須參與其中的現代化，或者政府不能調動所有人深刻理解的話，目前的這種希望通過定居而達到現代化的方式是很難成功的。

但是，筆者並不認為小農經濟在未來是必然會轉化成大型的規模經營的，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的序言中曾經將蔡雅諾夫和舒爾茨的小農理論做對比，他引用蔡雅諾夫的觀點，認為現代市場經濟下小農經濟可能持續不同於資產者。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它依靠自身勞動力而不是僱傭勞動力，二是它的產品主要滿足家庭自身的消費而不是在市場上追求最大利潤。<sup>96</sup>雖然蔡雅諾夫理論的提出針對的是農業，不過在筆者看來，這理論對小農形式的畜牧業來說，也可以解釋

<sup>95</sup> 閔麗娟、王麗霞，《村域視野中清真寺社會功能及鄉村治理——以甘青保安族、撒拉族人口較少民族聚居地區為例》，《科學·經濟·社會》2011年第1期，頁8-13。

<sup>96</sup> [美]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頁5。

一部份問題。金村的小農牧業和資本主義畜牧業相比，雖然主要依靠的是自身勞動力，但是他的產品並不是主要依靠家庭自身的消費，金村家庭小農場的產品早已經進入市場。但是本文的重點——金村的畜牧業發展卻是主要滿足家庭消費而不是在市場上追求利潤的。

### 第三節 誰的合作社

村裡最終還是辦起了合作社，在政府春風雨露的指導下，也和別的地方一樣。但是在村莊外圍的合作社卻是空空的，村民們依然在餵養著自家的牛和羊，合作社似乎就是那個嶄新漂亮的地方卻沒有運轉起來。村中也有托牛所，但是由於村民都不放心自己家的牛在別人那邊，也擔心牛吃得多吃得少的問題，並不成功。

村落中的公共空間是不明顯的，村民的定居是棋盤式，在居住的空間上沒有一個穩定的村落中心，在村莊合併以後也不存在虛擬的社交中心。對村落共同體的培養並不明顯。相比之下，筆者發現黑叔家其實是一個小小的交流中心。黑叔家整天人來人往，村長會在黑叔家分發村民的灌溉許可證，鄉裡也在黑叔家舉辦「去極端化」宣講會。而我住的時間越久，越發現黑叔家這些客人的固定性。

到底是哪些人組成了村中的合作社？這個問題不僅關係到合作社的運轉，還牽連到村民在定居之後村落的社會結構。與鄰村政府主導建立的專業合作社不同，本村也有兩個合作社，但是都是私人建立的。在我早上和黑叔聊天的時候，問他有沒有加入合作社，黑叔幾乎是斷然回答：沒有！並且解釋到這裡的合作社都是空殼子，基本上沒有辦成功的。關於合作社成立的效果，其實黑叔一直在迴避我的時候卻不經意透露了，「假東西，都是假東西」。過了一會兒，別克西也來了，我便順著早上的話題繼續和別克西聊村裡的合作社。別克西大大咧咧的，漢語講得不錯，而後來我和別克西聊天的時候，他告訴我黑叔就是合作社的發起者之一。而黑叔原本一直加入我和別克西的談話，並且對別克西的話做做補充，而別克西說了之後，黑叔忽然就開始沉默，

對合作社這件事三緘其口。這件事讓我感到十分驚訝，參加合作社致富原本應該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黑叔為什麼要隱瞞呢？而別克西在黑叔離開之後說的話，我認為似乎可以解釋黑叔不想讓我知道他是合作社成員的原因。而讓我對基層政府的工作範圍感到不可思議的更是另外一件事，有天中午我正在黑叔家啃饅喝奶茶，黑叔忽然讓我快跟他走，說是有肉吃。聽到有肉吃，拋下手中的饅就跟著黑叔走。在主人家伙房間坐一會兒，就去了正房吃飯。進去了才發現裡面坐著一大群鄉政府的人，不少人我已經打過交道。鄉裡書記就給我介紹，這是鄉長，這是劉警官，這是鄉長秘書。當時我心裡暗忖這些基層公務人員又在百姓家大吃大喝敗壞政府形象。回家後和黑叔聊天，大概就是想知道鄉政府是幹嘛來的，為什麼來大吃大喝一番又揚長而去。黑叔的回答讓我感到吃驚，鄉政府是主人家請來的，那天是主人家請客，原因是他兒子考取了律師資格證。說實話，答案很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本以為黑叔會像批評某天中午在他家炕上酣睡3小時的小學校長一樣批評鄉政府到基層白吃白喝，但是他並沒有那種義憤填膺，而是告訴我主人很高興，因為跟鄉政府關係好，就請他們來吃飯。這個疑惑直到在得知了合作社的秘密之後，我再一次試探性問起那次請客的人是不是合作社成員之一，答案是肯定的，真相大白的同時，感到我已經站在了一個隧道的深處，而遠處一絲絲的光亮，似乎告訴我外面是一個更大的真相。

這個真相就是，鄉政府與村中有頭腦的人結合在一起，成了一個村中能人的利益的提供者，雖然這些利益的保護與傳統上研究的基層政府成為基層黑惡勢力的代言與保護是不一樣的，<sup>97</sup>當地的政府只是提供了一個渠道，讓那些有能力的人參與進來。而這些人，他們就像改革開放初期的那些「倒爺」一樣，利用了規則的漏洞參與到整個規則當中來。合作社與人民公社還是不一樣的，但是期待經濟利益通過合作社將原本分散的小農聯合起來，沒有政府的干預，合作社其實只是富人的遊戲，而窮人是參與不進來的。合作化的初衷就是鼓勵貧困農戶合作起來，抵抗市場的風險。結果反而是貧困戶被排除在外，合作社的參與人員是村中比較富裕，比較有頭腦的人。

---

<sup>97</sup> 于建嶸，《農村黑惡勢力和基層政權退化——湘南調查》，《經濟管理文摘》2004年第3期，頁40-45。



毫無疑問，他們是適應中國這個體制的，他們有一定的知識，有一定的膽量，他們願意參與到中國這樣的經濟活動中來，也在獲得一定的經濟資源以後，通過經濟資源走上政治道路。比如黑叔通過各種關係和金錢，將他在新疆警察學院畢業的兒子送上了公務員的坦途。除了大兒子的工作，黑叔也將二兒子送到內地讀高中，直到兒子進入中國石油大學。黑叔表示，希望他能夠留在內地工作，進入大城市。黑叔的想法和做法，就很像長三角成功的農場主，成為了集合土地出租、經商、發放高利貸為一體的地主，並教育子孫讀書做官。<sup>98</sup>這一類人，他們是適應中國的，所以他們不必像村中其他人一樣逃避，不適應的人要麼在經濟生活中敗落下來，要麼就遠走高飛移民去了哈薩克斯坦。

這首先是功利性質的在生活狀況的層面上討論問題，比如想要移民的村民也反映出「哈國那邊村口就有小學，讀書不要錢，生活要比新疆好很多……」之類的直接動因，他在2014年夏天曾經帶著全家去哈薩克斯坦考察移民的情況，認為哈薩克斯坦的生活狀態要好於新疆。而本村的合作社是在2012年發起的，發起者是奇台縣政府，那一年縣裡成立了很多合作社。當時黑叔和幾個有關係的好朋友就利用了政府的這個政策，成立了一個合作社。而一個合作社的運行並不簡單，但是一個合作社的失敗，卻很容易。我們可以從金村合作社的失敗，再次檢視國家基層的地方性知識的缺失和身份限制的結果。

「合作社都是腦子活的人辦的，其實裡面都是空空的嘛，你去後面看嘛！要是領導來看，就把別人家的牛啊羊啊都趕進去，領導看完就走了。」鄉裡出錢在村中畫地修建了合作社的圈舍，然後出租給合作社。一年的費用是2000元，可以飼養150隻羊。但是村民們並不願意將自己家的羊趕到羊圈中去過冬，「羊圈冷得很，他上面蓋的東西，薄薄的一層」。而主持羊圈修建的鄉政府則認為「這是按照上頭統一的標準修建的」。金村所在的地方，是天山的北坡，天氣好的時候，在村口就可以遠遠看見天山山脈橫亙綿延伸向遠方。而這一地理的結果就是，受到天山對北方冷空氣的滯留效果，冬天一二月會降溫到零下二三十度，而且我在村中的並不算很長的日子，就已經下了

---

<sup>98</sup> [美] 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頁71。

好幾場大雪。當地村民家中的羊圈，都比較矮小，頂多兩米，甚至有的1米9、1米8，一般人進去餵食的時候都要低頭，屋頂覆蓋著麥稈，再上面是木板，蓋上一層泥土，然後再是瓦片。因為金村冬天的氣溫極低，所以羊圈的保暖顯得非常重要。而政府修的羊圈，就如同高大的廠房，通透明亮，藍色的鐵皮屋頂看起來在灰黃的冬天裡給金村增加了一抹亮色，我卻只能對著這些光鮮亮麗的空置的羊圈啞然失笑。這其實是中國基層政府經常做的事情，好大喜功，追求表面，還有修建這些羊圈所能得到的回扣與灰色收入。基層政府對於地方性知識的缺失，其實一點也不奇怪。雖然鄉長是哈薩克人，鄉政府的工作人員都是哈薩克人，但是我在與鄉政府打交道的時候，發現在此工作的非哈薩克人都不會哈薩克語，而村民對我這樣一位大學生身份的誤解，讓我比較深刻地理解他們對基層工作人員的態度。

那沒有養殖，為什麼要辦合作社呢？別克西接著說出其中的真正原因。「辦合作社國家有補貼。」而後黑叔也坦承，合作社管理有問題，資金使用也有問題，基本沒有辦成功的。而合作社失敗的另外一個原因，則要歸結於流動資金。合作社的運行不同於單家單戶的飼養，他需要一定的流動資金。而村民的金錢並不以現金的方式存在，也不是存在銀行，而是轉化成了牛、羊、馬。金村的富人們辦的這個合作社並不成功，透過分析這個合作社的運作，進一步探討其失敗的原因。金村的合作社是專業合作社，其中的「專業」體現在這是一個只養羊的地方。合作社的會員將自己家的羊趕到一起集中飼養，合作社就辦起來了。但是弔詭的是，會員將羊趕到一起飼養，卻並沒有分擔飼養的草料，也沒有將草料作價賣給合作社。村民依然將自己家的草料運到合作社分開投放，由於擔心羊吃的草料的不均衡，也就是說擔心自己家吃虧了，而且合作社離家裡有一定的距離，每天來回幾次餵養實在是太麻煩，會員們將羊集中一段時間就又全都趕回家自己養了。只有在上頭來檢查的時候，才將羊送回合作社做做樣子。其實合作社離住宅的距離也並不是問題，如果是合作社聘請飼養員統一餵養的話，就需要付出更大的經營成本，合作社要降低成本不可能聘請，而會員出工又擔心分配不均，結果一拍兩散回家自己養。而合作社唯一能賺到的錢，則是從國家套取對合作社的補貼。合作社的運行沒有良好的規則，也因為會員的私心而沒有成功。

就像黑叔和我談起新疆羊肉價格下跌的原因中提到，內蒙古和青海合作社的羊肉賣到新疆了，可以從這話中感受到濃重的危機感。所以對黑叔，或者他們合作社的成員當中，他們一開始在政府的指導下辦起合作社，是相信合作社會帶來希望的。而村民對合作社的感情則稍顯複雜。一方面他們基於現有合作社的表現，他們認為合作社是沒用的，對畜牧業的發展並沒有多大的作用，但是參與進合作社仍然有著明顯的好處，那就是和黑叔說的一樣了，從上級騙錢。

當我們在思索定居牧民為何不能富裕的時候，已經提到牧民在整個市場的參與中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在與外來的大型企業相比，政府給予大型企業更多稅收優惠、土地優惠；與奶製品企業相比，他們處在產業鏈的底端，並且受制於技術與規模並沒有直接與奶製品企業議價的能力，相應地在利益鏈條上也處於不利的地位；在與政府的關係中，受到當前政治環境的影響，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牧民並不能與之良好互動，因而政府主觀上的優惠政策並不能真正惠及廣大牧民；而在牧民之間，也由於前三十年積累下來的深厚的基礎決定了他們在今日的競爭上已經在不同的起跑線上，造成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現象。其實金村合作社的失敗經驗就已經說明，市場發展政策不應該集中在政府「建立」新的市場組織，而應該集中在構建合適的政策環境，允許現存的和新的銷售組織和經營者得以發展和競爭。<sup>99</sup>

---

<sup>99</sup> 丹尼爾·羅森伯格，《後社會主義時期蒙古國的牲畜市場改革：食品安全與公平市場發展問題》，《游牧社會的轉型與現代性：蒙古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頁147。

## 第六章 結論

政府大規模推動定居，是基於三個邏輯，一是保護草原生態；二是定居後提高牧民生活水平、增強對牧區的社會控制；三是實現傳統游牧業到定居畜牧業的轉型。只不過定居之後相配套的勞動力轉移因為本地產業結構和牧民生活方式與工業社會的衝突沒達到預期效果，使得剩餘的勞動力只能積壓村中以家庭為單位的畜牧業上。然而家庭畜牧業因為種羣質量不高、沒有延伸的產業鏈和生產技術的落後而陷入惡性循環。政府原本期待引進大型牧業龍頭企業帶動發展，不料龍頭企業沒能夠與農戶做好銜接，反而開始自辦農場與村民形成競爭關係，政府由此意識到培育生產合作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政府為了調控市場的牛羊肉生產，也有將分散的農戶聯合的需求。在農村成立合作社要面對的是農村社會的原子化。金村失去了部落組織，宗教也無法整合，有些村民依靠資本和政府的關係建立的合作社是一個向政府套取補貼的空殼。村民整合、畜牧業發展的目標遙遙無期。

金村的發展似乎是走到了一個死衚衕裡，我們可以看到政府一道道的文件從中央發佈，一項項旨在推動畜牧業發展的措施都在金村推行，可是金村就像一個得了癆病的病人一樣，依然沒有好轉。筆者想在論文中思考的問題就在於此：為什麼安排周密的計劃在金村是無效的？

在論文的結尾，筆者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政府的計劃過於精密，環環相扣，缺少彈性。而越是精密的計劃越需要強大的執行力，需要一絲不苟嚴絲合縫地完成計劃的每一個步驟，哪怕出現一個細小的差錯都會導致整個計劃的失敗。在本論文中，政府擁有發展經濟的整體計劃與其他配套的規劃，整體計劃就是通過第二產業將第一產業過剩的勞動力轉移，從而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而由於招商引資項目和少數民族勞動力就業沒有解決，導致計劃破產。而另外發展家庭農場的配套計劃中，金村的畜牧業和種植業結合緊密，畜牧業的每一步發展都配合着田裡莊稼的生長與收穫，這也就意味著原本對哈薩克牧民來說獨立的畜牧業現在建立在種植業的基礎上，尤其是土地作為基礎的基礎。因而當家庭勞動力

水平、家庭所佔有資本數量改變了家庭土地佔有量的時候，會間接地影響整體家庭畜牧業的收益能力。

其次，政府對地方性知識的忽視。不論是高層政府還是基層政府，並沒有意識到金村的發展需求，也沒有真正將金村視為發展的重心。金村這樣的畜牧業村莊，對高層政府來說是生產牛羊肉維護城市穩定的蓄水池，必要時可以犧牲農村的利益來維護城市的穩定。基層政府在工作中唯上不唯下，在與村民的互動中無法了解村民的需求也失去村民的信任，因而無從滿足村民的需求。另外，基層政府與少部份村民關係的密切形成的利益集團，造成了公共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加重了村中的貧富差距。

再次，金村的村民限於時代和地域造成的生活背景，無法真正融入市場經濟中。在村中像根叔一樣能夠關心國家大事，通過電視節目學習農技知識的人太少。就像新疆整體一樣，由於封閉，金村中的許多人沒能在前幾十年中積累下發展的資本。雖然定居，金村卻沒能建立起以地緣為認同的村落共同體，不能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效地組織起來獲取更大的收益。村民本身是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一環，卻也是最薄弱的一環，村民們的生活狀態沒有主動更新，導致與周圍其他民族相比落後下來。

最後，是政府與一部份村民的私人利益關係。政府忽視絕大多數人的需求，注意的是要有一個合作社的樣板，而當頭腦「靈活」的村民辦起一個合作社，對基層政府來說任務已經完成，卻對合作社的運行沒有監督，檢查也只是形式上走過場。這讓部份村民通過合作社套取國家補貼有機可乘。

筆者在論文中講述了哈薩克族畜牧業在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下不斷碰壁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政府制定的畜牧業振興計劃精密又脆弱，只要一兩個步驟達不到預訂的目標，計劃開始一步一步走偏，最終導致定居工程效果不彰。本文為哈薩克族的定居畜牧業發展積累了一點經驗，也努力地在中國鄉村研究的視角下去看待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少數民族鄉村的研究離不開「三農」的話語，如何將這兩者集合起來，用鄉村研究的方法與理論去解釋中國少數民族村落與全國的共性，並能用民族

學文化研究的視角重視少數民族村落的特殊性，只有這樣，才能真切地看清村落發展的問題，也將中國鄉村研究拓展到更廣闊的地域。

筆者雖然嘗試總結分析了金村經濟發展中的弊端，可是在現有的農村中，如何將能夠解決文中提到的困境？在本文一直批判過於宏大描述的背景中，筆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在微觀地操作中發展哈薩克族的畜牧業。在金村這樣失去自主發展動力的地方，政府的決策與引導對經濟發展無疑有著關鍵作用。雖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村民自身具有自身缺陷，諸如不能掌握通用語文、缺少農技知識和開拓市場的能力以外，加上政府與村民的疏離，讓沒有機會的村民徹底失去謀求發展的動力與信心，一部份將希望寄託在移民上。筆者認為政府如果能將發展的重心從大型企業與合作社轉移到村民本身，尊重民意、了解村民的需求及時回應，可以較好地激發村民發展的動力與提升自己的信心。作為民族學人，筆者斗膽對文中出現的困境提出建議，但是希望將更多的關懷落實在村莊共同體的建設。

反思合作化和大型集體農業是否扼殺小農業的發展，是要走向規模經營還是回歸到家庭？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農業發展道路是以集約化為重點。在現有情況下，大型的農場要提高效益，需要的是規模化經營，需要集中土地資源。在中國大陸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的狀態下，已經通過法律的調整允許私人將土地的使用權流轉，而一旦企業或者是個家庭集中了更大的土地，建立了大規模的農場，必將提高農場的機械化水平。這對消化吸收原有土地上的勞動力並沒有幫助，如果機械取代了人力，卻沒有給勞動力其他的生存機會，無異於剝奪了生存的空間，在新疆這樣民族關係複雜的地區，中國政府一直以穩定為主，因而這樣的模式在新疆城鎮化發展不到一定的階段並不存在實行的合理性。家庭牧場生產嚴重依賴土地，而土地的耕種需要人力資源，現在哈薩克人的家庭規模也不足以支撐。在家庭農場的模式下，受困於土地、貸款的制約，家庭農場沒有能力去提升牲畜飼養的科技水平，也沒有能力開拓更大的市場。況且，生產方式的落後，才是農村的致命傷。雖然說科技在中國的地位早就被鄧小平說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但是口號畢竟是口號，如何才能做到

「科技興牧」，筆者認為應該直接補貼農戶、開展農技培訓、新技術新工具採取租賃的方式下降到農村。

當現有的一切經過近30年的檢驗看起來似乎並沒有那麼美好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反思現代化的路徑。是否城市化就代表著現代化？在現有大多數牧民仍然停留在鄉村的時候，問題的反思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當前政府對牧民現代化的路徑就是在定居的同時，將人口轉移到二三產業中。此種安排在經濟方面的效益是本文關注的重點，而當今中國大陸和新疆的狀況，不得不提醒我們在文化與傳承的角度來審視經濟發展策略。城市化雖然是世界各國發展的客觀規律，但是牧民定居項目是否一定要按照單線進化論的角度逐級完成游牧—農業—城市的步伐？拉鐵摩爾認為游牧社會只有在牲畜馴化之後才能出現，而牲畜的馴化則出現在草原邊緣同時從事農業和狩獵的社會中。他之所以這麼認為，是因為「定居者比遊蕩的獵人與游牧者更容易馴化被捕獲的動物。<sup>100</sup>它適應了當地的氣候，而並不是我們按照馬克思主義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觀點，是人類從畜牧業中發展出來種植業的社會。我們今天重新審視畜牧業及其定居的狀況，可以發現，定居似乎並不是牧業民族發展的充分條件。定居的情況並不會直接帶來牧業民族的發展，這其中牽扯到包括政府、企業、牧民自身主體性等等問題。

中國意識到自己的落後並對現代化奮起直追，社會的發展目標就是希望將中國帶入一個發達的現代化國家，這一點應該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很多少數民族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動地參與到中國追逐現代化的過程，然後少數民族在現代化中會和漢族一樣遇到對傳統文化的反思，但是很多人會將一些生活方式上的現代化歸為漢族帶來的，但是在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生活的民族，却被這樣一個急切想要完成自身更新的國家強迫帶入一個共產黨理想中的現代化，他們喪失的不僅僅是與漢族一樣面對西方文化的話語權，還要在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中喪失相對於漢族的話語權。這種雙重話語權的喪失，讓中國的少數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焦慮與失望。當上一代人固執地認為最好吃的莫過於手抓肉的時候，下一代人幾乎已經不一樣了。就像拉鐵摩爾所說，漢人希望通過農業來實現對中亞綠洲和草原的控制是不太可能的，現在國家找到了新的方式，那就是全面的現代化。而到底現代化和漢化之間的關係，誰又知道，

---

<sup>100</sup> [美] 歐文·拉鐵摩爾 (Owen Lattimore)，《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頁110。

誰又清楚。就像瑪哈孜把洗完手之後要甩手看做是被漢化的表現，其實那只是害怕被同化的恐懼。

在新疆，當少數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社會制度被解構讓更多人自身充滿了對自身文化的迷茫和對現有社會制度的不滿。另一方面，由於環境的改變，牧民們賴以生存的文化模式沒打破，原本自覺信奉的文化精神不再有效地規範牧民的行為，游牧文化對離開草原的人群正逐漸失去規範意義，文化和文化主體的分裂更加劇了草原游牧文化的困境。而筆者在一開始把這個小小的哈薩克鄉村放在中國鄉村視野中，也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個帶有自身特色的鄉村。在城市化的進程中，我們希望依靠鄉村來保持中國人的心靈故鄉，對於哈薩克族這樣的少數民族，雖然現代化不能拒絕也無法拒絕，但是能夠時常與綿羊、駿馬、奶牛打交道，也是保留遙遠的游牧記憶的方式。

總之，這是一個村莊的故事。村莊在中國的西北某個角落，實在是非常地不起眼。但是，他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卻深刻地和中國的命運、中國的政策集合在了一起。村民們對自己命運的改變在做著種種努力，他們或者就適應了中國，隨著潮流而動，或者，他們選擇逃避，遠離中國。現代化比傳統的漢族農耕社會更加猛烈地襲來，到底誰才能在這塊土地上繼續生存下去？用何種方式？現在其實並沒有答案。



# 徵引書目

## 一、文件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2015年國家深化農村改革、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增收政策措施》，農業部，網站：[http://www.moa.gov.cn/zwllm/zcfg/qnhnzc/201504/t20150430\\_4570011.htm](http://www.moa.gov.cn/zwllm/zcfg/qnhnzc/201504/t20150430_4570011.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關於內蒙古自治區及綏遠，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業區畜牧業生產的基本總結》（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953年9月9日），問法法規網：網站：<http://www.51wf.com/law/1195613.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新華網，網站：[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1/19/c\\_119033371.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1/19/c_119033371.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中國銀監會新疆監管局辦公室關於印發銀行業支持新疆農牧業發展指導意見的通知（試行）》，中國銀監會官方網站，網站：<http://www.cbrc.gov.cn/xinjiang/docPcjpgView/25CB51DEF5954E3D8CB21E63C5A5C65A/34.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全國羊群體遺傳改良計劃編制工作初步完成》，中國畜牧獸醫訊息網，網站：<http://www.cav.net.cn/news/201412/11/1442.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奇台縣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奇台縣黨政信息公眾網，網站：<http://www.xjqd.gov.cn:8085/10014/10200/10006/2015/69875.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奇台縣畜牧獸醫局，網站：<http://www.xjxmt.gov.cn/links/r82/index.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海惠，《小母牛近三十年的項目數據(1985-2014)》，小母牛項目，網站：<http://www.heiferchina.org/project/data/>，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國家計委關於易地扶貧搬遷試點工程的實施意見》計投資〔2001〕1834號，中國甘肅網網站：<http://news.gscn.com.cn/system/2014/10/16/010827875.s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國務院關於促進牧區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1〕17號，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1-08/09/content\\_2821.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1-08/09/content_2821.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的通知》，國發〔2001〕23號，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922.htm](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922.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連漲7年後首次持續下降 新疆牛羊肉價格回調》，亞心網，網站：[http://news.iyaxin.com/content/2014-12/15/content\\_4735393.htm](http://news.iyaxin.com/content/2014-12/15/content_4735393.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福州產業援疆成就奇台「卡拉麥里金」》，昌吉新聞網，網站：<http://www.cjxww.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413&id=49576>。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福建省新一輪對口支援新疆昌吉州綜合規劃（摘要）》，昌吉回族自治州政府網站，網站：<http://www.cj.gov.cn/gk/ggjg/zcjgg/1178.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新疆草場退化原因及目前草場管理使用上的問題》，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xjso.gov.cn/main/showdetails.aspx?id=495>。檢索日期：2016年1月15日。

《關於進一步加強退牧還草工程實施管理的意見》，農牧發〔2005〕4號，農業部官方網站，網站：[http://www.moa.gov.cn/zwl/m/zcfg/qtbm/z/200601/t20060124\\_542305.htm](http://www.moa.gov.cn/zwl/m/zcfg/qtbm/z/200601/t20060124_542305.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關於做好建立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前期工作的通知》財農〔2010〕568號，財政部官方網站，網站：[http://nys.mof.gov.cn/zhengfuxinxi/czpjZhengCeFaBu\\_2\\_2/201101/t20110111\\_409674.html](http://nys.mof.gov.cn/zhengfuxinxi/czpjZhengCeFaBu_2_2/201101/t20110111_409674.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關於進一步做好農民專業合作社登記與相關管理工作的意見》，工商個字〔2013〕199號，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13-12/20/content\\_2551523.htm](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13-12/20/content_2551523.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 二、專書

《木壘哈薩克自治縣概況》編寫組，《木壘哈薩克自治縣概況》，烏魯木齊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札奇斯欽，《蒙古文化與社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日〕松原正毅，《游牧世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林耀華，《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三聯書店，2008。

〔美〕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馬媛、古麗夏·托依肯娜，《從游牧到定居：新疆布爾津縣杜來提鄉阿合達木村調查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高帆，《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理論闡釋與實證分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

郝時遠、〔挪威〕奧塞·科拉斯、扎洛主編，《當代中國游牧業：政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娜拉，《清末民國時期新疆游牧社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

費孝通，《江村經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賀雪峰，《鄉村的前途》，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

黃樹民著，素蘭、納日碧力戈譯，《林村的故事：1949年後的中國農村變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美〕黃宗智著，《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0。

詹姆斯·C·斯科特，《國家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溫春來，《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鄧蓉、閻曉軍、胡寶貴，《中國畜牧業產業鏈分析》，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1。

劉鑫渝，《土地制度變遷視野下的哈薩克牧區社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

〔美〕丹尼爾·羅森伯格，《後社會主義時期蒙古國的牲畜市場改革：食品安全與公平市場發展問題》，《游牧社會的轉型與現代性：蒙古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Benson, Linda and Ingvar Svanberg. *China's Last Nomads :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s Kazaks*. New York: M.E. Sharpe, 1998.

Humphrey, Caroline and David Andrews Sneath. *The End of Nomadism? Society, Stat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Kerven, Carol, *Customary Commerce: A Historical Reassessment of Pastoral Livestock Marketing in Africa*. ODI Agricultural Occasional Papers15.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1992.

### 三、論文期刊

于建嶸，《農村黑惡勢力和基層政權退化——湘南調查》，《經濟管理文摘》2004年第3期，頁40-45。

王富偉，《個案研究的意義和限度——基於知識的增長》，《社會學研究》2012年第5期，頁161-183。

王勇，《家庭農場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合作關係問題研究》，《中國農村觀察》，2014年第2期，頁39-48。

王銘銘，《西學「中國化」的歷史困境——以人類學為中心的思考》，愛思想網，網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13.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任沖昊，《蘇聯模式何以指導中國數十年》，《黨建文匯》下半月版，2002年第9期，頁38。

杜鳳蓮、董競澤，《博弈論視角下奶站與乳品企業利益關係的分析》，《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頁11-14。

周亞成，《哈薩克族經濟轉型中的貧富差距調查——以胡阿根村哈薩克族為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頁42-46。

阿德里汗·葉斯汗，《新疆牧區新農村建設的現狀與對策》，《新疆財經》2008年第4期，頁18-21。

阿德里汗·葉斯汗，《加快和完善新疆游牧民族定居的對策》，《新疆財經》2005年第1期，頁16-19。

阿德里汗·葉斯汗，《對新疆畜牧業結構調整的幾點認識》，《新疆財經》2002年第四期，頁12-15。

孫巋，《對口援疆背景下的民族關係協調機制》，《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1卷第4期，頁21-25。

閔麗娟、王麗霞，《村域視野中清真寺社會功能及鄉村治理——以甘青保安族、撒拉族人口較少民族聚居地區為例》，《科學·經濟·社會》2011年第1期，頁8-13。

章力建，《加強草原生態保護是當前我國環境保護的戰略要求》，《2009中國草原發展論壇論文集》，頁38-41。中國知網，網站：<http://cpfd.cnki.com.cn/Area/CPFDCONFArticleList-ZGCY200910001.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陳畢業，《構建中國新疆天山北坡經濟帶》，《中國軟科學》，2002年第3期，頁92-95。

趙雲平、劉秀梅、鮑震宇，《奶業組織模式變遷及對奶戶利益的影響——以呼和浩特市奶業發展為例》，《調研世界》，2006年第6期，頁20-23。

趙樹凱，《基層政府：體制性衝突與治理危機》，《人民論壇》2014年第15期，頁46-51。

蘭雲，《徵地恩仇錄》，《中國改革》2005年第6期，頁62-63。

劉世定、邱澤奇：《內卷化概念辨析》，《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5期，頁96-110。

羅意，《20世紀50年代哈薩克族傳統基層社會經濟關係研究——以「阿吾勒」為例》，《民族論壇》，2009年第5期，頁44-45。

羅意，《我國哈薩克族基層社會組織探析》，《伊犁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6月第2期，頁1-4。

## 村中訪談人物簡介

根叔：第一位房東兼報導人，小學老師。

瑪依努爾：黑叔的女兒，結婚的時候從烏魯木齊買了一卡車的嫁妝回來。

黑叔：第二位房東兼報導人，村中的能人，也是金村合作社的成員之一。

努爾丹：黃村村民，也是政府分牛的受益者。

別克西：金村的村民，黑叔的鄰居，家中有兩兄弟，母親生病，生活比較貧困。

努爾曼：金村村民，家中4口人卻只佔了50畝地，因而覺得很不公平。

卡力哈爾：金村土地最多的人家。

斯拉木巴依：金村土地最少的人家。

副鄉長：金村的分管副鄉長，也是政府相關資料的提供人與報導人。

木拉提：金村製作奶疙瘩致富的典型人物。

哈爾肯·哈布德克里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畜牧廳廳長。

傑克：金村的高中數學老師，向我介紹哈薩克族年輕人對知識和學歷的觀念。

